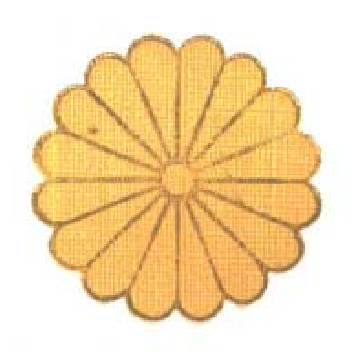
日本近现代史

第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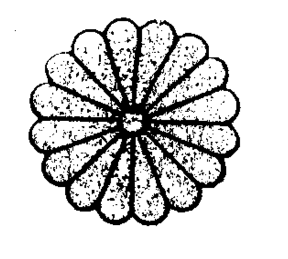
〔日〕藤原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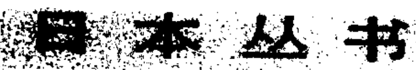
日本丛书·日本丛书

日本丛书·日本丛书

商务印书馆







日本近现代史

第三卷



〔日〕藤原彰 著

伊文成 李树藩
南昌龙 赵春元 译

邹有恒 校

商务印书馆

1992年·北京

日本近代史 III
藤 原 彰著
据岩波书店 1977 年 12 月版译出

日 本 丛 书

日本近现代史

第三卷

〔日〕藤 原 彰 著

伊文成　李树藩
南昌龙　赵春元　译

邹 有 恒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299-6/K·249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2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字数 150 千
印数 2 000 册　　印张 6 3/8

定价：3.30 元

《日本丛书》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组译日本学术论著。三十多年来，已出版有关日本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及宗教方面的译著一百多种，加上最近所组新译，已初步形成系列。为便于读者研读，现汇编为《日本丛书》印行。第一辑选目，刊印前曾征求学术界意见，幸蒙赞许，但仍难称美备，深望海内外读者有以指正。

此次汇编出版前，曾对各书体例、译名略作调整，有几种系据原纸型重印，不及一一改订，尚希垂察。

编　者

1991 年 4 月

目　录

序言……………………………………………………………………1
序章　战争前夕的日本……………………………………………………2
停滞的农业………………………………………………………………2
工业结构和工人状况……………………………………………………4
阶级构成的特征…………………………………………………………5
军国主义的发展…………………………………………………………7
国家权力的性质…………………………………………………………9
1931年的世界……………………………………………………………10
总危机下的亚洲与中国…………………………………………………11
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17
第一节　十五年战争的开端……………………………………………17
“满蒙”问题与战争宣传…………………………………………………17
阶级斗争尖锐化…………………………………………………………19
柳条沟事件………………………………………………………………21
“南满洲”的占领…………………………………………………………22
十月事件…………………………………………………………………24
犬养内阁…………………………………………………………………26
第二节　五·一五事件……………………………………………………29
上海事变…………………………………………………………………29
“满洲国”的建立…………………………………………………………31
占领“满洲”的意义………………………………………………………33
血盟团和五·一五事件…………………………………………………35

举国一致内阁的组成……36
第三节　准战时体制……38
农村的贫困……38
救济农村请愿运动……39
农村更生运动……40
反法西斯斗争与镇压……41
教育的军国主义化……43
第四节　二·二六事件……45
天皇机关说问题……45
战争的危机和法西斯化的动向……47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48
军部的派系斗争和叛乱……50
广田内阁与国防国家……52
第二章　日中战争……56
第一节　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56
战争前夕的日中关系……56
近卫内阁……57
芦沟桥事件……58
战争的扩大……60
转向长期战争……61
日中战争全面化的原因……61
第二节　战争的扩大和国家总动员……64
国家总动员法……64
战线的扩大……66
国民生活的贫困……68
人民战线事件……70
第三节　新体制的建立……72
诺蒙坎事件……72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73

大政翼赞会的成立……74
加强对国民的统治……76
第四节　日美对立……78
时局处理纲要……78
开始南进……79
欧洲战局的变化……80
中国战线的僵局……81
日美谈判的开始和日苏中立条约……82
德苏战争的开始和关特演……83
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和第三届近卫内阁……85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89
第一节　对美英开战……89
对美战争的决心……89
东条内阁的组成……90
日美谈判的决裂……93
开战……95
第二节　展开总力战及其矛盾……97
陆海军的初期作战……97
开战和翼赞体制……98
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100
欧洲战局的转变……101
战争经济的困窘……102
第三节　悲惨结局临近……105
法西斯各国的败北……105
太平洋战线的崩溃……106
中国战线的停滞……107
大东亚共荣圈的崩溃……108
第四节　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111
欧洲战争的结束……111

战斗力的崩溃和本土决战的准备 …… 112
空袭日本本土 …… 113
本土决战的体制 …… 114
波茨坦公告 …… 114
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参战 …… 116
第四章　占领下的日本 …… 120
第一节　占领和民主化 …… 120
努力维护天皇制 …… 120
占领的开始 …… 121
民主化的指令和旧势力的退却 …… 123
食粮危机和通货膨胀 …… 124
群众运动的高涨 …… 125
政治上的空白时期 …… 127
修改宪法 …… 129
农地改革和解散财阀 …… 130
民主化的意义 …… 131
第二节　垄断资本的重建 …… 133
冷战的开始 …… 133
“二·一”罢工 …… 134
片山内阁 …… 135
芦田内阁 …… 136
中间道路的崩溃 …… 137
东京审判 …… 138
第三节　朝鲜战争 …… 140
中国革命和占领政策的改变 …… 140
吉田内阁 …… 141
道奇路线 …… 142
工人运动的挫折 …… 143
朝鲜战争的爆发 …… 144

开始重整军备 …… 145
清共活动和成立总评 …… 146
第四节　旧金山媾和条约 …… 148
特需景气 …… 148
单独媾和的动向 …… 149
全面媾和运动 …… 150
缔结旧金山条约 …… 151
第五章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 …… 153
第一节　开始重整军备 …… 153
朝鲜停战的动向 …… 153
行政协定和日台条约 …… 154
共同安全法体制 …… 155
吉田内阁的崩溃 …… 157
第二节　高速度增长 …… 159
和平共处的开幕 …… 159
和平运动的发展 …… 160
保守联合与社会党统一 …… 161
日苏恢复邦交和加入联合国 …… 162
由石桥到岸 …… 164
岸的访美和防卫力量的整备 …… 165
印度尼西亚、越南赔偿问题 …… 166
第三节　修改安全保障条约和反对斗争 …… 168
美国的世界战略 …… 168
考勤和警职法 …… 169
修改安全保障条约的交涉 …… 171
国民运动的发展 …… 172
安全保障条约的签字 …… 173
反对安全保障运动的高涨 …… 175
岸内阁下台 …… 176

第四节　新安保体制 …………………………………………………… 177
三十年的历程 …………………………………………………… 177
高速度增长及其矛盾 …………………………………………… 178
社会结构的变化 ………………………………………………… 180
战后的政治权力 ………………………………………………… 181
人名索引……………………………………………………………… 183
事件索引……………………………………………………………… 187

序　　言

本书是继远山茂树著《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今井清一著《日本近现代史》第二卷之后的《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目的在于概述 1931 年到 1960 年的日本近代史。

本书叙述的三十年间，其前半期是战争，后半期是战后改革，是日本历史上动荡最为激烈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所发生变化之大，是其他时代无与伦比的。以有限篇幅归纳这一时期的历史并不容易。另外，笔者曾和远山、今井合著的早已收在岩波新书中的《昭和史》，主要是以昭和战前时期为对象的概述，而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比它时期更长，从分量来说，也没有对一切领域加以叙述的余地。因此，本书以政治史为中心作了重点叙述，特别试图阐明战争的原因及其结果，和叙述日本在这三十年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关于本书叙述的这段历史，在最近十五年间，出版了很多原始史料，还发表了许多根据这些原始史料的研究成果。由于篇幅关系，在本文和注释中只介绍了其中一部分，但这方面的一些文献解说也出版了。本书如能对于把握了历史主流之后，对照原始史料加深理解上，有些帮助，则不胜欣幸。希望读者对我们关系最深的现在这个时代的历史，更加关心。

藤原彰

1977 年 11 月

序章　战争前夕的日本

停滞的农业

本书是以日本开始发动历时十五年侵略战争的1931(昭和六)年为起点，概括地叙述从那以后的日本近现代史。在那以前，要简单考察一下战争前夕的日本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中。

1931年，从明治维新算起已经过了六十四年。不言而喻，在这以前的近代日本的发展，在各个方面都是惊人的，尤其是工业的进步，在亚洲、非洲等后进地区的各国当中是突出的，大有逼近欧美先进国家之势。可是，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日本，说起来还没有摆脱农业国的状态。

九一八事变的前一年——1930年，正是每五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年①。这个时期的日本领土总面积为六十七万五千三百八十五平方公里，除了朝鲜、台湾、库页岛等殖民地以外，日本内地的面积为三十八万二千五百四十五平方公里。总人口为九千零三十九万人，其中日本内地的人口为六千四百四十五万人。这正相当于明治维新当时人口的大约两倍。

在日本内地人口当中，居住在十万人以上城市的占百分之十八，居住在五千人以上的市、镇、村的占百分之六十一，居住在不满五千人的农村里的占百分之三十九。就是说，农村人口比城市人口多得多。另外，按照职业区分的人口则是，在有职业的二千九百六十二万人当中，从事农业的为百分之四十八，从事工业的为百分之十九，从事商业的为百分之十五，从事公务和自由职业的为百分

之七，从事交通业的为百分之四等，农业人口占将近一半。就是说，大部分日本人居住在农村，大约有一半人从事农业，从这点来说，这个时期的日本也可以说是个农业国。

农家的户数为五百六十万户，这个数目自明治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变化。耕地面积为五万六千六百六十七平方公里，只占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五，明治年代以来只增加了十分之一强。主要农产品大米的收获量也在六千万石左右，几乎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在农业方面，明治年代以后没有多大进步。

说在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方面没有多大变化，就是说占国土的大半和总人口半数的农民在生活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与工业的进步相比，农业之所以停滞，是因为农业的基本生产关系没有现代化，半封建的地主制度仍然牢固地存在着。在五百六十万户的农家当中，自耕农占百分之三十二，佃农占百分之二十六，自耕兼佃耕农占百分之四十二，可见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还被束缚在地主佃农关系之中②。

农村的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地主佃农关系，农业生产停滞，大部分农民处于极端贫穷状态，这就是农业国日本的特征。农村人口没有变化而城市人口之所以继续增加，正表明人口不断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农村中多出来的这些人口，主要是农家的女儿和次子、三子，他们靠极其低廉的工资支撑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说，贫困的农村，为日本资本主义保证了廉价劳动力。

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农民，从大正中期以后逐渐掀起了租佃纠纷，出现了结成农民组合的动向。不过，由于国家权力的坚决镇压，农民的团结是很不容易的。1930 年的农民组合成员为三十万人，仅占全部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五。所以，对于争取土地改革和农民解放，耕种农民的阶级团结的条件，还不十分成熟。

农民中的大多数是自耕农或者是自耕兼佃耕农，在农业危

机深化当中经常遭受景气波动的影响，有陷于没落的危险。他们与中小地主一起，具有中间阶级的动摇性，构成了天皇制的社会基础。

工业结构和工人状况

与农业的停滞相比，现代工业的发展是惊人的。1930 年的工业生产额约为六十亿日元，职工五人以上的工厂为六万二千二百三十四所，职工人数为一百六十八万人③。在工业中，生产额和职工人数都最多的是纤维工业，工业产品价格的顺序为绵织品、生丝、棉纱、丝织品。就是说，轻工业处于压倒的优势。纤维工业的工人，女的比男的多得多。工人人数最多的绵织品工厂中，男工是三万，女工是十九万；在丝织品工厂中，男工是三万，女工是十七万，女工处于压倒的优势。尽管如此，整个工厂的工人数，与现在相比，少得可怜，而且其中大多数是纺纱、织布等女工。

这样的工业结构，在对外贸易方面也有所反映。日本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达到二十多亿日元，到了昭和时期多少有些减少，在直接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 1930 年，出口降到十一亿日元，进口降到十二亿日元。在进出口平衡方面，大战期间大幅度出超，1919年以后转为入超，以后每年继续入超。按照国家区分则是，出口的对方国家：美国为百分之三十七、中国为百分之十三、印度为百分之十；进口的对方国家：美国为百分之二十八、中国为百分之十二、印度为百分之十一、澳大利亚为百分之九。出口商品：生丝占第一位，为百分之三十，其次是绵织品和陶磁器；进口物品：皮棉、羊毛、石油、木材等是大宗，另外包括钢铁、机械、零件等。就是说，贸易的最大对方是美国，日本是向其出售生丝而购入石油、铁、机械等，其次是从印度进口棉花，从澳大利亚进口羊毛；而向印度、中国等出售纺织品。

从以上各点可以说明，日本工业的技术水平还很低，钢铁、机械、化学等高级工业品完全依靠进口，而需要大量劳动力的纺纱织布业是中心。而且，这种纺纱织布业的制品对印度和中国等之所以具有出口的竞争能力，是因为以工人的极端低廉工资为支柱的缘故。最重要的输出品生丝，也是以令人吃惊的养蚕农家的重劳动、低蚕价和缫丝女工的低工资为依据的。《女工哀史》是对美出口生丝的支柱，现代日本正是“以生丝来购买军舰”的。

即使在这样情况下，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大战期间的迅速发展，工人的状况还是在逐步发生变化。工人数目不仅迅速增加，而且定居在重工业城市的男工，在以临时出来劳动的女工为主体的全体工人中逐渐增加了比重，成了大正年代中期以后的工人运动的主力。可是，1930年，在一百六十八万名工人中，过半数的八十八万人仍然是女工，而且十八万名是十六岁以下（这是虚岁数，实际比满十五岁还小）的未成年的工人，小规模零散企业的工人有三十多万人，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营企业工人足有十五万余人，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工人阶级觉悟的成长。

1930年的工会会员数目，虽然历年连续急剧增加，但仍没有超过三十五万人④。这个数目不过是官方统计的工人数目的十分之二，仅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而且，这种工会大都是劳资调和主义的右翼工会，左翼工会受到镇压，被迫处于不合法或半合法的状态。

阶级构成的特征

这个时期，日本阶级构成的特征是，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中间阶层。在大桥隆宪编著的《日本的阶级构成》⑤一书中，改编人口普查的结果，列出阶级的大致分类，据此，1930年的阶级构成如下：

一、统治阶级　　六十五万人

A、政治人物（天皇、皇族、贵族、简任官和荐任官）　四万六千人

B、寄生地主（拥有五町步以上者）　十六万三千人

C、资本家（资本金十万日元以上、雇用工人五人以上的资本家）　三十八万四千人

D、靠退职金生活者（荐任官以上）　五万七千人

二、中间阶层　三百九十八万九千人

A、政治人物（委任官）　十六万九千人

B、农民（五町步以下，自耕农）　一百六十三万户

C、渔民（缴纳营业税者）　三十一万户

D、自营工商业者（缴纳营业税者）　八十五万八千户

E、独立专门技术者（医生、教员、技师、神官、僧侣、自由职业者）　八十八万九千人

F、靠退职金生活者（委任官）　十二万七千人

三、被统治阶级　一千三百六十五万人

A、贫农（佃农、自耕兼佃耕）　三百八十五万七千户

B、自营工商业者（免除营业税者）　四十四万二千户

C、工人　八百五十七万五千人

D、下级公务员（雇员以下）　七十七万六千人

总计　一千八百二十八万九千人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存在着大量的中间阶层，除此之外，纯属于农业工人或佃农以外的农民，也可以算作中间阶层。达农户百分之七十四的自耕农以及自耕兼佃耕农都具有小所有者的性质，在农业危机激化中，有沦为佃农的危险，是属于反复动摇的中间阶层。

工商业者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显著增加了。尤其是城市的自营工商业者达二百二十二万户，加上其他小规模企业的雇主，占城市中间阶层的最大部分。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深化中，因为

中小工商业者所受的打击很严重，其生活降低到勉强餬口的最低水平，相继发生了乘夜潜逃和全家自杀等事件。

再者，一般企业的办事员和中级的公务员、独立的专门技术者、自由职业者等也可以算为中间阶层，加上这些，即使在1930年的阶段，中间阶层也达到了全部有职业者中的三分之一，这是很明显的。排除这种中间阶层的存在和动向，就不能了解这一时期社会的实际状况⑥。

尽管如此，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急剧发展的结果，阶级构成上出现了巨大变化。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中心力量，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都比因农业危机而停滞的地主阶级处于压倒的优势地位。以大财阀为中心的垄断资本的统治力量确立起来，同官僚机构紧密结合，在政治上也取得了统治地位。而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对立，已经成为基本的阶级对立。

军国主义的发展

农村非常贫穷，城市工人的工资也极低廉，这就意味着劳苦大众由于贫困而缺乏购买力，国内市场非常狭窄。因此，日本资本主义形成伊始，就不得不向国外寻求市场。而且，无论在资本力量或技术水平方面，都没有同欧美资本主义进行对等竞争能力的日本资本主义，只有避开自由竞争，依靠军事上、政治上的独占来强烈地寻求足以弥补这种缺陷的市场，即殖民地。正因为这样，日本资本主义从形成伊始就具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它同欧美那种进行自发的资本积累和发展有所不同，在日本是国家大力扶植了资本主义，其目的是加强军事力量，而国营的军工厂成了现代工业的开端。后来，每隔十年反复进行一次的对外战争以及在战争间隔中的扩充军备，成了保证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

以军事目的为出发点，靠战争而繁荣起来，从殖民地谋取利益

的这种军事侵略性质，是日本资本主义的最大特色。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成长起来，即使到了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二十世纪一十年代，这种特色仍然没有很大变化。由于日俄战争的结果吞并了朝鲜，并将南满洲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反倒更加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

在国内的统治体制方面，天皇制军国主义对民众的强权统治，也成为很大的特色。天皇制国家建立伊始，就面临国内农民的反抗和失意士族的叛乱；另一方面又苦于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压力，在整备残酷镇压民众体制的同时，竭尽全力加强军队，鼓吹军国主义。明治初年的富国强兵政策，以创建中央军队、扶植军事工业为开端，从整顿户籍、义务教育制度、强化警察网、整备交通网、充实官僚机构来看，其中无一不是以建设强大的军事国家为目的的。

在政治制度方面，从未实现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却建成了以天皇为顶点的官僚军事机构的专制政治体制，无论自由民权运动，制定宪法，或者开设议会，都丝毫没有改变其本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成了更加强化天皇制国家的军国主义本性的杠杆。

从世界史角度来看，日俄战争具有宣告帝国主义时代开始的两大帝国主义阵营的代理战争的性质。尽管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还未达到成熟的程度，但由于进行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和扩大殖民地，日本在国际上却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而且，无论在镇压国内民众运动方面，或者在压制殖民地落后国家的民族运动方面，都强烈地暴露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巨大的划时代，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时期确定了侵略中国的方针。可以说，日本由于侵略中国而变为帝国主义，从而确定了不统治中国就不能作为帝国主义存在下去的性质。

国家权力的性质

试看这个时期的国家机构，根据1889(明治22)年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而确立的天皇制专制主义机构，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天皇总揽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大权，从经议会赞同的立法权、制定和公布敕令、命令权、召集和解散议会权起始，直到制定官制和任免官吏权、陆海军的统帅和编制权、宣战、媾和和签订条约等的外交权、授与荣誉权等种种统治大权，统归天皇一手独揽。国务大臣是由天皇任命的辅弼天皇大权者，只对天皇负责。议会的权限，只有对法律和预算的赞同权，并无自主权。而且，在两院制的议会中，贵族院由皇族、贵族以及多额纳税者的代表和天皇任命的“敕选议员”等组成，只有众议院是公选制。众议院的选举权扩大到二十五岁以上的全部男子，是到了1925年才施行的。

作为这样天皇的强大权能的执行机关，设有庞大的官僚机构。以不许议会和内阁干预的军事、司法机关为首，由一百万名的官员、军人、警察组成了强大无比的统治人民的体制。

另一方面，国民的权利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几乎连基本人权、政治自由都得不到保障。宪法中规定：日本国民被称为“日本臣民”，应拥戴天皇，“扶持国家的进展”。“臣民”的权利，完全局限于“法律范围之内”。无论是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还是思想、信教的自由，都根据法律受到严格的限制。日本有各种各样的反动法律，如取缔言论自由的出版法(1893年)和新闻法(1909年)；保障官宪有权进行拘留、搜查住宅、强制处分等的行政执行法(1900年)；取缔政治结社、镇压集会、群众运动和争议行为的治安警察法(1900年)等等。特别是在1925年制定的、并于1928年把最高刑改为死刑的治安维持法，对于组织以变革国体或否认私有财产制为目的的结社，以及加入这样的组织、或为此而进行商议、或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一切行为，均予以严惩，完全是一种镇压思想的法

律。

为担任镇压这种思想而设立的是特高警察，以内务省警保局保安科为其上层机构，全国布满了特高网。而且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把思想统制列为首要任务，还建立了官办的各种各样的教化团体和动员组织。以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为主的社会运动，不得不在极端严酷的情况下进行斗争。

这样统治民众的专制机构，已经占据统治阶级的中枢部分，为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垄断资本起了统治民众机构的作用。财阀加紧与官僚、军部、政党相勾结，特别是对天皇制统治阶层中枢的宫廷集团给予巨大的影响，通过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⑦。

1931年的世界

日本帝国主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确定了以侵略中国为基本方向，这既使它走上了与中国以及亚洲的民族运动为敌的道路，又使它走上与美英帝国主义的对立趋于激化的道路。在英、美庇护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从此以后就不得不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另外，在大战中迅速发展起来的日本经济，战后一变而陷入慢性的不景气状态中，轻易也不能从战后危机、震灾危机、金融危机等持续的危机状态中摆脱出来，逐步加深了危机。

1929 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直接袭击了处于这种状态的日本。从战后危机摆脱出来、高唱相对稳定时期繁荣的美国，以1929年 10 月 24 日的“黑暗的星期四”的股票暴跌为契机，遭受了空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袭击。美国这种危机，从 1930 年后半期越来越严重，席卷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历史上空前的规模和内容继续扩展起来。这次总危机不仅波及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波及到后进国家和殖民地；不仅袭击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工业部门，而且在农业部门方面也大逞其淫威。

到了1931年中期，欧洲金融危机的加剧，使这次危机更加深化。1931年5月，从奥地利银行破产开始，以德国为中心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到9月21日，英国终于停止了金本位制，从而资本主义世界的金本位制崩溃了，世界贸易陷于麻痹状态。总危机漫无止境地持续发展。

这次总危机的特征，不仅长达四年之久，而且它的破坏力也很厉害。工业生产的下降率比以前任何一次危机都大，就1932年的整个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为危机前的二分之一，1933年仅在美国就出现了一千五百万人的失业者。1933年的世界贸易总额减少为危机前的三分之一。危机的结果，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中间阶层没落了，工人失业充斥街头，农民贫困放弃土地，引起了严重的社会不安。

还有，这次危机的特征之一，还可指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严重受害情况。农业危机特别严重，以栽培单一作物为特色的殖民地农业所遭受的打击更为深重。再加上帝国主义国家和封建统治者的疯狂掠夺，致使殖民地的农民丧失土地，到处流浪，饿死了无数的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经济崩溃，使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体制摇摇欲坠。

没有遭受这次严重危机影响的，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成功中取得了进展，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值降低到二分之一的四年期间，苏联的工业产值却提高到两倍。这就更加激起了帝国主义各国对苏联的憎恨和反感，使帝国主义国家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加激化。

总危机下的亚洲与中国

总危机也不能不给亚洲各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因为资本主

义国家要把危机的灾难转嫁给殖民地和附属国，企图以牺牲它们来摆脱本国的危机。另外，以农业为主体的殖民地经济，由于被迫推行栽培单一作物因而对危机的抵抗力特别软弱。当危机一激化起来，亚洲各地的农业就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丧失土地的农民集中到城市，使最贫穷的城市下层阶级更加增大。因此，在亚洲各地，暴动和群众蜂起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大大震撼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体制。

在中国，危机的影响也很深重。再加上这时正在激化的内战，加深了国内经济的混乱和群众的饥苦。蒋介石军事独裁下的国民政府，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暂且统一了中国，但由于大大小小多次的内战，国民政府的军费开支竟达每年总预算的百分之九十。由于重税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一般群众的生活陷于最穷困的境地。

蒋介石在这种形势当中，集结军事力量，一味进攻中国共产党。1930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军，在江西、福建省边界地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而蒋介石从 1930 年 12 月开始，集中力量向这个苏维埃地区发动了进攻。当第一次“剿共”战争失败后，又于 1931 年 5 月发动了第二次“剿共”，这次也是以完全失败而告终。正在进行第二次“剿共”战的 5 月末，汪兆铭、李宗仁等反蒋派联合起来，在广东建立了国民政府，与南京的国民政府对抗。但是，蒋介石把“剿共”放在首要地位，1931 年 7 月，亲自率领三十万大军开始了第三次“剿共”。日本开始侵略“满洲”⑧，就是在这第三次“剿共”中进行的。

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

从明治时期确立天皇制国家以来，日本一贯继续执行侵略中国的政策。尤其“满洲”与朝鲜接邻，曾经是甲午、日俄两次战争的

战场，因而成了日本大陆政策的中心目标。可以说，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本身，就是和"满洲"的殖民地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这个时期的"满洲"是一个最大最重要的市场，是一个半殖民地。在1930年末，日本对于"满洲"的投资额相当于日本全部对外投资的百分之七十，达十七亿五千万日元。日本资本输出的绝大部分之所以集中于"满洲"，并不只是由于经济上的理由。从这项投资中得到的利润率极低，在受到总危机影响的1930年度，只不过是投资额的百分之四点一。这项投资的真正目的，毋宁说在于想把"满洲"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和独占市场的政治和军事方面。

在进出口方面，"满洲"所占的比重并不那么多，进口方面为总额的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出口方面为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九。作为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的意义倒很大，作为一个出口市场，主要期望把"满洲"变成独占的潜在性的出口地。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把"满洲"当作原料、资源的供应基地和独占市场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数字所表现的。

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满洲"的控制，从1920年代后半期开始发生了颇大的动摇。原因是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的民族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29年，国民政府初步完成了中国统一以后，在"满洲"方面，从帝国主义手里收回利权的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也日益激化，引起了许多纠纷事件。

世界经济危机对于以生产原料大豆为主的商品性单一作物的农业地区的"满洲"经济，也给予了严重影响。大连的大豆批发价格指数，以1929年10月为一百时，1930年10月则暴跌为六十三，1931年10月则暴跌为四十四。工业危机也很严重，属于日本系统的主要企业三十一家公司中，1932年5月当时，分红的公司为十一家，其他都是因亏损无红利可分，除一家公司外，股票价格均

降为实缴额以下。日本最大的国外企业、以皇室和垄断资本家为大股东的满铁的营业成绩也急剧恶化，其铁路收入1929年为一亿二千二百一十万日元，1930年激减为九千五百三十三万日元，1931年又减为八千五百四十七万日元。

满铁的业务衰退，除了危机影响之外，政治上的原因也很大。随着中国民族运动的高涨，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实行了对抗满铁垄断的铁路政策。一方面拒绝日本修筑新铁路的要求，另一方面制定了修筑中国独自的铁路计划，即修筑所谓“包围满铁线”，威胁了满铁。

日本帝国主义控制“满洲”地位的这种动摇，使日本统治阶级、特别是军部和垄断资本家感到危险。在“满洲”的资本家和驻军尤其感到面临一场重大危机，是当然的。

① 日本根据1902年“关于人口普查的法律”，在1920年进行了第一次普查。按规定，每五年进行一次简易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正式普查。1930年的普查是第三次人口普查，作为正式普查算是第二次。普查的项目是：国籍、性别、年龄、家庭出身、职业、职位，以及按府、县、市、街、村的上列各项等，并提出了大部头的详细报告书。普查的摘要刊载于内阁统计局每年出版的《日本帝国统计年鉴》。本书是从1931年出版的第五十次到1935年出版的第五十四次的《统计年鉴》中引用的。

② 关于农家户数、耕种面积、自耕兼佃耕的区别等，根据1929年农业调查令（敕令），于同年9月进行了调查。另外，从1894年起，农林水产统计是由农商务省编制的。本书则引自根据每年的“农林省统计表”而编制的《日本帝国统计年鉴》。

③ 日本的工厂统计，是1909年由农商务省编制的，后来每年都编制工厂统计表。本书引自该《统计年鉴》。

④ 工会会员人数根据《劳动统计要览》。后来，会员人数仍然不断增加，1934年达到战前最高额，但也只有三十八万五千人。

⑤ 大桥隆宪编著《日本的阶级构成》（岩波新书，1971年版）第26页。另外，因为在这个统计中，关于农民渔民、工商业自营者用户数表示，其他则用人数表示，因而还不能算是严密的构成，但能了解阶级构成的概略。

⑥ 江口圭一：《城市小资产阶级运动的研究》（未来社，1976年），是把中间阶层当中、特别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动向作为问题进行研究的。其中第五章的“总危机时期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以这个时期为焦点，说明了在危机中濒于没落危机的城市零散工商业者，虽然表现出要按照独自的民主要求而团结起来，但因“九·一八”事变的爆

发而拘泥于排外主义，便日益变成法西斯主义的基础。

⑦　尽管这个时期的日本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因专制主义的军部官僚拥有强大的独特性，关于怎样分析国家政权的性质，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如星埜惇主张：当阐明国家权力的变质时，应该以国家机关的演变、特别是应以其中枢的官僚制的演变为标志，见《社会构成演变论序说》(未来社，1969 年)；中村政则主张：应将表示国家阶级本质的国家类型与国家形态上的特点加以区别，来论述近代天皇制的成立，见《近代天皇制国家论》(《日本国家史大系，近代Ⅰ》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 年所载)，都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见解。

⑧　"满洲"这一称呼，是当时日本人指中国东北的一种称呼。在当时的中国行政区划上，属于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的三省地区，在中国称为东三省或东北三省；有时也只称东北，或古地名称满洲。而日本所说的"满洲"，其范围并不严密，有时指上述的三省，有时也把热河省包括在内。

另外，当时也用"满蒙"这个称呼。"满蒙"的范围更加含混，有时用作除上述东三省外，再加上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的内蒙古地区的总称；有时只指东三省和热河省；还有时指的更宽，包括内蒙古、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地区)在内的"满洲"和蒙古全部。

这里所称的"满洲"，是按照当时日本的称呼，即指后来作为傀儡政权而建立的"满洲国"的范围。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

第一节　十五年战争的开端

“满蒙”问题与战争宣传

滨口内阁试图以解除黄金出口禁令和生产合理化来改善日本资本主义体质的政策，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直接打击而趋于破产，1931年前后的日本陷入了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之中。另外，甲午、日俄战争以来的侵略果实——对“满洲”的控制，也由于经济危机的波及和中国民族运动的发展而受到威胁。此刻在日本国内，由军部、右翼带头展开了煽动“满蒙危机”和鼓动战争狂热的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为了把生活上的困窘和社会不安引向战争这条出路，强调有必要以武力来确保控制“满洲”的这种宣传，对于经济危机下的日本社会产生了一定效果。①

1931（昭和6）年7月1日至2日，在中国东北的吉林省万宝山发生了朝鲜移民中的农民与中国农民、官宪冲突的万宝山事件。②从第二天的3日起，在朝鲜各地发生了袭击中国人的报复性暴动。这次事件的原因在于，朝鲜人无法忍受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残酷统治而成为难民，大量移住到接邻的“满洲”。日本领事馆的警察一方面把住在“满洲”的朝鲜人作为准日本人对他们进行思想控制；另一方面为使其扮演侵略尖兵的角色而加以保护。围绕着土地和水利权，朝鲜农民和中国农民之间多次发生对立，而且中国人认为以日本武力为靠山的朝鲜人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而予以敌视。尽管双方的农民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但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对立。

日本的官宪和新闻界，为了把朝鲜人对残酷的殖民地统治的不满转移到旅居朝鲜的中国商人身上，利用万宝山事件，大肆宣传中国人杀害了朝鲜移民。结果，在朝鲜各城市发生了朝鲜民众袭击中国商人的报复性暴动。对朝鲜民众的集会和示威游行一向采取彻底取缔方针的朝鲜总督府及其管辖下的警察，对这次暴动却袖手旁观，对于一百多中国人被杀害却放任不管。在日本国内，对这一事件也作了煽动性的报道，宣传说中国官宪压迫朝鲜人，成了煽动排外热潮的宣传材料。

8月17日，发生了中村大尉事件，③被利用来为加紧煽动敌视中国的宣传材料。原来，中村大尉是改穿便衣隐瞒军人身分而进行间谍活动的。但日本却隐瞒了这个事实，发表说现役的日本军官被中国军队杀害了。这一事件被当作日本军队的威信遭到它一向轻视的中国军队的伤害，作为加紧煽动排外主义的材料，超出万宝山事件之上。

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越发使军部和右翼大肆煽动起“满蒙”危机来了。在满铁的援助下，由其职员和侨民中的青年组成的“满洲”青年联盟，组成打开“满蒙”时局的祖国访问团，从7月到8月，来到日本内地，访问报社、出版社，在各地召开讲演会，狂热地宣传生命线“满蒙”的危机。④各地的陆军军官也利用讲演会或在乡军人点名等各种机会，提出“满蒙”问题，煽动战争热潮。甚至有的部队用飞机向各城市散发传单。⑤

在野党的政友会对军部也不示弱，主张强硬论，用来作为攻击政府的材料。这时，正在准备9月的府县议员选举，各地都进行着紧张的选举运动。政友会的各支部在选举前的地方大会上，都激烈攻击政府的“软弱外交”，举行主张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演说或通过决议。犬养毅总裁、森恪干事长也到各地进行宣传，主张“排斥软弱外交”，扮演了宣传战争的重要角色。⑥

8月初，陆军按惯例召开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4日，陆相南次郎的训示，对这种会议来说，破例地抨击了外部的言论，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他就改革军制攻击裁军论说："处于不负责任的地位以至不甚关心国防的人，动辄认为军部无视国家的现状，竟提出无理要求，或不了解周围的形势，妄图鼓吹裁减军备，宣传不利于国家和军队的言论的人，不在少数"。还有，关于"满蒙"问题，他认为"事态的严重化"是"长期持续的现象"，所以，他激励军人说，此刻"应益愈竭诚奉公，竭尽热诚于教育和训练，以期随时准备尽军人的天职"。⑦

陆军出来积极进行战争宣传是有其理由的。解决"满蒙"问题，即为了确保"满洲"这块殖民地，有必要行使武力的意图，在1930年末参谋本部的《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中已经表示出来。陆军中央部在1930年6月制定的《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就是以此为陆军的方针而加以具体化的。这个大纲是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为委员长，参谋本部的编制、欧美、中国、陆军省的军事、补任等五个科长为委员秘密设立的委员会制定的。其内容是，认为要阻止"满洲"的排日行动，"势必将要采取军事行动"，并由于"要解决'满洲'问题，取得国内外的理解是绝对必要的"，所以，要开展让全体国民都知道"满洲"实情的活动，并确定了以今后到来年春季为止的一年为期，进行这一活动的方针。⑧

阶级斗争尖锐化

围绕"满洲"的战争宣传，正在大规模展开的1931年夏天，也正是在深化的经济危机当中进行激烈阶级斗争的时刻。1930年，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而陷入严重困难的日本经济，还由于这年丰收农产品价格暴跌而陷入深刻的农业危机之中。在城市充满着苦于工资降低的工人和失业者，在农村则因农产品价格空前暴跌，农

民的贫困无法形容。

在严重经济危机中，被逼到生存绝境的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只能日趋尖锐化。劳资纠纷在加强镇压的情况下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形式，尽管在同警察、右翼团体的对抗中出现了多数受伤者和被捕者，斗争仍继续着。租佃纠纷也以中小地主为对象展开了深刻的土地斗争。

由于接连不断的镇压，共产党、劳农党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左翼工人运动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群众的贫困化致使自发的纠纷连续出现，而一旦被迫采取激烈的斗争形式，则不论政治运动或工人运动，都只能走向革命化的道路。在这种形势下，展开了反对即将迫近的战争危机的斗争。

在严重经济危机下加强镇压和群众斗争尖锐化的形势之中，无产阶级政党这时反复出现了分裂和对立。由于干部害怕镇压而右倾和基层群众在恶劣生活条件下的左倾，反复出现了所谓“四分五裂”的分裂。但是，在艰苦斗争当中，不能忽视期待实现统一战线的群众呼声。1931年7月，实现了由左派的劳农党、中间派的全国大众党和右派的社会民众党分裂出来的“三党联合实现同盟”的“二党半联合”，组成了全国劳农大众党。但是因为这个联合是排除了最左翼的共产党派系而实现的，强制农民的统一组织——全国农民组合支持新党，这就造成分裂全农全国会议派的原因，反而造成了阻碍形成统一战线的主要原因。

共产党在“三・一五”、“四・一六”的大镇压下，干部丧失了一半，后来采取极左的斗争战术更加深了这种创伤。1931年1月，重建中央部，重又发行《赤旗》报，着手党的重建工作。恰在此时，从1931年6月开始，对“三・一五”和“四・一六”检举的二百八十名共产党员一齐进行公审。狱中的共产党干部以这次公审作为斗争的讲坛，为让国民了解党的形象而进行了斗争。狱外的风

间丈吉、岩田义道等新指挥部，一面为克服极左冒险主义而努力谋求党的大众化，一面察觉到战争危机追近而号召与之进行斗争。1931年7月6日的《赤旗》报，刊登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准备而斗争！”的消息，号召“一分钱的军费也不出！一个士兵也不送！”在7月29日的版面上，关于万宝山事件指出这是日本正在准备占领“满洲”，号召国民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斗争。

但是，察觉到即将追近的战争危机而强烈呼吁与此进行斗争的，只有地下的共产党。在尖锐化的阶级斗争中，很少有人正确提出战争还是和平这一最关键的问题。但是，这时的共产党受到共产国际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的影响，敌视一切社会民主主义，没能掌握为反对战争而保卫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战略，日益加深了孤立自己的局面。

柳条沟事件

1931年9月18日午后十点多钟，关东军在沈阳郊外柳条沟附近亲自动手炸毁满铁轨道，而把它说成是中国兵干的，立即对附近的中国兵营北大营发动进攻，同时在“南满洲”一带开始了军事行动。这就成了历时十五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开端。

炸毁柳条沟铁路，是为发起军事行动制造借口而事先策划的谋略的一部分。⑨早在1927年的东方会议上，就由关东军提出了以武力占领“满蒙”的计划，1928年的炸死张作霖事件原是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等想乘此机会发起武力行动的阴谋。这个计划遭到挫折之后，1928年10月，石原莞尔中校担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翌年1929年5月，板垣征四郎大校一当上关东军高级参谋，就以他们两人为中心开始拟定更加具体的占领“满蒙”的计划。1929年7月，为了研究关东军的对苏作战问题组织了参谋旅行，途中石原

提出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和《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解决"满蒙"问题方案》。[10] 关东军根据这个方针，继续研究占领和统治"满蒙"的问题，1930 年 5 月，归纳为《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11] 这样，由关东军占领"满洲"的趋势日益增强，1931 年 5 月，石原在以《"满蒙"问题私见》[12] 为题的手记中主张：为了占领"满蒙"，要用武力行动迫使国家跟着走，而这种机会要用策略来创造。柳条沟事件就是根据这种策略创造的机会。

在关东军参谋的计划方面，原大尉甘粕正彦（关东大地震时杀害大杉荣、伊藤野枝夫妻的凶手）等大陆浪人也参与策划，分担了在各地搞袭击日本人等阴谋来制造出兵借口的角色。同时，驻朝鲜日军参谋神田正种中校等也是他们一伙，为了补充关东军的兵力，作好了出动驻朝鲜日军的准备。还有，在军的中央部中，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该部的中国科长重藤千秋大校、中国班长根本博中校、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校等也参与了这一阴谋。板垣和花谷于 8 月中旬赴东京与重藤、桥本等进行磋商，并接受了搞阴谋的资金。到了 9 月，关东军即将采取军事行动的风声传开了，在 9 月15日内阁会议上，外相币原喜重郎质问了陆相南次郎。于是，军中央派遣建川到当地去调查实际情况，可是建川等经商议后给当地拍电报说：计划已经暴露，要提前开始行动。原来预定在 9 月28日左右开始的行动便提前十天在建川到达的那天夜里开始了。[13]

"南满洲"的占领

当柳条沟铁路刚一炸毁，逗留在沈阳的高级参谋板垣就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沈阳附近的部队进攻沈阳城以及北大营。驻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根据石原参谋的献策，本庄繁司令官于19日上午一点半，命令关东军所属部队向沈阳方向集中兵力，占领

营口、安东、风凰城，并准备进攻长春，请求驻朝鲜日军增援。这些都是板垣和石原预先准备好了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和参谋长三宅光治都不知道这一阴谋，一听到事件的报告，便按照石原的意见作出了决断。⑭关东军司令部立即从旅顺向沈阳迁移。

司令部设在辽阳的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立即奔赴沈阳，到19日中午占领了沈阳及其附近的中国兵营。营口、安东、凤凰城则由独立守备队占领了。在长春，中国军队猛烈抵抗，战斗持续了19日一整天，日军死伤一百四十五名。这样，在9月19日这一天，“南满洲”铁道沿线的主要城市全被日军占领了。

接到关东军请求增援的驻朝鲜日军，立即命令飞行二中队和混成一旅团准备增援，在19日上午，开始用铁路运输增援部队。

19日上午一点多钟，事件的第一次报告到达东京。从当天早七点起，陆军中央部商讨对策，根据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这次关东军的行动，全都是恰当的”的意见，着手准备向关东军增加兵力。当天从上午十点起，召开了内阁会议，当陆相南次郎刚一说明这次事件，外相币原就报告了外务省得到的情报，其内容暗示这次事件完全是由关东军策划的阴谋。因此，南陆相没能提出增加兵力的方案，内阁会议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而这次会议既没有为不扩大方针规定什么具体的措施，也没有追查陆军的阴谋。当首相若槻礼次郎就“中国其他地区日侨的危险”，向海相安保清种寻问海军的准备情况时，海相回答说，在佐世保准备了一千五百人陆战队，好象事件的扩大已在预期之中。⑮

驻朝鲜日军出兵“满洲”，事属向国外出兵，为此必需有内阁会议的承认和天皇的命令。⑯于是，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向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拍电说：“增援关东军一事，在奉敕命令下达之前，希暂停止”，并把这一宗旨通知了旅团长和新义州国境的守备队长。

按关东军的计划，必需出动驻朝鲜日军。于是，策划使第二师团出动到满铁沿线以外的吉林，造成“南满洲”兵力不足的局势，以便把驻朝鲜日军强拖进来。为此，按照吉林特务机关和甘粕正彦等浪人的策略，向日本人房屋扔炸弹，由自己造成不稳的形势。然后，9月21日下令出兵吉林。驻朝鲜日军看到这种情况，决定擅自越境。事件波及到满铁沿线以外，日军占领了整个“南满洲”。

在9月21日内阁会议上，陆相南次郎主张必须从朝鲜向“满洲”增兵，可是除了首相若槻以外，没有人对此表示同意，参谋本部十分焦虑。正在这时，突然收到了驻朝鲜日军的增援旅团已越过国境的电报。驻朝鲜日军司令官擅自出兵，显然是干犯天皇的大权，于是参谋本部出现了“有必要研究大臣和总长的辞职问题，并在悲壮的决心下进行了各种准备”的紧急事态。而陆军中央部不仅不责备驻朝鲜日军违反以前的命令，反而要使政府承认既成事实，以收拾事态，并以陆相和参谋总长的辞职来威胁政府。然而，在22日内阁会议上，竟出乎陆军意料之外，全体阁员没有表示不赞成的。于是决定既然已经出动了，就承认这个事实，既然承认了，就支给经费。首相立即把这件事上奏天皇，接着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奏请驻朝鲜日军出动的命令和与此有关的事项，取得了天皇的批准。

这样，在出兵之后颁发出兵命令，用来蒙混过去，把干犯天皇大权的问题竟不了了之。如果政府要制止陆军的独断独行，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好的材料，可是，内阁也好，天皇及其亲信也好，都没有提起这件事。

十月事件

正当“满洲”战火扩大的时候，又搞出了类似三月事件的武装政变计划。参与关东军战争挑衅计划的中央的樱会急进派，即以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校为中心的参谋军官们，策划通过

武装政变组织军部内阁，一举断然实行国内改造。参加者有右翼的大川周明一派，北一辉、西田税一派，以及与北一辉、西田税有联系的青年军官集团等，预定以在东京的步兵十个中队、海军的航空队等为执行计划的部队。策划于十月下旬袭击在首相官邸召开的内阁会议，杀死首相以下各大臣，占领警视厅、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迫使军中央承认政变，组织军部内阁。甚至在准备好了的名单中，有预定以在革新派军官中有声望的教育总监部本部长荒木贞夫中将为首相，桥本为内相，大川为藏相，建川为外相，桥本的同伙长勇少校为警视总监。

这个计划与三月事件相比，由于实际上掌握部队的青年军官参加进来而更具有具体性，袭击的计划等与后来的二·二六事件一样，拟制得很周密。但是，参加者的范围广泛，各种各样的野心和企图交织在一起，行动以后的计划不够明确。并且，中心的幕僚军官们以政商藤田勇等提供的丰富资金，竟整天整夜地流连在高级饭馆和酒楼里，以维新志士自居。认为这种行动不够谨慎的青年军官背离了他们，加上情报传到了皇宫等，桥本等人失去了坚决执行的意志，军中央拘留了首谋者，防止了事件的发生。

这次事件和三月事件一样没有人受到处分，军方对这次事件从宽处理，只给几名首谋者以行政处分，而把事件暗中掩蔽起来。这就成了后来军部不断搞武装政变计划的原因。

十月事件虽然隐蔽下来，但因风声传开使政界受到很大冲击。在军部政变的威胁下，宫廷、政界都害起怕来，再也没有对抗军部的力量了。不仅对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不进行积极的追究，反而一昧屈服于军部的主张。而且不仅军部，连政府也封锁事件的消息，完全不让国民知道。因此，同样的事件接连不断地策划起来，加速了走上法西斯的道路。

政党不仅不追究破坏议会政治的武装政变，反而开始策划勾

结军部以便获得政权。在野党的政友会反对若槻内阁的消极政策，支持占领“满洲”，主张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在民政党的内部，安达谦藏内相等人也与政友会串通一气，发起联合内阁运动，呈现出加速更换政权的动向。安达事先根据警察情报得知十月事件，并通过中野正刚加深了同右翼和革新派军官之间的关系。

犬养内阁

这时世界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当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即9月21日，英国脱离了金本位制。这件事给予世界经济以很大的冲击。滨口内阁所采取的解除黄金出口禁令的政策显然行不通了，一般认为日本必然要再次禁止黄金出口，便出现了大量抛售日元、抢购美元的情况。政府虽想以外运黄金来对抗预测再次禁止黄金出口的投机，但抢购美元的趋势并没有止境，抢购美元总额已达七亿六千万日元，其中心是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财阀。这就招致了右翼和军部的反感，认为这是财阀贪图暴利的背叛国家的行为。可见垄断资本家也预料到会出现政策的转变和政权的更迭。

由于若槻内阁在政治、经济两方面的束手无策和军部政变的恐怖，天皇周围的宫廷集团也开始考虑更换政权。[17]元老西园寺公望认为若槻内阁难以度过议会难关，便开始考虑举国一致内阁。在这种形势下，安达的联合内阁运动就动摇了若槻内阁，若槻于12月11日以阁内意见不一致为理由实行了总辞职。

西园寺对于天皇的咨询，因知道政友会和民政党两党首领都反对联合内阁，便推荐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为后任首相。犬养内阁跳过陆军内部的排列顺序，选任革新派荒木贞夫为陆相，并以主张强硬外交的森恪为书记官长，于12月13日组成。

犬养内阁组成的当天，就发布再次禁止黄金出口的禁令，使抢

购美元的财阀攫取了莫大的利益，并积极支援军部的占领“满洲”政策，抛弃前内阁的通货紧缩政策，改行通货膨胀政策。从解除黄金出口禁令到再次禁止黄金出口，从通货紧缩政策到通货膨胀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在政党政治中，认为基础没有多大差别的日本两大保守党——政友党和民政党，从来没有执行过这样截然不同的政策。这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呢？

滨口、若槻的民政党内阁两年间实行的紧缩合理化政策，可以说是为了摆脱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危机，采取果断的措施，以便改善资本主义体质，获得国际竞争的能力。也就是通过强行通货紧缩和合理化政策，来整顿半封建的农业、中小企业和零散企业，并且依靠确立垄断资本的统治力量来改善资本主义结构本身，然后以振兴出口来摆脱经济危机。这个政策所具有的性质是，以牺牲工人、农民和中小零散工商业者，来克服垄断资本的危机。这个经济政策是用“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口号，以将来的期望欺骗民众，忍耐当前的痛苦，给民众带来了非常残酷的结果。失业者增多，中小零散工商业破产和农民生活日益悲惨的结局，必然使阶级斗争尖锐化，加重统治阶级的危机感。

另一方面，强制推行这种政策，必然直接受阻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在总危机日益深化和金本位世界体制陷入崩溃的这种现实面前，合理化和扩大出口的方向是没有指望的。于是，在这两年间取得了初步成果，即整顿中小企业和半封建的农业，完成垄断的进展之后，想改变政策，促进其向以军需产业为中心的通货膨胀政策方面转换，以摆脱经济危机。而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世界金本位体制的崩溃，恰好成了这种转变的最好杠杆。并且，这种转变还具有这样重大意义，即把民众在生活遭到破坏下所郁积的、可能成为革命动力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对外战争方面去。

由于犬养内阁是以少数执政党为基础的，所以当然要举行大

选。1932年1月21日，在复会后的国会上，刚刚作了施政方针演说之后，就解散了众议院，2月20日，举行了第三次普选的大选。政友会攻击民政党经济政策的失败，以“克服不景气”为口号进行选举，取得了议会史上空前未有的多达三百零三个议席，而民政党减少一半，只得到一百四十七个议席。⑱ 犬养内阁就这样以绝对多数席位为后盾，同军部结合起来走上了推行战争和通货膨胀政策的道路。

① 关于统治阶级叫嚷“满蒙危机”的舆论工作和迎合这点的报界拼命奔走，以及由此将大多数国民统一到排外主义的过程，可参考江口圭一著《日本帝国主义史论》、青木书店1975年版所收集的论文；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I》，（青木书店1971年版）。

② 1931年4月，朝鲜移民中的农民为了逃避日本军警的镇压和中国官吏的压迫，从朝鲜移民集居的吉林省东部延边地区，迁移到长春西北的万宝山。他们开始修建灌溉用的引水渠和伊通河的拦水坝。可是，没有同中国农民签订引水渠用地的租借合同，而且中国农民又担心上游会发生洪水，因而反对施工，破坏水坝，填平了引水渠。日本派遣用机枪武装起来的警察队，强行保护施工，7月1日至2日，同中国农民、中国警察发生了冲突。在两天的冲突中，朝鲜农民没有死伤者。但中国农民方面则有受伤者，可是，朝鲜各地的报纸却散布谣言说很多朝鲜人负伤，煽动暴动。

③ 参谋本部职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为了调查预定作为对苏作战战场的兴安岭方面的军事地志，带领井杉延太郎上士，来到洮南和索伦地区。该地区禁止日本人旅行，他们便化装为蒙古人，但被当地的屯垦军抓住，6月27日杀害了。7月中旬，日本方面确认了这一事实，到了8月17日公开发表了。

④ 关宽治《“满洲”事变前史》，见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I》（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中明确指出，“满洲”青年联盟的宣传压力活动是创造法西斯体制的桥头堡。

⑤ 驻金泽的第九师团以《觉醒吧，注意国防！》为题，印制阐述“满蒙”危机的传单十万张，于9月7日用飞机散发到石川和福井两县管辖下的各个城市（《大阪朝日新闻》1931年9月8日）。

⑥ 森恪于8月视察“满洲”回国后，发表了主张使用武力的强硬的谈话（《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9月1日）。

⑦ 御铃书房：《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149页。

⑧ 同上书，第164页。

⑨ 柳条沟事件的计划是从“昭和6（1931）年春季”制定的。制定这个创造机会占领“满洲”的计划的中心人物是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校，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

郎大校支持了这个计划。直接担任炸毁并制定计划的是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校，此外还有张作霖的军事顾问辅佐官今田新太郎大尉、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驻沈阳郊外虎石台）的中队长川岛正大尉，以及该中队队副河本末守少尉等人。川岛大尉在这天夜里以演习为名出动了中队，在附近待机，河本少尉一爆炸，中队立即袭击了北大营（花谷正《"满洲"事变是这样计划的》、《附册知性12——秘密的昭和史》1956年版，第42页）。

⑩ 两个方案是作为石原方案提出来的，"解决方案"是只领有"满蒙"，把"满蒙"作为领土以便对美国进行持久战而取得胜利的宏伟计划；"而领有计划，是统治"满蒙"的具体方针"（《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附册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86页）。

⑪ 同上书，第91页。

⑫ 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67年版，第76页。

⑬ 关于为了制造占领"满洲"机会的策划，关宽治的前引论文作了阐明。花谷正前引论文是参与这个策划的当事人的自白。

⑭ 臼井胜美《"满洲"事变》中公新书，1974年版，第42页。

⑮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与政局》第二卷，岩波书店，1950年版，第63页。

⑯ 关于出兵国外，需取得内阁会议承认支出经费和下达奉敕命令。因此，驻朝日军司令官的措施被认为是擅自出兵，所以在参谋本部内也有这样的意见："已经开始行动的航空队，无论如何也要赶快纳入天皇大权发动之下，否则不仅会打乱统帅指挥权的系统，而且会造成使驻外军宪遭受越权之咎的原因"（《关于驻朝日军司令官擅自出兵和中央部对此所采取的措施》、《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428页）。

⑰ 11月7日，原田熊雄、木户幸一、伊藤文吉集聚在近卫文麿家里，四人计议说，"现内阁，特别是总理大臣实在懦弱，根本没有肩负此难局而度过下次议会的希望，并认为需要创造一个机会来策划扭转政局"（《木户幸一日记》上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111页）。与此同时，牧野伸显内大臣向西园寺透露他对总理的不满、希望有个强有力内阁的心情（原田，前引书第2卷，第114页）。

⑱ 根据决定当选时的议席数。

第二节　五·一五事件

上海事变

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中国各地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特别是在中国第一个大工商业城市上海，学生、市民、工人等组织的抗日救国会的活动很活跃，这就使日本侨民、海军陆战队之间的不安气氛高涨起来。1932年1月28日夜晚，以日本海军陆战队同中国

军队的冲突为开端，在上海开始了激烈的战斗。这次上海事变的直接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日本殖民地资本、当地侨民、驻在上海的军部和政府机关，对中国抗日民族运动怀有危机意识和反感。上海是日本对中国实行经济扩张的最大据点，以银行、厂商为首的日本企业的许多分社集中在这里，日本系统的纺织业仅在上海就有三十所工厂，纺锭达一百五十万，日本侨民达三万人之多。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国民众反对帝国主义民族运动火上浇油，这样一来，侨民团便组织自卫团来武装自己，一再同中国人发生冲突，因而强烈要求本国派遣军队。日本资本主义想用武力来维护其投资场所和输出商品场所这个中国市场的态度，成了发生冲突的原因。

第二，必须指出的是，日本海军对于长江流域地方持有的特别权利思想和强硬态度。当九·一八事变之际，海军不同意行使武力，拒绝了陆军方面的派兵要求。但在长江方面，却独自增强了兵力。① 为了对抗陆军在“满洲”行使武力取得成功，海军打算在它的势力范围上海发起军事行动。

第三，还必须指出的是，同九·一八事变的情形一样，由陆军的中坚干部用阴谋挑起了战事。驻上海的陆军武官田中隆吉少校为使“满洲”建国取得成功，以“转移列强的视线”为目的，用钱收买无赖流氓，于1月18日杀死了日本僧侣。②

以日本僧侣被杀事件为理由，上海的日本侨民袭击了肇事地点附近的中国工厂，杀伤了中国警察，并在1月20日召开侨民大会，做出要求出动陆海军的决议，还一再同中国方面的官宪挑起冲突。受到从日本内地增援兵力的上海海军陆战队，于1月28日夜里开始行动，在租界外的北四川路同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

海军陆战队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陷于苦战。因而海军

在2月2日派来新编第三舰队，同时要求陆军增援兵力。陆军在2月7日派一个混成旅团为先遣部队，从2月13日起派遣一个师团到上海，但又遭到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继续激战，日军没能从海岸向前挺进。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虽然是地方军阀的军队第十九路军，但因受到上海抗日运动的影响，还有许多工人和学生作为义勇军参加到这支军队中来，所以尽管装备很差，却使日军大吃苦头。

因没想到的苦战而惊慌的日本陆军中央，又增派了两个师团，编成上海派遣军，并于3月1日在中国军队背后登陆，这才勉勉强强打开了战局。

与"满洲"的情况不同，在列强各国的经济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上海，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当然要招致它们的干涉。英、美、法都对日本的军事行动提出警告，英国把它的东洋舰队旗舰开进上海港，并让两军在这艘军舰上进行停战谈判。国际联盟也从3月3日把这个纠纷列入了大会议程。由于这些国际压力，和战斗的艰苦，日本也急想停战。3月3日，陆军发表声明停止战斗，由有关四国代表参加会谈结果，5月5日达成决定日本撤军的停战协定。

上海事变，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次重大失败。第一，这是轻视了中国民众和军队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觉悟和强大抵抗力的结果；第二，这时日本还没有不顾列强帝国主义的利益而强行侵略的力量；第三，可以指出，无论是从出兵上海本身来说，还是从出兵以后的整个战斗过程来说，陆海军的对立表面化了，造成了失败的原因。但是，为完成占领"满洲"，想转移列强各国视线的陆军阴谋家的策略却取得了成功。

"满洲国"的建立

当列强各国的视线转移到上海事变的时候，在"满洲"由关东

军一手操纵的傀儡国家的建立工作，却在积极进行着。

1931年9月，关东军在占领了满铁沿线的城市和吉林以后，下一个目标则是占领北满。于是把第二师团的主力集结在长春，准备向哈尔滨进发。但是，陆军中央部担心加剧同苏联的对立，对出兵哈尔滨表示消极，指示说：9月22日出兵哈尔滨，没有中央谅解，不得进行。9月24日，指示向满铁附属地集结兵力。但是，关东军从一开始就计划以武力占领整个“满洲”，根本不想遵从中央指示。

1931年10月8日，关东军的空军部队轰炸了张学良政权临时避难的锦州。这是关东军想把列强各国的注意力转移到辽西，以便占领北满的计划行动。轰炸锦州几乎没有收到什么实际效果，但因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次对城市的轰炸，给予列强各国以巨大的冲击，国际联盟在邀请美国作为观察员的同时，10月24日通过了劝告日本军队在11月16日以前撤退的决议。但在这期间，关东军挺进到了北满。日军所以没有向中国内地入侵，而向北方入侵，是因为从对苏战略观点看来，这里是在英美承认范围之内。10月30日，关东军以修理从四平街到齐齐哈尔的铁路（洮昂线）的嫩江铁桥为名，编成嫩江支队，向齐齐哈尔方面进发，在大兴附近，同马占山的部队发生了冲突。嫩江支队遭到马占山部队的激烈抵抗而陷于苦战，造成了事变以来最大的二百多名的伤亡。马占山只不过是北满国境上的一个旅长，由于阻止了日军的入侵，一跃成了中国的民族英雄。关东军为了一举击溃马占山军，于11月18日出动第二师团，在昂昂溪攻击马占山军，第二天的19日，占领了齐齐哈尔。在这次战斗中，日军死伤了一百八十五人，还有一千人患了冻伤。既能在黑龙江省站稳了脚步，便从1932年1月开始进攻哈尔滨，2月5日占领了这座城市，这样就确保了“满洲”的主要城市和铁路沿线。

关东军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想占领“满洲”作为日本的领土。但在事变开始后，却改变了方针，作为统治“满洲”的方式建立傀儡国家。早在1931年9月中，就准备了“满蒙”独立方案。政府和陆军中央否定了关东军建立新国家的方针。但关东军却硬要贯彻最初方针，在10月21日制定了“‘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③另一方面让残留在“满洲”的张学良属下的军阀头目们组织起地方的独立政权；并于11月10日从天津拉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推行了把他扶植为新国家元首的准备工作。

上海激战正在继续进行，1932年3月1日，由张景惠等旧军阀首领们组成的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成立“满洲国”，3月9日，溥仪就任执政，于是一个新国家出现了。但是，“满洲国”的实权完全掌握在关东军手中，“满洲国”政府的重要职位也由派来的大量日本人充任，完全是一个傀儡国家。

占领“满洲”的意义

傀儡国家的建立，意味着宣布“满洲”完全脱离中国，实质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满洲国”的“独立”，当然是关东军超出政府和军中央部意图的独断。但是，这件事不能说是属于政府和军中央部绝对不能允许的范围。政府只是从对外关系上考虑，对承认“满洲国”一时踟蹰不前，而把占领“满洲”作为既成事实则是它的基本政策。“满洲国”建立后的3月12日，犬养内阁在内阁会议上决定的方针是，目前不予承认，但尽量援助这个新国家，以使将来得到国际的承认。④统治阶级对于关东军的独断独行，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是一致同意了事后承认。下一届的斋藤内阁也继承了这个方针，元老重臣们也没有起来反对。三井、三菱两财阀早在4月就缔结了向“满洲国”提供二千万日元的贷款合同，帮助它建立“满洲”中央银行。“满洲”的殖民地化，也是垄断资本所要求的。

日本整个统治阶层所以决心把占领"满洲"当作既成事实，是有一定理由的。因为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第一，中国这时正陷入深刻的国内分裂状态，因而对于这个严重的民族危机没能表示出一致的反应。1927年国共分裂以来的激烈内战，由于1930年红军在江西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蒋介石发动"剿共"战争面临着深刻的阶段。经过1930年末和1931年5月两次"剿共"战争失败的蒋介石，从1931年7月起，亲率三十万大军开始了第三次"剿共"战争，日本侵略"满洲"正是在这期间开始的。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为方针，对于日本的军事行动采取完全不抵抗政策，始终集中他的嫡系部队去攻打红军。

而东北的统治者张学良，乘1930年秋西北军阀反蒋运动之际，率领主力军进攻关内，相继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地。当九·一八事变时，也尽量保存自己的军队，没有积极抗战。同日军作战的对手，只是残留在"满洲"的素质很差的军阀部队。

再者，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当日本开始侵略时，也没有采取灵活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战术，而是采取了把国民党和中间派都当作帝国主义的爪牙加以攻击的极左路线。因此，中国共产党失掉了以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形式来摆脱民族危机的机会，认为中间派的抗日要求是欺骗群众，而采取了加以攻击的错误战术。所有这些条件，就使得日本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满洲"。

第二，由于日本占领"满洲"而受到直接威胁的苏联，确立优先进行国内建设、执行和平外交的方针，采取了极力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的政策。从1928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克服了种种困难，正在成功地加速工业化进程。因此，苏联害怕资本主义各国再次进行反苏武装干涉的战争，而把维持和平作为首要的外交方针。对日本的军事行动采取了不干涉态度，并把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

约作为外交方针。当日本占领了北满的时候，也没有采取日本所担心的军事行动，而对日本的武装侵略持袖手旁观的态度。

第三，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的绥靖政策，也成了日本进行侵略的有利因素。席卷全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在日本开始侵略时，处于最深刻的状态。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为国内危机所困扰，根本没有干涉远东问题的余力。它们甚至对袖手旁观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而继续发展经济的苏联深怀敌意，内心欢迎日本占领“满洲”，认为这是对苏军行动的第一步。

这些有利条件，与日本统治阶层事前的担心相反，容许日本轻而易举地占领“满洲”。国际联盟通过的谴责日本的决议，是欧洲多数小国意见的产物，帝国主义强国并没有对日本加以制裁的意思，因而实际没有任何效果。国际联盟为进行实地调查派遣了李顿调查团，但连调查团逗留在当地期间成立了“满洲国”一事，也没有引起列国的反驳。⑤

血盟团和五·一五事件

在犬养内阁进行的选举战最炽烈的1932年2月9日，前大藏大臣、民政党选举对策委员长井上准之助，在东京本乡的演说会场遭到杀害，接着3月5日，三井合名（三井总社）公司理事长团琢磨在三井银行的前门遭到杀害，查明犯人都是抱“一人一杀”主义的暗杀团体“血盟团”的团员，于是计划暗杀其他财界要人的团员们和盟主井上日召被逮捕了。井上于1910年二十四岁时前往“满洲”，加入特务机关，过着大陆浪人的生活。1922年回国后，以国家主义者和日莲宗的热心传教者身分进行活动，1928年靠田中光显的援助，在茨城县大洗建起立正护国堂，对附近的农村青年和霞浦的海军航空队的青年军官施加感化，并同海军急进派藤井齐勾结，计划用非法的恐怖主义来改革国家。1931年10月，十月事件

受挫后，同藤井等海军方面共同策划武装政变。1932 年 1 月末，决定首先由井上组成的民间的“血盟团”，不断进行一人一杀的暗杀活动，以恐吓统治阶级，然后主要由海军方面来搞武装政变。

“血盟团”用海军方面提供的手枪武装起来，选择了西园寺、牧野等元老重臣，犬养、若槻等政党领袖，团、池田等财界首脑等约十人为目标。当时因上海事变加剧，海军航空队的同人奔赴战场，藤井战死，但“血盟团”执行了计划，在杀到两个人的时候而被逮捕了。

由于逮捕了血盟团，它背后的关系和军部急进派的武装政变计划的一部分，也弄清了，但对它并没有采取措施。1932 年 5 月 15 日，古贺清志、三上卓海军中尉等青年军官的一伙，袭击首相官邸，当场杀害了犬养首相，同时在向警视厅、政友会本部、日本银行、三菱银行等投掷了手榴弹之后，来到宪兵队自首了。当天夜里，号称“农民决死队”的一部分青年，想使东京化为一片黑暗，袭击了六个变电所，但没有达到目的就被逮捕了。

这次五·一五事变的参加者是，以古贺、三上等十名海军青年军官为中心，还有十一名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和橘孝三郎⑥的七名爱乡塾生为实行部队，以外还有为之提供资金的大川周明、头山秀三、本间宪一郎、长野朗等右翼巨头们。他们想以这一行动使东京陷于混乱，在实行戒严令之下建立起军事政权，以便改革国家。他们虽然制定了破坏计划，但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改革纲领，而是把希望寄托于荒木陆相等军队首脑部。

举国一致内阁的组成

五·一五事件为政党内阁历史打上了终止符。陆军的中坚干部在事件后立即表明反对政党内阁的态度，并对上层首脑部施加了压力。在宫廷和政界中，广泛出现希望接受军部的主张，建立举国一致内阁的空气。元老西园寺担心政党内阁继续下去，会使国

内对立激化起来，便推荐了比较稳健的政治家、海军大将、原朝鲜总督斋藤实继任首相。斋藤内阁是让三名政友会成员和两名民政党成员参加内阁，并使陆海两相留任，⑦ 作为举国一致的内阁而组成的。

斋藤内阁是处理"血盟团"和五·一五事件所造成的混乱政局的善后，避免发生极端变化，保持统治阶级一致的内阁。因有高桥是清藏相、山本达雄内相、内田康哉外相等政界长老入阁，实行避免对立的稳健政策，所以也被称为中间内阁。但在这以后，政党远离政权，而军部对政治的发言权却一直加强起来。

在内阁组成后的 6 月临时议会上，采纳了政友会、民政党两党提出的承认"满洲国"的决议案。政党想用比军部还强硬的主张来恢复势力，这就走在了法西斯化的前头。

在这些动向中，当初曾考虑到国际关系，对于立即承认"满洲国"表示消极的斋藤内阁，8 月间，内田外相在议会发表演说，"即使全国化为焦土"也要贯彻日本的主张，从而得到"焦土外交"的名称。8 月，任命武藤信义陆军大将担任关东军司令长官，特命全权大使、关东厅长官的三位一体的职位，做了承认"满洲国"的准备。武藤到任后的 1932 年 9 月 15 日，同"满洲国"政府之间签订日满议定书，⑧ 承认了"满洲国"。

① 事件发生后的 9 月 19 日，陆军要求向营口派遣军舰，接着在进攻锦州时，要求舰队通力协作，都遭到海军拒绝。与此相反，海军却在 10 月 8 日向第一遣外舰队（在长江流域以及华中、华南担任任务）增派军舰二艘，1932 年 1 月又以巡洋舰二艘、水上飞机母舰一艘、驱逐队三队和特别陆战队加强了这支舰队。

② 在田中隆吉的《上海事变是这样搞起的》（收在《知性附册 12——秘密昭和史》，1956 年）一书中，本人证实了这个事实。

③ 这个大纲草案，是关东军参谋同司令部顾问松本侠协议拟定的。新国家的外交军事权由日本掌握，在其它政府机关中也安插握有实权的日本人，进行监督和指导。（《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227—229 页）

④ "伴随满蒙新国家成立的对外关系处理纲要"（《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

⑤ 国际联盟任命的李顿调查团，于1932年2月到达东京，以后对中国、“满洲”进行调查，并于10月发表了报告书。该报告书虽然没有承认日本的行动是正当的防卫手段，但认为中国处于无法律状态，劝告“满洲”实行自治化等，对日本是极为姑息的。

⑥ 橘是倡导农本主义的右翼领导者，他在茨城县土浦创立爱乡塾，以农村青年为塾生，一面过着集体生活，一面对之进行农业和国家主义的思想教育。然后以塾生为农民决死队，使之参加了军事政变。

⑦ 当发表这次事件时，荒木陆相说“如果考虑到这些纯真的青年所以做出这样行动的心情，不能不流下眼泪”。大角海相说“是什么使这些纯真的青年犯了错误，想到这一点时，有值得肃然三思者”。他们发表了这些仿佛肯定这些人行动的谈话，根本不想对事件负责而留任了。这也反映到陆海军的军法会议上，公审法庭大有青年军官辩论大会的样子。

⑧ “日满议定书”仅有两项，第一项规定，“满洲国”尊重日本的既得权益；第二项规定，为了共同防卫，日军驻在“满洲国”内。作为第二项的具体化，缔结了两国军队由日本指挥官统一指挥和保障驻“满洲国”日军行动自由的日满军事协定。

第三节 准战时体制

农村的贫困

受总危机影响最深刻的是农业部门。以稻米、蚕茧为中心的农产品价格，从1930年大跌落以来继续处于低落状态，轻易没有恢复。加之，1931年，以东北、北海道为中心，因冻灾而遭受大歉收；1933年，三陆地方遭受大海啸；1934年，因室户台风，关西地区遭受风灾、水灾；九州、中国地方的旱灾和东北地方的冻灾等连年灾害，因而危机的打击更加深刻了。

试以危机前的1929年为一百来看农产品的生产价格，1931年，大米降到五七·六，小麦也下降到五七·二，直到1935年还没恢复过来。而蚕茧跌得更厉害，1934年为三一·一，是最低的记录。

与农产品价格的降低相反，肥料以及其它农家用的工业品价格，由于垄断资本限制生产和协定价格，并没有下跌多少，因而扩大了农民卖贱买贵这种物价的剪刀差。加之租税和捐税的负担并

没有变，这就进一步给农家增加了经济上的压力。

农村的贫困，在农家负债问题上表现得最清楚。全国农家的负债总额，从1929年的四十亿日元剧增至1931年的六十亿日元。农民每户平均达一千日元。并且由于危机而丧失了外出挣钱和农业外收入的途径，失业者从城市回到农村，断绝了现金收入来源的农家的悲惨状况变得更深刻了。出卖女儿和饥饿儿童的增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农业危机所以激化的原因是，在榨取高额实物地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下，农业生产力被压低了，并且直接遭受了垄断资本的掠夺。尤其在米骚动以后，为了压低米价，推行在殖民地增产大米的政策，在危机的情况下，大量倾销殖民地廉价的大米，也促进了内地的危机进一步发展。还有，出口生丝、丝织品，进口机械、原料的日本资本主义的贸易结构，建立在无限投入劳动力的农家养蚕业的牺牲之上，受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将其遭受的打击全部转嫁到养蚕农家身上，也成了农村贫困的原因。

随着危机的发展，租佃纠纷也进一步激化。中小地主撤佃的动向多了起来。失业者回乡务农，造成争夺租佃地，使佃农处境更为不利。因此租佃纠纷变成减免地租的斗争，采取了反对撤佃、确认租佃权等的土地斗争形式，呈现出为争取最低生活而斗争的情况。租佃纠纷大都是一两名佃农同小地主的纷争，对于撤佃者与被撤佃者都成了生活攸关的深刻斗争。

救济农村请愿运动

农村的悲惨景象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爱乡塾的农村青年参加了五·一五事件，也使国民受到了冲击。内阁因五·一五事件而更换之后的6月，农民大举向第六十二届临时议会请愿，要求救济农村。组织请愿运动的是标榜农本主义思想的自治农民协议

会。① 这个请愿运动，开展了要求把农户负债缓期三年，每十公亩土地补助肥料资金一日元，迁移“满蒙”的补助费五千万日元等的签名运动。这个运动，以长野、群马、山梨、新潟等养蚕地区为中心征集到三万二千多人的签名。

这个请愿运动，对帝国农会、大日本地主协会等地主团体以及其他各方面给予巨大影响，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救济农村的要求。政友会、民政党两党也做出了救济农村的决议，决定在8月再召开临时议会。

第六十三届议会（所谓挽救时局议会），为了审议救济农村对策，在1932年8月召开。这次临时议会是为了通过政府提出的危机对策方案而召开的。对策之一是，为了维持米价，事实上禁止进口大米，制定由政府收购殖民地大米的规定。在下一届第六十四届议会时，通过粮谷统制法，实行了米价统制。对策之二是，整理负债，发放低利资金，用来救济产业组合和地方银行。但结果却救济了地主和高利贷。对策之三是，作为挽救时局的事业，兴办农村土木工程等公共事业。作为对策，这是政府投入资金的唯一部门，在1933到1934年的三年间，兴办了八亿多日元的公共事业。受到这项恩惠的是农村的土木业者和地主。结果，农村救济事业只是地主、富农和上中农得到了好处，贫农则被排除在贷款对象之外，没有得到恩惠。请愿运动的内容是以中小地主为本位，这就表明了救济农村的阶级性质。

农村更生运动

政府的农村救济对策偏重于地主、土木业者和高利贷，对此加以补救的是农村自力更生运动。斋藤首相在1932年7月发表的《值此重大时局告国民书》的特别声明中，号召靠“自力更生”来克服萧条。于是9月，在农林省新设更生部，作为《农山渔村经济更

生计划》的实行机关。这个更生计划，试图利用“邻保互助精神”来实行农村的自力更生。作为运动的核心争取农家的骨干人物，普及产业组合，以此作为经济更生的实行机关。

作为自力更生的一环，在1933年6月第六十四届议会上，制定了农村负债整理法，这是从国库发放二亿日元长期资金，使在农村组织以部落为单位的负债整理组合，用邻保互相精神整理债务。对整理多达一百亿日元的农家债务，仅发放二亿日元的政府资金，未免是杯水车薪，因而莫如说这个运动的目标在于以部落的共同责任来推进债务整理的一种精神运动。②

与自力更生运动同时进行的是，以1933年度为第一年度的扩充产业组合五年计划，产业组合成了推进更生运动的组织。并且首次在法律上承认了以部落为单位的农业实行组合和养蚕实行组合。在以部落为单位进行负债整理的同时，修改了明治以来不承认行政村以下的单位—部落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目标是利用邻保那样的共同体组织，把它置于官僚控制之下。此外，产业组合和更生运动中心的部落骨干人物，是以上中农为中心的自耕农和自耕兼佃农阶层，这个政策的意义就在于将自耕农、自耕兼佃农阶层组成官僚统治的基层。③

由于更生运动和产业组合的扩大，垄断资本直接掌握了农村市场。随着在村的自耕兼佃农阶层增大了发言权，地主对农村的统治力量有了一定的衰退。

反法西斯斗争与镇压

九一八事变，通过凭权力发动大规模的排外主义运动，成了动员国民支持战争的一大开端，在这种情况下，反对侵略战争，主张和平要有极大勇气。

社会民众党从一开始就站在支持战争的立场上。在1932年1

月的大会上，以三反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共产主义、反法西斯主义）为方针，另方面又倡导尊重国体。全国劳农大众党则与此相反，在事变后不久的1931年9月28日，组成反对出兵中国斗争委员会，采取了反对战争的态度。然而在该党中，有支持战争的右派势力，1932年3月改变了方针，中央确认了同反资本主义的军部结合的方向。1932年7月，两党合并为社会大众党，放弃了以反战、反法西斯为核心的任务。

各种社会民主主义势力，从九一八事变前后就放弃了反战口号，转而支持军部。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共产党继续举着反战的旗帜。共产党和它影响下的日本劳动组合全国协议会（全协），从事变后不久，继续高呼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但在残酷的镇压下，并没有开展群众性反战争的条件。

1932年5月，共产国际发表了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纲领，即所谓1932年纲领。这个纲领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新形势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战争这一基本问题的重要性，并指示展开反战斗争。

然而，对于提出打倒天皇制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共产党，日益加紧了镇压。而且镇压的方法，在利用密探等巧妙手段的同时，还反复使用了拷问、惨杀等残忍的方法。在遵照1932年提纲开始展开反战斗争的1932年10月，发生了因特务告密而全国代表一齐遭到逮捕的热海事件，后来又继续进行大逮捕，因此，1933年以后，中央机关几乎全被破坏。此外因警察的拷打刑讯，野吕荣太郎、小林多喜二、岩田义道等领导人被杀害了。1935年2月，中央机关报《赤旗》停止发行，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于是告终。

此外，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全协”和全国农民组合内部的全国会议派（全农全会派）也因为不断的镇压和特务从内部的破坏，从1933年后半年起停止了活动。作为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统一组

织，在1931年11月成立的日本无产阶级文化同盟(科普)④，也由于它的主要活动家被捕，1934年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除了共产党和工会等的斗争外，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反战和平运动，也成了镇压的对象。1933年1月，在德国，夺取了政权的希特勒，2月捏造国会纵火案，镇压了共产党。为了根绝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书籍，掀起了焚书事件。针对纳粹党破坏文化以及战争迫在眉睫的危险，以保卫学术思想自由为目的，三木清、新居格、德田秋声等自由主义文化人，在1933年7月组成了文艺自由同盟⑤。还有，1932年8月，在罗曼·罗兰、昂里·巴尔比斯等的号召下，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世界反战大会，根据这次大会的决议，定于1933年9月在上海召开以远东为中心的反战大会。这次大会在日本政府和中国国民政府的镇压下不得不秘密举行。参加筹备这次大会的秋田雨雀、江口焕、水野广德和劳农党系统的加藤勘十、铃木茂三郎等人在8月共同组织了远东和平之友会。⑥

这些反战反法西斯活动，受到种种干涉，由于镇压而被逮捕的成员很多，所以未能在工农运动和一般国民中间产生什么影响。这固然是因为处在残酷镇压之下所致，但另一方面还由于共产党和它影响下的工会，受到共产国际的社会法西斯主义论和1932年纲领以打倒天皇制为首要任务的强烈影响，轻视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敌视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知识分子的运动。⑦

教育的军国主义化

对革命运动进行镇压的同时，为了对国民思想进行统制和一体化，政府对教育加强了介入，企图使教育反动化。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彻底加强了义务教育的军国主义化和对高等教育的镇压。

在与九一八事变同时开始的军国主义、排外主义的政治运动中，最先被动员起来的是学校。强制儿童和中小学生写慰问信、送慰

问袋，动员他们欢送出征士兵和持旗游行。利用修身、国语和国史作为培养天皇的忠良臣民的工具。向小学校普遍发给天皇照片，建造供奉天皇照片的奉安殿，把礼拜天皇照片和教育敕语规定为义务。进而从1933年度起，全部国定教科书改为军国主义内容。对小学教员的思想统制也变得更加严厉，甚至连生活作文运动和自由教育运动都被认为是共产主义教育而遭受镇压。1933年2月，发生了有一百三十八名小学教员被逮捕的长野县教员赤化事件，而大部分被逮捕的人，只不过是想进行自主教育的有良心的教员而已。

1933年4月，京都大学教授泷川幸辰的著作，受到内务省禁止发行的处分。文相鸠山一郎对京大总长提出让泷川教授辞职的要求。泷川的刑法学说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是主张刑罚不要作为对犯人的报复，而要重视犯罪的社会原因，应处以教育刑的客观主义刑法论。还提出只有妻子犯通奸罪而丈夫不犯通奸罪是不公平的理所当然的学说。然而这个学说却被认为是违反国体的共产主义学说。

文部省要求泷川教授辞职，认为这是侵犯了教授会的自治，京大法学部全体教授提出了辞呈。副教授、讲师、助教也都采取了同一行动。这个事件还被视为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危机，京大、东大、东北大学等各大学学生广泛开展了抗议运动。⑧

政府对泷川事件采取强硬镇压方针，于是京都大学法学部的教员分裂成为留职派和辞职派。学生运动由于受到警察的镇压、领导人被逮捕而停止了活动。对泷川事件的抗议运动，成为拥护自由的最后斗争，自此以后，迅速推行起教育的反动化和学术的御用化。

① 自治农民协会，是在五·一五事件即将爆发之前的1932年4月，以长野朗等人的农本联盟为中心，由长野县日本农民协会的和合恒雄、爱乡塾的橘孝三郎、全农新潟县联的稻村隆一等组成的。它的指导思想是权藤成卿的农本自治主义。它的纲领是

提倡自治、农本、教育、协和，它的政策是，为了建成自给自足的农村，谋求改造发展产业组合，解放住在外地的地主的土地；整理农家的负债，准备向"满洲"移民等等。

② 农村负债整理法是，以部落为单位成立负有无限责任或保证责任机构的负债整理组合，使之成为负责整理债务的实行机关。即所谓用村落共同体的共同责任使之整理负债，干脆就是把负担叩在农民身上。

③ 培养农村更生运动骨干人物政策的作用在于，把以前租佃纠纷的领导阶层——自耕兼佃耕农阶层作为加强体制的别动队来掌握，并将其作为推行法西斯的社会基础来培养。弄清这点的是森武麿的研究。参照森武麿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和农村经济更生运动》(收在历史学研究会编《世界史的认识和人民斗争史研究的课题——1971年度历史学研究大会报告》)。

④ 科普是从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纳普)发展起来的团体。它是在纳普时代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同剧场同盟、同美术家同盟、同电影同盟、同音乐家同盟、同摄影家同盟之外，又加上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新兴科学研究所等文化团体而组成的文化艺术综合团体。但在严酷的政治形势影响下，它的活动中有着强烈的政治主义倾向，并没有向广大群众充分扩大其影响。

⑤ 德田就任学艺自由同盟会长，久米正雄、广津和郎、大佛次郎等作家也在筹备委员上列了名。同盟举行讲演会和研究活动，目的在于推进反法西斯的启蒙运动，木村毅和中条百合子等也参加了，但没能展开轰轰烈烈的运动。

⑥ 远东和平之友会的成立大会，8月25日在东京举行，右翼暴力团袭击了会场，又受到警察的干涉而流会了。

⑦ 由于加藤、铃木等参加了远东和平之友会，共产党机关报《赤旗》，认为这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利用小资产阶级的和平运动而加以指责，并号召组成另外的反战委员会组织，这就妨碍了反法西斯运动的统一。

⑧ 1933年7月1日，十二所大学的代表，130名观察员，在东京本乡召开了拥护大学自由联盟成立大会，以拥护全国学生团结和学术的自由、学校自治为目标，但一进入暑假，一般学生回乡，领导人全部被捕，运动便冷清下来。

第四节 二·二六事件

天皇机关说问题

1934年7月3日，斋藤内阁因帝国人绢会社行贿事件而总辞职，海军大将冈田启介继任内阁首相。冈田内阁面临的政治问题是天皇机关说问题。1935年2月18日，在贵族院全体会议上，菊池武夫中将指责美浓部达吉博士的宪法学说①是违反国体的天皇

机关说。在2月25日的贵族院全体会议上，美浓部起来为自己辩护，阐明了这一学说理论上的正确性。第二天，朝日新闻报道当时的情景说："阐述得有条有理，全场肃然倾听。大约经过一小时的雄辩，当他离开讲坛时，贵族院响起了罕见的掌声。"②

政府最初对于这个问题也看作是学术上的争论问题，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连林陆相都表明说"事实上这个学说对军队没有产生什么坏影响"。③可是这个问题在右派和在乡军人当中，迅速展开了挥动国体胡乱抨击的运动。在野党政友会甚至也利用这个问题攻击政府，通过了反对天皇机关说的决议，在众议院提出这个问题迫使政府阐明国体。后来"国体明征"运动势如燎原之火在全国扩大起来。

在扩大反对天皇机关说的运动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是帝国在乡军人会。由本部印制和散发反对机关说的小册子，并指令全国支部、分会召开反对的集会，发出抗议的信件和电报。④

在这个运动变得越来越高涨的情况下，政府就不得不采取反对机关说的态度了。3月23日，众议院在政友会总裁铃木说明提案理由之后，全场一致通过了国体明征的决议案。决议说："政府对于和无上崇高的国体势不相容的言论，应立即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这个决议否定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可以说用议会本身葬送了它自己的生命。

反对机关说运动更加高涨。4月间，陆军向全军散发了机关说违反国体的教育总监训辞。6月，组织起以贵族院、众议院议员为中心的国体明征促进联盟，形成包括军部、右翼、政友会和右派官僚等的大规模反政府运动。政府对此采取措施，禁止出售美浓部博士的著作，8月发出了"关于国体明征的声明"，9月传讯了美浓部博士，并迫他辞去贵族院议员的职务。

对于侵犯学术、思想自由，葬送议会政治生命这个问题，知识

分子和新闻界几乎没有表示抵抗。也没有发生象泷川事件时那样的学生运动。因为领导运动的核心组织已经遭到破坏，连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都被视为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敢于为自由而斗争的活动了。

这个事件证明，只要挥起天皇和国体的旗号，无论多么不合理的事情，也都通得过去。从此以后，由疯狂的右翼所搞的“铲除异端”，即打着天皇旗号的思想镇压就横行无阻了。司法、警察当局也加入了这个“铲除异端”的镇压活动。镇压甚至波及到宗教领域，1935 年 12 月，全国检举了三千名与大本教有关的人。第二年 1936 年 9 月，人之道教团也遭到了镇压。无论大本教，还是人之道教，都做为同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神道相抗争的类似宗教，以不敬罪为理由，成了镇压的对象。就这样，学术、思想的自由荡然无存了。

战争的危机和法西斯化的动向

在亚洲，当日本加紧侵略中国步伐的时候，在欧洲，法西斯国家也搞起了它的战争政策。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梦想重建当年的罗马帝国，开始侵略非洲大陆。1935 年 10 月，意大利对非洲唯一的独立国家埃塞俄比亚，发动了侵略战争。国际联盟虽然通过了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的决议，而最重要的军需物资石油却被除外，所以制裁的效果不大。而且制裁本身也在第二年的 1936 年 6 月撤消了。

德国也对凡尔赛体制开始了公开的挑战。1934 年 8 月，希特勒兼任总统和总理，巩固了独裁地位，悄悄地重整军备，1935 年 4 月公开发表重整军备宣言。那时，强大的德国国防军已成长起来。到了 1936 年 3 月，以法苏缔结互助条约为借口，德军侵入了非武装地带的莱茵区。法国和英国对此都没能提出强硬的对策。

1936年7月，在西班牙开始了反对人民阵线政府的法西斯叛乱。德国和意大利对叛乱军队给以大力军事援助，为打倒人民阵线政府而尽力。西班牙政府请求法国和英国援助，但英法政府采取不干涉政策，坐视人民阵线政府垮台而不救。

面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势力的进攻，共产国际从1935年7月到8月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指出，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结成以工人阶级统一为基础的广泛的人民阵线。西班牙的人民阵线虽然被法西斯叛乱军打垮，但在法国，急进社会党、社会党、共产党、工会和知识分子等五十个团体组成了人民联合全国委员会。在1936年5月的大选中取得胜利，组成勃卢姆人民阵线内阁，成功地阻止了国内法西斯的进攻。

日本也开始走向了新的战争。经营"满洲"而遭到失败的陆军，又开始了对华北的侵略，力图以武力为后盾，把华北五省从中国分离出去。于是在1935年6月，强行要求签订从河北省撤出国民党的党部和军队的梅津·何应钦协定，并在长城以南的非军事地带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接着成立了以河北、察哈尔两省为自治区域的冀察政务委员会。⑤

这种新的侵略的扩大，是伴随国内战争体制整备的产物。1934年10月，陆军省发行了题为《提倡国防的根本意义和加强国防》的小册子，主张为了准备战争应该建设国防国家。虽然也有人发出了反对的呼声，认为这个小册子是军人干预政治，可是社会大众党书记长麻生久却支持陆军的立场，主张军队和无产阶级结合起来。这就使加强法西斯倾向的活动活跃起来。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到了1935年的时候，走向法西斯主义战争的步伐更加快了，在工人中间，出现了从反战、反法西斯立场要求结成统一战线的动

向。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残酷镇压中，工会反复出现分裂、联合，高唱日本主义的右翼工会也不断出现。但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因遭受镇压而陷于崩溃的情况下，还存在着坚持左翼立场，继续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工会。

大阪南部的工人，1935 年 4 月成立了港南地方全劳总同盟联合促进协议会，提倡工会的统一。东京也在 5 月成立城南劳动者协议会，呼吁全劳和总同盟联合起来。但是，尽管从下面呼吁统一，社会大众党和总同盟的干部，却拒绝包括左翼的统一，采取了右翼联合的方针，因而统一战线没有实现。另一方面，合法的左翼工会，在 1934 年 11 月，成立了日本劳动组合全国评议会（全评），实现了只有左派的统一。

1936 年 2 月 20 日，在冈田内阁之下举行了大选。社会大众党初次获得五十二万张票，选出十八个议员。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也有进展，劳农无产协议会的加藤勘十在东京第五区获得了全国最高票数。社大党等无产阶级政党在选举中所取得的进展，说明城市小资产阶级等的广大阶层，对以社大党为中心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寄予了期望。站在反对天皇机关说前列的政友会遭到惨败，第一党的位置让给了民政党，参加竞选的右翼政党多数候选人也遭到惨败。这就表明了人民群众对法西斯和战争的不安和反感。

然而在日本，毕竟没有实现劳动战线的统一，也没能结成以它为基础的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共产国际的人民战线战术被介绍到日本，也加强了反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活动。1935年 5 月，前去美国的全评的加藤勘十，在纽约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野板参三就统一战线问题进行了协商，回国后，向社大党提出了统一的要求，但社大党害怕左翼加入而拒绝了。于是 1936 年 1 月，由总同盟和全劳右翼联合组成了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全总），排除了全评等

左翼工会。以全评为中心结成的劳农无产协议会，在社大党拒绝联合的提议后，1937 年 2 月结成日本无产党，自己堵死了统一战线的道路。在日本终于没能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⑥

军部的派系斗争和叛乱

在军部进行对苏战争准备，整备国内战争体制的过程中，陆军军部内的皇道派和统制派之间的派系斗争尖锐化了。皇道派本来是以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为中心对抗宇垣派阀的一派，自从荒木在犬养内阁里任陆相以来，掌握中央人事，以对苏战争第一为方针，加强了势力。并倡导天皇中心主义，在带队的一群青年军官里产生了影响。统制派是批判皇道派垄断人事的一派，以树立国家总力战体制为目的的中坚干部居多，永田铁山被视为这派的中心人物。1934 年 11 月，发生了皇道派的青年军官因策划军事政变而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的士官学校事件。⑦皇道派认为这是统治派捏造的事件，因而更加激化了两派的对立。

在天皇机关说发生问题时，担任教育总监的真崎是强烈排斥机关说运动的中心人物。1935 年 7 月，陆相林铣十郎为了消除部内派阀的对立，罢免了被视为皇道派中心人物的真崎。皇道派认为这是永田军务局长策划的，便散发了攻击永田的秘密文件，⑧受此影响的皇道派相泽三郎中校，于 8 月 13 日，在陆军省局长室砍死了永田。这次相泽事件，更进一步煽起两派的对立，奇奇怪怪的文件到处泛滥。

皇道派策划把公审相泽的军法会议变成攻击统制派的舞台，说有必要弄清相泽犯罪的动机，要求许多证人出庭，以便暴露统治派同政界、财界的勾结。公审相泽引起一般注目的 1936 年 1 月，下达了派遣驻东京的第一师团开往“满洲”的内部命令。第一师团是皇道派青年军官的据点。于是出现了这次派遣是为使他们远

离东京的传说。

受相泽事件的刺激，因即将派往"满洲"而深怀焦躁的青年军官们，下定决心实行早已准备好的建立军事政权的军事政变。起事的最后决定，正是大选结果揭晓的一瞬之间。

1936年2月26日拂晓，野中四郎、安藤辉三等皇道派青年军官指挥的一千四百名左右的驻京部队，手持武器开始行动，袭击了首相官邸和警视厅等地，把首相的秘书误认为是冈田首相而枪杀了，并杀害了斋藤实内大臣、高桥是清藏相、渡边锭太郎教育总监，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负了重伤。叛乱军队占领了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并会见川岛义之陆相，强迫建立军事政权。叛乱看来好象一时得到成功，于是，美国大使格鲁向本国做了报告，将此次事件比做古巴的巴蒂斯塔军事政变。⑨

陆军首脑们为叛乱的爆发而动摇，甚至一度答应叛乱部队的要求，表示准备建立军事政权。集聚在宫中的军事参议官，在荒木、真崎的领导下，拉着川岛陆相，写出承认叛乱内容的陆军大臣的告示，并通知给叛乱军队。同一天夜里实行了戒严令，叛乱军队被编入戒严司令官的指挥下，承认他们占领的区域是他们守备的地区。陆军决定讨伐叛军，实行镇压，那是到了29日才开始的。从这天早晨起，戒严部队包围了叛乱军队，从飞机和坦克里散发劝告归顺的传单，要求叛乱的士兵投降。本来就没有战意的叛乱部队，到这一天午后，已全部投降，干部被逮捕了。

陆军首脑们从最初的动摇改变过来，决心镇压叛乱军队的理由，有以下四点：第一，天皇从一开始就憎恶叛乱，要求陆相和参谋次长迅速讨伐叛军。天皇对他的身边重臣遭受杀害感到极大的愤怒和恐怖，切齿痛恨地要求负责人采取强硬手段。⑩这当然要对军队首脑产生影响；第二，海军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对叛乱是否定的。海军担心树立军事政权最终会导致陆军独裁。所以把联合舰

队开进东京湾，让陆战队登陆担任海军省等的警备。遭受袭击的斋藤、冈田、铃木等高级官员是海军出身，这也是海军对叛乱持否定态度的原因。这就当然牵制了陆军；第三，政界和财界都不希望因军事政变而引起急剧变化，因而通过宫廷集团促使进行镇压；第四，一般国民也反对这次事件，并未掩饰对陆军的反感和对法西斯主义的不安。⑪ 五·一五事件时，青年军官在心情上引起了共鸣，因而有了很多要求减刑的请愿书；而这次事件则与此相反，却对在首相官邸牺牲了的警卫的遗属寄来了很多慰问金，表明了这种感情。

广田内阁与国防国家

冈田内阁由于二·二六事件倒台了，外相广田弘毅组织了内阁。广田内阁从一开始就接受了陆军的“庶政一新”和“建设国防国家”的要求，扮演了愈益推进准战时体制的角色。陆军没有表明对二·二六事件负责的态度，反而以这次事件所表现的军事政变威胁为武器，对内阁施加压力，以坚决贯彻它的政治主张。

以天皇为首的政界、财界和一般国民对二·二六事件的批判，以要求陆军“整肃军队”表现出来。陆军中央部的幕僚们以整军为理由，迫使荒木、真崎等高级干部引退，扫清皇道派，掌握军内的领导权，同时对于外部，作为整军的条件，贯彻了使陆军的政治要求得到承认的方针。广田内阁也好，政党也好，财界也好，都没有抵抗陆军的压力，而是唯命是从，开始踏上战争和法西斯的道路。

事变发生后，还在实施戒严令的1936年5月，军部以修改陆海军省官制附属别表的简单手续，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保障军部特权的这个制度，是议会政治的最大障碍，经过长期民主运动斗争的结果，才在1913年废除了。二·二六事件一举就把它给取消了，政党对此根本没能抵抗。

军部发言权的加强，直接同扩充军备联系起来。1936年6月，由陆海军修改了“帝国国防方针”。这是以苏联为敌的陆军和以美国为敌的海军妥协的结果，是同时以两国为敌的整顿军备的方针，把苏联和美国并列为第一位的假想敌国。其结果，作为国防所需的兵力，确定陆军是五十个地面师团，一百四十二个飞行中队，海军是主力舰十二支，航空母舰十支，基地航空部队六十五队的庞大兵力。于是陆军以此兵力为目标制定了扩充军备的六年计划，海军制定了在五年间充实必需兵力的第三次补充计划。为了实现这个陆海军的扩充计划，必须以大规模扩充军需产业为中心的经济战时体制化，这样必须来个国策大转变。广田内阁在这条路线上突飞猛进。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的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五相会议，决定了“国策的基准”。⑫这就是“在外交和国防两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还要向南方海洋方面扩张发展的”，所谓囊括了陆军的北进论和海军的南进论，把南进北进两方面作为国策的方针。这一天，在首相、陆相、海相、外相的四相会议上，还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决定为了对抗苏联，同德国合作，对华北进行分治工作。

这种国策的决定和军备的扩充，是要走上拿出全国一切力量来扩充军需工业，实现国家总动员体制的道路。强制推行以军部为先导的这种军国主义政策，对内外给予了巨大冲击。特别是由马场藏相推行的准战时财政，对国民生活给予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国民生活的穷困，和二·二六事件以后对军人干政心怀不满的人民对军部的批判高涨起来。以此为背景，政党内部批判军部的呼声也高涨起来。在1937年1月21日第七十届议会上，政友会的滨田国松攻击军人干预政治，同寺内寿一陆相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因军部和政党的尖锐对立，广田内阁于1月23日实行总辞职。宇

垣一成受命组织内阁，陆军的中坚阶层对此强烈反对，宇垣由于没人担任陆相，放弃了组阁。

继宇垣之后，原陆相林铣十郎受命组阁。林不让政友、民政两党任何人入阁，以财界领导人结城丰太郎为藏相，二月二日组成了林内阁。林内阁一通过了预算，便以刷新议会为理由，出人意料地解散了众议院。4月30日举行大选，结果反对政府的政友、政民两党占了压倒多数，社会大众党也获得三十七个议席。政府和政党的对立更加尖锐了。

① 美浓部的宪法理论，是和以国体为盾牌，主张天皇绝对主权的天皇主权说对立的，他的天皇机关说是，认为国家是个法人，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是做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的。自1912年至1913年，和主张天皇主权说的上杉慎吉等展开了争论。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通过大正时期，在理论上为议会的权能打下了基础，在广大学术界被认为是定论。

② 《东京朝日新闻》，1935年2月26日早刊。

③ 大角海相在《东京朝日新闻》1935年2月19日早刊上，也表明是学说上的问题，军队不与干预。

④ 由在乡军人本部，向各支部、分会接连不断地发出通知。在各地也举行了国体明徵祝愿节，召开了铲除机关说的大会等。

⑤ 日军策划使河北、察哈尔两省脱离中国，成立自治区，但国民政府竟先发制人地作为政府管辖下的机关设置了政务委员会。反对设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北京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同镇压示威游行的官宪发生冲突，造成很多人伤亡。这次示威游行，作为一二·九运动，成了整个中国抗日运动高涨的开端。

⑥ 关于在日本结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自1960年代后期以来，不断发表研究成果，进行争论。神田文人主张，1935、1936年间，从在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中结成统一战线的活动，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的动向，以及大选中所表现出的群众反军的气氛来看，到这个时期为止，是存在着组成统一战线的客观可能性的（神田文人“关于日本的人民战线”《历史学研究》二九一号，1946年，神田文人“日本的统一战线”，江口朴郎、荒井信一、藤原彰编《三十年代的世界史》青木书店，1971年）。岩村登志夫大致也同样主张，而且特别重视大阪地方共产党中央重建筹备委员会和小岩井净等人的活动，还认为存在着主观条件（岩村登志夫《日本人民战线史序说》校仓书房，1971年）。

与此相反，江口圭一主张，在总危机期间，由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反对垄断斗争的高涨，结成包括中间阶层在内的统一战线的客观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间阶层被排外主义拉走，共产党遭到破坏，社会民主主义堕落为社会法西斯主义，已

经不存在结成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了（江口圭一《城市小资产阶级运动史》未来社，1976年）。

⑦ 没有被起诉的村中，矶部等人，以行政处分而停职，第二年以散发怪文件而被免职。

⑧ 这些文件，象村中孝次、矶部浅一的《关于整肃军队的意见书》、维新同志会同人的《军阀重臣阀的大逆不道》、村中孝次的《教育总监更迭情况要点》，签署的日期都是1935年7月中。这类怪文件被收在《现代史资料（4）国家主义运动Ⅰ》里。

⑨ 格鲁著、石川欣一译《驻日十年，上》每日新闻社，1948年第226页。

⑩ 如果根据事件发生期间，作为侍从武官始终在天皇左右的本庄繁的记载，天皇为迟迟不进行镇压而焦虑，甚至于说："朕将亲自率领近卫师团，以当此镇定！"（本庄繁《本庄日记》原书店，1967年，第276页）。

⑪ 关于二·二六事件使民众怀有反感，使反军思想抬头，在1936年3月20日编订的戒严司令部的《叛军的行为，对地方民心发生的影响》（松本清张编《二·二六事件，研究资料1》，文艺春秋社，1976年，第194—203页）中举出了很多事例。

⑫ 国防方针，是决定军备和作战计划的基本方针的，在总力战阶段，只有国防方针是不够的，应该确定包括全部国策在内的战争国防的基本方针，这种《国防国策》的设想，因系军部的主张，进行过讨论。1936年6月末，在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之间，一致同意了国策大纲，它就成了五相会议的决定。关于修改国防方针的经过，可参照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的《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以及该室的《战史丛书—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1〉》。关于军部的国防国策成了五相会议决定的一点，可参照《国防国策决定的经过》，《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Ⅰ》第359—360页。

第二章 日中战争

第一节 全面侵略战争的开始

战争前夕的日中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满洲”以后，继续追求其一贯向中国内地扩大侵略的目的。尤其是关东军把“满洲国”治安难以维持归咎于来自中国内地的支持，为打开经济开发的困境，希望获得华北的资源，因此它所策划的分离华北的工作便是露骨的扩大军事侵略。1935年制造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华北自治工作，对中国来说当然认为是攸关国家存亡的危机，是意在建立第二个“满洲国”的政策。中国人民针对这种情况，便在1935年掀起了以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为首的激烈的抗日运动，在这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强烈地呼吁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进行武装抗日。

1936年1月，日本陆军中央制定《处理华北纲要》①，并将其下达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还在5月就把中国驻屯军的兵力由一千七百名增强到五千七百名②。尽管陆军中央当局表明这次增加中国驻屯军兵力，是为了制止关东军的独断独行，但这一措施显然成了战争导火线。

从1935、1936年开始，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扩张。日本资本打进所有产业部门，压垮并扼杀了中国民族资本。仅在1935、1936年，天津的几乎全部中国纺纱厂不是破产，就是被日本公司吞并了。同时，以冀东非武装地区为基地的日本商人搞走私贸易，使中国市场陷于混乱，并沉重地打击了中国关税收入。日本资本和

商品这样潮水般地侵入华北，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遭到破产。不仅军事侵略，还有经济侵略，这就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这就是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运动的原因，也可以说，日本的经济侵略促进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近卫内阁

林内阁在大选中遭到失败后还赖着不下台，在同政党的对立激化中，完全陷于走投无路，终于在5月31日实行了总辞职。内阁发表总辞职理由的声明是："前不久关于奏请解散议会，同众议院的一部分发生意见分歧，深为遗憾"；"目前时局严重，正是朝野同心协力，克服时艰，发扬国运之际，绝不许国内有任何对立斗争，"（《朝日新闻》6月1日版）。政府把自己和政党之间的对立载于总辞职声明中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对立是非常深刻的。

自广田内阁总辞职以来，日益尖锐化的军部和政党之间的对立，由于林内阁对议会卤莽地搞"过河拆桥式的解散"，在大选中的惨败以及恋栈不下台的策划，竟以政府和政党的对立形式，造成进退维谷的局势。到了5月末，在为国内分裂和互相斗争而担忧的元老和重臣之间，为了缓和这种对立，迫使林内阁下了台，作为统一统治阶层的王牌，使近卫组织内阁的动向具体化了。

近卫出身于五摄政家的第一家，是仅次于皇室的最高的门第。西园寺在近卫的青年时就期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他还是木户幸一、原田熊雄等革新贵族集团的核心人物，同宫中和财界上层有着密切联系。他同皇道派系军人和右翼人物也有接触，希望打破现状的势力也对他有所期待。加之，他一面为了组织新的国民组织而和在搞青年团和壮年团运动的后藤隆之助、田泽义铺等接近；另一面又以后藤为组织者网罗革新官僚、新进学者和新闻记者组成昭和研究会，作为他研究政策的智囊团。在很久没有执政的政党之

中，也有通过拥护近卫想要接近政权的动向。这样，近卫肩负着宫中集团、军部、右翼、政党和计划建立国民组织的各方面的期待，而被视为缓和对立的王牌人物了。而且，由于他的名门出身和四十五岁的正茂年华，以及富有清新的气息，在广大的国民中也孚有众望。同过去那些军人首相毫无声望相比，近卫内阁的上台受到了国内各个阶层的欢迎。

近卫内阁让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仍任原职，从政友会和民政党分别选任一人即中岛知久平和永井柳太郎入阁，6月4日组成了内阁。力图同中国缓和紧张的佐藤尚武外相下了台，重新起用广田弘毅为外务大臣，但对于广田外交的重新登台，就不免引起中国方面的不安。新内阁的人事安排引人注目的是经济阁僚。陆军希望起用马场为藏相，由于财界坚决反对而转任内相，据传要由马场兼任的新企画厅总裁也由广田外相兼任了。最后大藏次官贺屋兴宣升任大藏大臣。近卫首相在组阁后首次声明中，提出了缓和国内的相互对立，但却很难实现军部所要求的加强国防和组阁时提出的“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国际收支和发展生产力”的财政经济三原则，内阁的前途充满了不安。

芦沟桥事件

1937年7月7日夜晚，在中国北京（当时的北平）西南郊区芦沟桥附近爆发了日中两军冲突事件。这次事件是日军在夜间进行演习中，有一个中队说是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射击，前往应援的驻在北京的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校），向警备宛平县城附近的中国第二十九军部队发动了进攻，这就是所谓芦沟桥事件的开端③。

这个事件和引起九一八事变的柳条沟事件不同，它并不是通过阴谋策划发动的事件④。这时日军还没有对中国发动正式战争

的计划[5]。但是，突然发生的事件竟发展成为全面性战争，尽管没有正式作战计划，却演成了投入一百万大军的大规模战争。

尽管造成战争契机的芦沟桥事件是偶发性事件，尽管日军没有制定正式战争计划，但不能说这次战争是偶然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一向企图扼杀中国革命并把中国全部领土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因此，不论是否这时爆发这一事件，也不论是否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自从 1910 年以来的一贯政策就是力求把中国化为殖民地。

因而把这个事件一举扩大为全面的大规模战争，是有其充分理由的。第一，是当地日军的强硬的挑战方针。他们蔑视中国和中国人民，看重日军的威信，采取了凭发动强硬军事力量迫使中国方面屈服的态度。大队长一木说："为军队的威信而奋起了"[6]，联队长牟田口下令："坚决战斗也没关系"[7]，甚至连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也有"正在等待着爆发事变的情况"[8]。日本军部尤其是陆军军人自甲午、日俄战争以来，对于中国的优越感很强，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对象的中国怀有强烈的领土野心。加之，军人每每从贪图功名出发，特意挑动事件。

第二，军的中央部和政府对于中国的抵抗抱有乐观估计，认为用威吓的简单办法就可以使中国屈服这种轻率的判断，铸成了事态日益扩大的原因。

7 月 11 日，近卫内阁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暂向华北派出三个师团。这是接受陆相杉山提案而定的，派遣兵力的目的，在内阁会议之前的五相会议讨论中认为是为了"显示威力"[9]，同时政府发表了如下的重要声明："为了取得中国方面的道歉和今后的保证，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关于增兵华北，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在发表声明之前，内阁书记官长风见发表谈话说，这次事件称为"华北事变"[10]。近卫首相于 11 日夜间邀请政界、财界和

言论界代表到总理官邸，采取了说明政府的决心并要求他们合作的异常措施。上述这些行径当然会使国内外理解为日本政府准备要打一场正式战争。然而，就在这一天，在当地的北京，中国驻屯军和华北政务委员会之间却签署了停战协定。

战争的扩大

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及其向华北增派军队当然使中国有了严重危机感，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向全国国民发出了悲壮的号召："最后关头一到，唯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豁出全民族的生命，来求得国家的生存。"全中国各地到处都高喊着抵抗侵略是民族存亡之所系。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也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的7月8日，呼吁全中国人民爱国抗战，9日下令组织抗日义勇军。当地的第二十九军下级干部和士兵以及北京、天津等地的学生、工人们也都发表声明，表明誓死抗日的决心，并多次举行了集会。这次和过去的情况不同，中国抗战的决心正在形成全民族的抗日高潮。

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日军也随着日本国内和"满洲"等地增援部队的到达而采取了强硬态度，7月28日，在华北开始发动总攻，以集中陆军航空兵的主力进行轰炸和地面部队进行突然袭击，到第二天29日就占领了以北京、天津为主的华北要地。于是战斗开始走上了没有止境的扩大道路。8月13日，上海海军陆战队也同中国军队之间开始了战斗。海军计划在它的势力范围内的扬子江流域采取行动，自事变爆发以来不断增强兵力，等到内地的侨民和海军部队撤离之后就挑起了战端。8月15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等于宣战布告的声明，表示：以"惩罚中国军队的暴虐"为目的而采取"断然措施"；并决定派遣陆军大部队。这样，不管政府和军部中央的意图如何，全面战争就开始了。

转向长期战争

上海战斗，比 1932 年的第一次上海事变更加激烈。中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上海的学生、工人和市民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中国国民党也在强烈要求联合抗日的压力下，不得不在 9 月 22 日正式承认同共产党合作，共产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式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本上海派遣军被牵制在海岸线上达三个月之久，不得前进一步。11月 5 日，另派兵团由杭州湾北岸登陆，日军这才突破了上海战线，向南京进击，12月 13 日攻陷南京。可是，虽然占领了南京，并没有取得挫伤中国抗日斗志的效果。在占领南京时，日军掀起了大规模屠杀事件⑪。日军的这种暴行，更加坚定了中国民众的抗日斗志。

对华战争的全面化，是违背了一心准备对苏作战的陆军中央当局的意愿的。由于陆军从中工作，德国从 11 月起为日中间的和平出面斡旋，日本方面也准备了停战条件，可是，南京陷落之后，军部和政府的胜利气焰高涨起来，要求提出苛刻条件的强硬论占了优势。在 1938年 1 月 15 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不顾希望继续交涉的参谋本部的反对，就决定停止和平谈判。近卫首相发表声明："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自行堵死了结束战争的道路。

日中战争全面化的原因

尽管日本政府称为"事变"，避开了战争这个名词，但它却是地地道道的正式战争。对于现代日本来说，日中战争无论就其动员兵力、战费、损失和给国内造成的影响来说，都远远超过了甲午、日俄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激烈战争。对中国说来，也是辛亥革命以来最大的战争，当然也是一场国难。

这次日中战争全面化的原因，可举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举出的是，日本垄断资本主义要求侵略中国。从长远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形成以来就一贯追求垄断中国的市场和资源。从短期来看，准战时体制的经济破产和经营“满洲”一筹莫展，自 1935 年开始，日本资本迫切要求侵入华北。这种侵入华北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使用了冀东走私贸易等各种手段蛮干的，这就同中国民族资本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造成激化抗日运动的原因之一。日本资本主义把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求之于不顾中国的抵抗而占据华北，然后建设日、满、华北经济圈，为此，竟不惜发动一场侵略战争。

第二是乐观的情势判断。政府、军部和财界等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的民族国家的统一的实际情况缺乏认识，轻视其抗战力量，认为以威吓或者加以一击就能使中国屈服。自甲午、日俄战争以来，日本统治阶层对中国的认识是基于中国人缺乏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这种极端的蔑视观，他们认为分而治之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民革命发展之际，也不肯正视这个事实，认为仍然在继续军阀割据。九·一八事变以后，以抗日运动为中心，民族国家的统一飞速进展，但仍死抱着陈旧的中国看法，没能理解这一事实。1936年以来，对于“中国统一化的争论”⑫只是很少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家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没有得到政治家和军人的理解。

第三，必须指出，统治阶级想把由于国内准战时体制的失败而产生的矛盾和对立转移国外的意图，是扩大了这时侵略战争的原因之一。他们的经验是，谋求统治阶层内部的统一和消除国民的不满，战争是唯一的捷径。近卫内阁的登台本身就是以统一国内舆论为目的的。芦沟桥事件后，日本政府表示的异常强硬态度，本是面向国内的。

① 《处理华北纲要》的重点是完成华北五省自治，首先要使河北和察哈尔两省实行自治。鉴于过去由关东军强制实行的分离华北工作招致了中国民众的强烈反抗，决定要逐渐推行分离华北工作，工作是在中央控制下，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执行（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第322页）。

② 在义和团事件时出兵中国的八个国家，根据1901年9月的议定书，为了警备北京公使馆和首都到海滨之间的交通线而获得了驻兵权。各国的兵力由派遣军司令官会议决定，日本为一千五百七十名，但日本和其他各国都没有严格遵守决定的兵力人数。这次增强兵力之前的日军兵力为司令部和北京、天津驻屯步兵队（计步兵10个中队）、炮兵一个中队、工兵一个小队。修正后的新中国驻屯军，把原有的编制升格为独立兵团，是由两个联队编制的中国驻屯步兵旅团、炮兵联队、坦克队、骑兵队和工兵队编成。日军这次增强兵力并没有通知中国，而是单方面搞的。而且还增加了驻屯地点，没有取得中国的谅解，就在丰台等地修筑了兵营。点起了芦沟桥事件的导火线的就是这个驻丰台部队。

③ 由于1936年6月增加了中国驻屯军兵力，在北京四周部署了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的主力部队。其中联队本部和第一大队驻在北京城内，第三大队驻在北京和芦沟桥中间的车站丰台。这个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校）的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是当天夜晚演习的中队。该中队在空弹射击中，听到从永定河河坝上传来发射实弹的声音后，立即停止演习，检点人数，发现一名士兵不在了。于是立即向丰台的大队长报告这个情况，但这个士兵不久就找到了。大队长又把这件事报告给北京的联队长，联队长指示，命令大队紧急出动（没有报告失踪士兵已经找到）。出动的大队在芦沟桥前面布置阵地，8日上午3时许又遭到射击，大队长接到联队长的不妨坚决战斗的指示，立即下令开始进攻，于是战斗开始了。关于这次事件的经过，详见根据当事人清水节郎手记的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1961年版）和北京特务机关的辅佐官当时参加日中两军之间谈判的寺平忠辅《芦沟桥事件》（读卖新闻社，1970年版）。

④ 在参谋本部编《石原莞尔中将回忆问答录》中，对竹田宫所提出的"事件爆发同战争谋略之间完全没有关系吗？"的质问，石原回答"冈本中校报告说绝对没有关系。"（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现代史资料⑨日中战争2》，第305页）。寺平忠辅前引书也是这样记载的。

⑤ 参谋本部制定的昭和12年度作战计划的主旨是，如果对于中国行使武力的时候，尽可能限定在一个方面作战，但是鉴于中国军备增强，增加了以前的使用兵力。这就是对华北以两个军、八个师团在华北五省作战；对华中以两个军、五个师团在上海、南京和杭州的三角地带作战；对华南以一个师团占领广州。总之，对中国作战不象对苏作战计划那样充分进行过研究，而且当时还没有制定象实际进行那样的大规模战争的计划。（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到昭和13年1月为止》，第100—104页。）

⑥ 《纪念芦沟桥事件一周年座谈会》（《东京朝日新闻社》在1938年6月30日和7月1日）的一木少校发言。江口圭一《日中战争全面化》（《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0近代7》，第146页）。

⑦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 167 页。

⑧ 同上《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 2》，第 324 页。

⑨ 同上《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 165 页。

⑩ 所以称为"华北事变"，可以说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已经估计到会发展成为九·一八事变那样的大事件。政府在战役又波及到上海以后的 9 月 2 日，决定称为"中国事变"。以后也就在没有向中国宣战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了大规模侵略战争。尽管战争规模远远超过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但所以仍不叫战争而称为事变，也不宣战是因为如果受到交战国待遇，就难以从第三国输入军需品和原材料了。1941 年 12 月 8 日对美英开战后，12月12 日，日本政府发表"这次对美英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称为大东亚战争"。对于中国因为已经承认了汪精卫傀儡政权，所以直到最后也没有发出宣战布告。然而，中国国民政府于 1941 年12 月 9 日向日本发出了宣战布告。

⑪ 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没有留下准确记录，在东京国际法庭审判时，有确凿证据的被杀害人数为十一万九千人。爱德加·斯诺著、森谷岩译《亚洲的战争》(御铃书房，1956 年版)说：被杀害者三十万人。在胡华著《中国革命史讲义》中说，被强奸两万件以上，杀害俘虏二十万人以上。据 H. J. Timperley, What War Means,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 (田伯烈编著《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 载，强奸妇女达到两万件。

⑫ 在中国抗日运动高潮中，围绕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和经济建设评价的争论，尾崎秀实和大村达夫（中西功的笔名）等人主张，会以抗日运动为推进力促进国民政府的统一工作。

第二节　战争的扩大和国家总动员

国家总动员法

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自己堵死了结束战争的道路，这意味着日中战争进入了长期化阶段。在全面战争开始以来的半年期间里，已经向战场派出十六个师团约六十万大军，死伤七万人。一面进行对苏和对美备战，一面要把这场大规模战争长期继续打下去，这就急需把国内体制加以战时化，尤其扩充军需工厂的生产力。在上海继续进行激战阶段，炮弹的储备已告枯竭，势必向民间工厂分派生产任务。因此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把资本和劳动力集中到军需工业上。在 1938 年 1 月复会的第七十三届议会上，近卫内阁提出三十五亿日元的一般会计预算和将

近五十亿日元的临时军事费预算，与此同时，为了完成国家总动员体制，还提出了国家总动员法和电力国家管理法等统制法。

战争开始不久的1937年9月，制定了临时资金调整法和进出口品等临时措施法，与发动军需工业动员法相结合，对资金、物资和生产等实行了统制，但总动员法是这些统制法规的集大成，它是对战争所需要的所有劳动力、资源、资金和设施等一切部门具有统制权限的法律，是以敕令形式，把所有问题的统制权交给了政府的委任立法。①

对于这个等于否定了议会权限的总动员法，社会大众党很快就表示赞成，一部分持反对意见的政友会和民政党也终于采取了赞成立场，结果该法在众议院以全场一致赞成通过了。

和总动员法一起提出的电力国家管理法，是把所有发电、送电交给国家管理，设立了特殊公司日本发送电股份公司，把电力事业置于国家控制之下。这对于在战时体制下要实行重工业、化学工业化的财界来说，合理地统制和分配电力倒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办法。

在这次第七十三届议会上，除了以上两个法案之外，还提出了与国家总动员法有关的一些法案，以及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为目标的农地调整法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国民健康保健法等重要法案。由于战时下的压力和政党迎合战时体制，在这次议会中，政府所提出的八十六项法案和预算案全都通过了。以这次议会为契机，一举过渡到战时体制，严格施行起经济统制来。再者，从1938年起，制定了物资动员计划，规定重要物资由政府按计划分配，这种分配以军需为最优先，极力压缩民需。因此，以纤维工业为主的民需工业几乎陷于瓦解状态，迅速推动了转向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化学工业方面。

战线的扩大

日本陆军占领南京以后，为了不妨碍对苏作战准备，对日中战争采取了不再扩大的方针，1938 年 2 月，确定了以长期持久战为宗旨的不扩大战线的方针。但是，战线的实际情况是由于中国军队的猛烈抵抗，结果第一线部队越出中央控制而扩大了战线。并且，从 3 月到 4 月间，从华北和华中，以徐州为目标的作战开始了。因兵力不足，不得不把对苏作战备用的师团投入战场。

由于战线的扩大，兵力的增派，军需品的消耗，战费开支和进口的增加而造成了经济困难，于是近卫内阁尽管刚刚发表了"不以为对手"的声明，却又不得不再转到搞和平工作方向上来。1938年 5 月，徐州作战刚刚结束，近卫内阁实行了大规模改组，由宇垣一成任外相、板垣征四郎任陆相、池田成彬任藏相、荒木贞夫任文相。并且，在改组后的 6 月末，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大藏相的五相会议决定，为结束战争而进行和平谈判。宇垣外相开始同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进行谈判的同时，并同英国大使克莱琪开始会谈；另一方面，陆军为了结束战争，进一步增加兵力，计划了武汉作战和广州作战。

正在计划武汉作战的 1938 年 7 月，在朝鲜东北端的朝苏边境的张鼓峰地方发生了日苏两军冲突。这是参谋本部为了刺探苏联态度，要进行军事威力的侦察，在对于苏联条件最坏的地区进行战斗的计划。② 战斗以日军败北而告终，第十九师团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并明确了苏军的火力和机动力量极其优异，对苏作战并非轻而易举。还明确了苏军收复了他们主张的边境线之后并没扩大战线，也没有进行战争的意图。于是陆军全力以赴地进行武汉作战和广州作战，并且确定了对苏作战延期到军备现代化之后再进行的方针。

攻占武汉动员了十四个师团，攻占广州动员了三个师团，1938

年10月，以占领两地而结束了作战。至此，日本陆军派到中国战线上有二十三个师团，七十万兵力。此外，只有日本内地保有两个师团、"满洲"和朝鲜驻有九个师团而已，再也没有多余的兵力了，再想扩大战线根本不可能了。

占领武汉和广州并没能结束战争。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整顿了长期抵抗的体制。毛泽东在延安撰写了《论持久战》，把战争区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个阶段是日本军队处于战略进攻，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第二个阶段是两军在战略上处于对峙和持久；第三个阶段是进攻和防御互相调转。武汉作战可以说是持久战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向第二个阶段过渡的分界线。从此以后，日军就丧失了积极进攻的作战能力，只是竭力勉强维持占领区内的点和线，被夜以继日的游击战所困扰，陷入了长期战的泥潭。

战争在军事上陷入僵局和日苏关系的恶化，以陆军为中心出现了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来打开僵局的动向。希特勒早就有侵略东方的意图，1937年11月表明了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的侵略计划，为了在亚洲牵制英国和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也重视日本的作用。1938年初，希特勒的心腹里宾特洛甫就任外交部长后，便对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大岛浩陆军少将试探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问题。德国还为了接近日本而公然表明承认"满洲国"的意向，并禁止向中国出口武器和军需材料。

从德国方面提出来军事同盟，使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等陆军首脑部很高兴，在1938年6月刚刚改组后的近卫内阁五相会议上，由板垣陆相提出了同盟方案。8月，近卫内阁正式决定开始谈判。

德国也估计到要同英法作战，因此，主张军事同盟的对象不仅包括苏联，而且也要包括英美法。对此，在日本方面担心对美战争危险性的海军、元老重臣等宫廷集团和近卫等政府首脑主张只把苏联作为军事同盟的对象。陆军为了对苏备战而强烈希望同德

国结成同盟，要求接受德国主张，尽早缔结同盟，因此，在五相会议上陆相和外相、海相之间意见对立，没能做出结论。近卫内阁因围绕三国同盟问题阁内意见对立，终于1939年1月实行了总辞职。

继近卫内阁之后，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组织了内阁。平沼是内务司法官僚的总后台，是右翼团体国本社的首领，是元老重臣们经常警惕的人物，但由于近卫推荐，组成了前内阁阁僚过半数留任、具有近卫内阁延续性质的内阁。

平沼内阁最重要课题也是三国同盟问题③。可是，国内意见的对立，依然没有解决，谈判由于日本方面的缘故一再拖延。

国民生活的贫困

战争的扩大不能不给国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随着全面战争开始的庞大的军费开支，引起了通货膨胀。1939年10月，公布了把物价、房租和地租等冻结在9月18日水平上的九·一八价格停止令，连工资和薪俸也包括在内，但结果是工资冻结了而黑市物价暴涨起来。

把所有民需工业改变为军事工业的结果，造成了国民生活必需的所有物资奇缺。首先短缺的是同军需品直接竞争的火柴、腊烛、肥料和燃料油等日用品。接着衣料全面短缺。从1938年6月起，民需的所有棉制品都禁止在国内制造、销售和使用，翌年还包括了毛制品和混纺织品。到了1940年，连砂糖、火柴和乳制品都实行了凭票配售制。

在这些日常生活必需物资短缺中，给国民生活影响最大的是粮食的不足。由于战争的军队动员和军需工厂征用劳力，造成农村劳力不足。而且，改成军需工厂的结果，肥料和农机具也停止了生产。一方面，由于军队的大量需要，农产物不足，尤其是稻米不足成了严重问题；另一方面，1939年，日本西部、朝鲜发生大旱灾，

粮荒益趋严重。因此，从1939年起，采取了强制征购稻米和禁止使用精白米的措施，翌年施行了食粮管理法，对主食实行了全面统制，对消费者实行凭证定量配给制度，并且连木炭和食盐等也实行凭证供应，几乎所有物资不是凭票就是凭证，而另一方面，黑市交易到处泛滥。

通货膨胀、粮食短缺、物资不足和黑市泛滥对国民生活造成了难以忍受的压力。而在另一方面，为了把国民动员到战争中去，在精神上也加重了压力。这次战争同甲午、日俄战争的情况不同，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拿不出说服国民主动合作的大义名分来。政府的战争目的，天皇敕语中的开战理由，除了"膺惩暴戾的中国"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因此，为了强制动员国民合作，从开战后的9月起，政府就展开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这是想把过去反复进行的教化总动员运动、自力更生运动和选举肃正运动等官办国民运动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但它毕竟只不过是官僚领导的形式的运动。强制推行饮食店和娱乐游戏场所的每月停止一次营业，上学和上班要带太阳旗饭盒（饭盒中的大米饭上放一粒红色渍酸梅——译者），参拜神社和遥拜皇宫，但这些措施根本没能调动起国民对于战争的主动合作。每当日军占领中国主要城市时，都隆重举行祝捷大会、持旗游行和提灯游行等来谋求提高国民斗志，不过，这些活动都是强制动员在乡军人会和爱国妇人会等官办团体以及中、小学生参加的，并不是国民主动参加的。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尽管声势浩大，看上去冠冕堂皇，但根本没能收到任何实质效果，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竟然遭到了内外的批评。1939年3月，平沼内阁设立以荒木贞夫文部大臣为委员长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④，谋求改组和发展运动，但它只能把运动分裂成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和过去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两个领导系统，没有能够调动国民的自发力量。

人民战线事件

战争一开始，批评战争的势力固不待言，连有批评可能性的组织和对协助战争抱消极态度的人全都成了镇压的对象。早在1936年7月，山田盛太郎、平野义太郎等讲座派的学者，宫本百合子、洼川稻子等无产阶级作家等不搞政治活动而只进行合法的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都被捕了。

1937年12月，被捕的有山川均、荒畑寒村等劳农派学者、铃木茂三郎和加藤勘十等左翼社会民主主义者，铃木和加藤等的日本无产阶级党和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都被迫解散了。他们同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处于对立地位，但检举的理由是说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企图结成日本人民战线（第一次人民战线事件）。

接着，在1938年2月，东大教授大内兵卫和有泽广巳，法政大学副教授美浓部亮吉等劳农派学者，江田三郎和椿繁夫等社大党左派干部也以所谓曾企图组织人民战线为理由而被捕了（第二次人民战线事件）。

当时只要不肯誓做战争合作者的，不论其立场如何，都被打上共产主义者烙印而逮捕。工会、农民组合以及稍微带有反战反体制倾向的都成了镇压的对象。

对于在战争前夕的1937年4月选举中获得一百万张选票而当选三十七名议员的社会大众党，有识之士期待它成为反战、反法西斯的力量。可是，社大党在1937年11月大会上修改纲领和政策，表明了支持战争的立场，并通过了日中战争“是日本民族的圣战”的运动方针。总同盟也在10月大会上，做出“决心在事变中彻底消灭罢工”的决议，和社大党同一步调，采取了美化战争态度。社大党和总同盟等为了在战时保存下来，率先和法西斯同一步调支持了战争。

在直接镇压运动的同时，还进一步加强了对于思想和言论的取缔和控制。开战不久的1937年9月，把过去的内阁情报委员会升级为内阁情报部⑤，作为统制言论思想的中央机关。一面加强报纸杂志和出版物的检阅，一面强制要求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协助战争。许多作家、画家和摄影师等以陆海军报道员身份被派到中国战场去从军，大报社也派出很多记者为特派员。战况报道和新闻影片以及随军作家（叫做笔杆子部队），为关心亲人是否平安的后方国民提供现场报告。新闻报道满都是战争消息了。

① 总动员法等于使议会放弃审议权，授与政府无限权限的空白委任证。因此，在议会审议中提出了不放心的质问。近卫首相回答说，总动员法“在这次事变中不直接使用”，使之在3月通过了该法。可是，早在7月就动用了它的部分条例，对工人的雇用和工资等实行统制，接着把统制扩大到了一切部门。

② 参谋本部作战科长稻田正纯说：在武汉作战之前有这样意图，即为了试探苏联有无战争意图，根据情况，即使牺牲一个师团也要进行侦察（《战史丛书——关东军（1）对苏备战诺蒙坎事件》，第342—343页，和木户日记研究会、日本近代史料研究会《稻田正纯氏谈话速记录》，第206—224页）。

③ 平沼内阁组成后的1939年1月，德国正式提议把三国同盟问题作为政府间的正式议题。有田八郎外相在五相会议上提出了削减日本对苏联以外国家参战义务的妥协方案，但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和驻意大使白鸟敏夫都反对这个方案，日本方面没能取得一致意见。在五相会议上也因为畑俊六陆相和吉田善五海相、有田外相之间的意见对立，始终议而不决。

④ 1937年9月，近卫内阁发表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实施纲要，根据这个纲要，10月组成了以有马良桔海军大将为会长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央联盟，作为推进运动的母体。该联盟采取了民间团体的形式，但实际是官僚领导的政府外围团体。认为这个联盟的模糊性质和组织，不适于国民运动的发展，1938年7月，近卫内阁把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了由首相、内相、文相、藏相组成的内政会议。总动员委员会是把这个内政会议的权限接收过来的。

⑤ 内阁情报部在1940年12月6日进一步扩大和加强，成为情报局，把陆海军的报道部、外务省情报部和内务省警保局的检阅科合并起来，成了统制思想的中心机关。

第三节 新体制的建立

诺蒙坎事件

大力重整军备完成战争体制的德国，在英法绥靖政策帮助下逐步进行侵略的准备，首先于1938年3月，闪电般地侵入奥地利，加以合并。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又成为它的侵略目标，1938年9月，希特勒、墨索里尼、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开会，签署了决定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英法两国是想使德国侵略矛头指向东方来保全自己国家安全的。

德国当加快侵略步伐时，更加迫切期待签订三国军事同盟。可是，日本方面自从1938年近卫内阁时开始谈判以来，如前所述，陆军主张早日缔结德国提出的全面军事同盟，而海军、宫廷集团为了避免与英美对立，主张同盟对象只限于苏联，两者坚持对立难以决定态度。接替近卫内阁上台的平沼内阁，在五相会议上反复讨论了七十多次，但也没有得出结论。

1939年5月，日德同盟问题动摇了日本政界上层人物。这时在"满洲"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境诺蒙坎，发生了日军和蒙古、苏联军的冲突。关东军违反中央的不扩大方针，一再增加兵力，演成了地道的大兵团战斗。8月末，关东军在新编第6军之下，集中了从全满各地调来的飞机、坦克和炮兵发动了攻势，苏军也增加兵力转入反攻，日本方面一个师团被全歼。继张鼓峰事件之后，再一次证实了苏军的火力和机动力量占压倒优势。因此，陆军下定决心搞军备现代化，确定必须在几年内停止对苏作战的方针。

在诺蒙坎事件激化的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突然发表了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德苏提携的报道对日本统治者是一个严重的冲击。平沼内阁停止对德同盟谈判，同时发表声明说，欧洲形势"复

杂离奇”，便实行了总辞职。日本统治阶层在国际形势瞬息转变的时候丧失了独立自主的适应能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9月1日，德国大军开始入侵波兰。与波兰缔结友好互助条约的英法，9月3日对德宣战，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平沼内阁总辞职后，8月30日，刚继任的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内阁发表“不介入欧洲战争”的声明，继续处理日中战争。

在军事上无法使中国屈服之后，日本统治阶层只有靠策略搞和平工作来结束日中战争。可是，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凭一小撮军阀和政治家的策略活动而产生动摇，日本方面搞的和平工作，根本结束不了战争。

在国民政府内处于孤立的汪精卫，于1938年11月由重庆逃到河内，12月发出和平通电。但是，与搞汪精卫逃脱工作的日本方面策略机关和汪精卫周围人们的期待相反，汪本人几乎没有影响力量，中国的抗战意志并没有发生变化。可是，以陆军为中心的日本方面却抱着让汪精卫来组织新的国民政府，然后与它媾和，以结束战争的不切实际的想法。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合并了华北的临时政府和华中的维新政府。然而，这个汪精卫政权是在日军庇护下，在占领区内建立起来的地地道道的傀儡政权，没有一点实力和影响力，只起了使实现和平更加困难的作用。

日中战争陷于僵局，国内经济矛盾这时更加深刻了。继1939年粮食危机之后，衣料品和日用杂货显著短缺，国民生活困难的程度与日俱增，国民的厌战情绪日益严重。在国内、对外问题上都处于走投无路的阿部内阁，为政党和国民所唾弃，陆海军也不再

支持了，1940年1月实行总辞职，代替它的是海军大将米内光政内阁。但在缺乏强有力的基础和没有具体解决方策这点上，米内内阁也和阿部内阁并无二致。

大政翼赞会的成立

1940年5月，德军在西部战线开始了大规模攻势，立即击溃英法联军，6月17日，法国投降了。这是德国趁英法两国还没有完成战备之机，以飞机和坦克为主的机动作战取得的胜利，这里显示出充分备战和战备不足的差别。德国这次闪电战的胜利使日本统治阶级产生了幻想。他们以为英国的屈服近在眉睫，产生了大战的趋势很快就决定了的错觉，急切想乘德国的胜利捞上一把。

"赶快坐上公共汽车！"这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一个口号。所谓赶快坐上车有两个内容：一是由于英法联军战败而失去统治者的东南亚殖民地，即法属印度支那、荷属印度尼西亚和英属马来等这些战利品觉得就摆在眼前，迫不及待地要和德国合作，进军南方。于是出现了缔结一度成为悬案的日德军事同盟，威胁法国进军法属印度支那的动向。

另一个是国内体制的强有力的一元化。为了进军南方也好，或为了准备将来对苏作战也好，确立国内战争体制是必要的，于是认为必须效仿德国建立强有力的一国一党独裁体制。

这样，与欧洲战局的变化相呼应，在国内一下子冒出了一个新体制运动。这个新体制运动是在政治上推倒稳健的米内内阁，代之以在强有力的新党基础上成立的新内阁，新党拟定以近卫文麿为总裁。以近卫为中心的新体制运动包含有几种不同想法。

一个是近卫的亲信风见章、有马赖宁和后藤隆之助等昭和研究会集团所提出的国民组织论。他们主张为了拥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必须使国民组织化，利用国民的组织上的团结来创造对抗军部

的政治力量①。

另一个是以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等陆军实权派和靠近军队的政党人物设想的组织纳粹式一国一党的方案。并且，对于新组织的头头，武藤也想要由在国民中有威望、作为革新人物受到各方面期待的近卫来担任。

第三个是政友会和民政党等原有政党集团的活动。脱离政权很久的这些政党的意图是，以组织强有力的新党来重新接近政权。这时他们认为新党的总裁应该是最接近政权的政治家近卫。

1940年6月，近卫的好友木户幸一就任内大臣，而近卫一辞去枢密院议长职务，发表开创新体制的声明，一下子就掀起了新体制运动的高潮。唯恐来不及参加近卫新党的各政党争先恐后地自动解散了各自组织。跑在最前头的是社会大众党，它在近卫刚刚发表了声明的7月6日就率先声明解散，直到8月为止，政友会的久原派、中岛派和民政党依次宣布解散，争先恐后地挤进了新体制。

对建立新体制最热心的陆军，让畑俊六陆相单独辞职，以使米内内阁垮台，7月22日，使近卫成立第二届内阁。近卫内阁的登台加快了新体制运动的步伐，在一切部门里，新体制这个词成了时髦语，各种势力都争先恐后地赶乘新体制这部公共汽车。

然而，在近卫内阁下进行的新体制的组织化，作为一种政治势力，是以没有任何实质的、纯粹精神运动的组织而告终了。这是由于以新体制为目标的各种势力各有自己的打算，和根深蒂固的天皇制思想意识以及强大的官僚机构等存在的结果。对于新体制成为象军部所想象的强有力的一国一党政治组织，从天皇周围的宫廷集团和精神主义的右翼方面发出了强烈的谴责，认为这是侵犯天皇权限的幕府组织。此外，对于新体制成为团结国民的政治组织，官僚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感到国民的组织化有引起批判和抵抗表面化的危险性。于是组织起来的大政翼赞会，自己就否认是政治

组织，而认为是以“万民翼赞”、“承诏必谨”为口号的单纯精神运动机关。翼赞会总裁由首相兼任，支部长由府县知事兼任，实质上只不过是由内务官僚领导的、和以前一样自上而下的官办国民运动。

加强对国民的统治

大政翼赞会虽说实质上变成了精神运动机关，但新体制运动却彻底加强了对国民的官僚性统制和统治。

翼赞会除了中央和地方都同官僚机构形成一体之外，它还成立了部落会，町内会和邻保班的基层组织。邻保制度是古代的共同体组织，明治以后基本上瓦解了，但是法西斯把它作为直接控制民众的组织，在重新改组的基础上又复活起来。有别于行政村的自然村的部落，明治以后才取得法律上的承认②，以前搞农村自力更生运动时，成了农事实行组合和清理负债组合的单位。当日中战争全面化以后，作为防空演习、欢送出征士兵和迎接骨灰等动员单位，利用了城市的町会和农村的部落会。进而，由于粮食和日用必需品的不足而开始实行配给制时，又被用来作为配给单位了。

1940年9月11日，内务省发出训令，提出部落会、町内会、邻保班、市町村例会整备纲要，责令全国一律整顿町会、邻组及其各单位的定期集会的例会。并且，第二年把町会和邻组作为大政翼赞会所领导的组织，从7月以后通过广播主持召开了全国邻组统一例会。通过这种方法，把全体国民在其居住地编入官僚机构的基层组织町会和邻组里了。这个邻组制度是把地方上的小头目③编入官僚统治的基层里，以图贯彻统制和动员。

不仅在居住地加强了组织化，而且在工作岗位也加强了组织化。1940年7月，连总同盟等最后剩下的工会也被迫解散了；同年11月，作为翼赞会的外围团体成立了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产报④。产报是要经营者和工人都加入由特高警察、劳务管理者、右翼工会

的领导者担任干部，每个警察署的管区都建立支部，是地道的官僚统治下的动员组织。工会最盛时期的会员全国不过三十万人左右，而产报通过强制加入，成为全国有六百万人的庞大组织。

在其他职业领域也都成立了农业报国联盟⑤、商业报国会、言论报国会等各领域的报国会。青年组织统一于大日本青少年团⑥，妇女组织统一于大日本妇人会⑦，和帝国在乡军人会一起发挥了动员组织的作用。于是所有的政党和工农团体以及一切民众的自发性组织都被破坏了，把所有民众都在居住地和工作岗位被编入官办的国民运动组织里，统一于天皇制统治体制之内，用以确立日本法西斯的统一的民众统治体制。

这样的全国人民的彻底组织化和通过官僚的统治，是日本法西斯的一大特点。

① 近卫和有马、木户等人商议，认为第一届内阁软弱无力的原因在于没有政治基础，因此计划建立新党，以便有国民为后盾。（有马赖宁《政界道中记》，日本出版协同，1951 年版，第 230 页）。

② 自明治以来的地方行政是，把行政村作为官僚统治的基层组织，采取了不承认自然村的方针，正如在部落所有森林原野统一运动和氏族神统一运动中所看到的那样，其目的是破坏作为共同体的自然村。可是在农业危机对策中，不得不利用自然村的共同体机能，1932 年 10 月在农林省下达的关于恢复农村、山村、渔村经济的训令和1933年 3 月的农村负债整理组合法里，正式承认了部落是农村的单位。

③ 担任町会长和邻组长的干部主要是中小工商业主、退役军人、教员、神官、僧侣和中小地主等中间阶层。丸山真男在《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和运动》（《现代政治的思想和行动》未来社，1956 年版）中，把日本的中间阶层划分为两个类型：第一个类型为小工厂主、商店主、小地主、上层自耕农、小学和青年学校的教员、官公署职员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第二个类型为城市月薪生活者、文化界人士、报刊杂志记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主张第一个类型的中间层形成了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在基层支持邻保制度的人物，大都属于第一个类型。

④ 产业报国运动在协调会提议下，于 1938 年 7 月开始成立产业报国联盟，1939 年总同盟分裂，加入产报者增多。1940年 6 月，已经组织了三万五千个报国会，有七十万会员。1940年 11 月 23 日，解散所有工会后，作为劳资统一组织，组成了大日本产业报国会。会长为贵族院议员平生钒三郎，理事则由官僚和资本家充任。

⑤ 农业报国联盟作为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一环，于 1938 年 11 月组成，1942

年进入大政翼赞会属下，1944 年 5 月改称为农业报国会。只剩下不多的农民组合，根据政府的劝告，1940 年 7 月，日本农民组合总同盟，同年 8 月，大日本农民组合，9 月，日本农民联盟相继解散。

⑥ 大日本青少年团是以 1925 年创立的青年团体的全国组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为核心，1941年 1 月，合并大日本联合女子青年团、大日本少年团联盟和帝国少年团协会等三个团体而成立的，是大政翼赞会的下属团体。

⑦ 大日本妇人会是过去一直对立的爱国妇人会和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再加上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在 1942 年 2 月合并起来，作为官办妇女团体而创立的大政翼赞会的下属团体。

第四节 日美对立

时局处理纲要

德国闪电战的胜利，给日本军部尤其是陆军以很大冲击。荷兰、法国的战败，英国的危机，被日本理解为是攫取这些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陆军中央部就开始对进攻荷属印度尼西亚和法属印度支那作了具体准备。从法国刚刚投降后的 1940 年 6 月 21 日起，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有关科长和主任者连日反复进行讨论，制定了适应欧洲形势急剧变化的战争计划的事务部门草案。这个草案命名为“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①，7 月 3 日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首脑会议上定为陆军方案，第二天向海军方面提出。海军方面接受之后也制定了海军方案，在陆海军事务当局之间进行调整后，7 月 22 日，即第二届近卫内阁组成之日，在陆海军首脑会议上决定这个“处理纲要”为军部方案。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内阁成立后召开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连把这个纲要决定为国策的程序都确定了。

陆海军调整结果决定了的《处理纲要》，决定使用武力解决南方问题，在使用武力时，力求把战争对手限于英国，但“考虑到对美战争可能难以避免，务期作好万无一失的准备。”这就是要把南进

和对美英战争作为国策决定下来的划时代的方针。

这个重大决定，首先是由陆军事务当局草拟的，它竟原封不动地成了国家的意志，其经过不能不说具有重大意义。

开始南进

第二届近卫内阁的成立，意味着日本南进的开始。近卫在组阁之前，把陆、海、外三大臣候补者东条英机、吉田善吾和松冈洋右三人召集到荻洼的私宅荻外庄来，确定了内阁方针。在这次荻外庄会谈时，就按陆军的主张决定了南进、同德国加强合作和确立国内新体制。第二届近卫内阁于7月22日成立，在7月26日内阁会议上立即决定《基本国策纲要》，其方针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和建成国防国家。接着于27日召开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按照军部的计划，无修改无条件地决定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决定了包括武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和确保荷属印度尼西亚资源等政策在内的南进政策。在这个纲要里，为了解决南方问题，认为有行使武力的可能。首次把对英美战争提到日程上来②。

根据这个方针，南进立即开始了。对已经投降德国的法国维希政权进行威胁，并压迫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迫使其承认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9月23日实行了进驻。又唆使泰国，与法属印度支那之间挑起边境纠纷，并强行介入这个纠纷，把老挝和柬埔寨的一部分领土割让给泰国。对于荷属印度尼西亚也为了获得石油等军需资源，从8月起开始了谈判。

这样开始的南进必然会刺激美国。7月26日，美国对于日本必需的石油和废铁实行了输出许可制。这虽然不是禁止输出，但在7月31日却禁止输出航空机用汽油，于是日美关系加剧了紧张。

反之，靠拢德国却加速了。两年多迟迟不得进展的日德军事同盟谈判，在9月德国特使斯塔玛来日时，一举就达成了协议，9

月27日，在柏林签署了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过去三国同盟谈判，在是否以美国为对象上产生了分歧，但是，这个同盟显然是以美国为对象而缔结的。于是，世界的法西斯国家结合起来组成了日德意轴心。

南进政策之后，又缔结了三国同盟，使日美关系更加紧张起来了。美国在7月禁止输出航空机用汽油之后，9月在许可制的品目中又禁止了废铁和钢铁的输出，牵制了日本的武力南进③。对于靠从美国输入战争必需的石油和钢铁的日本来说，这个措施可以说是个致命的打击。这固然不是美国石油停止进口了，但是美国表示了随时可以全面停止出口，掐住日本脖子的态度。

欧洲战局的变化

日本冒着对美冲突的危险，硬向南进转变，这是由欧洲战局的急转直下促成的。但是，后来的欧洲局势并没有象日本预期那样进展。南进论的前提条件是，预想在法国投降之后，接着德国就要进行英国本土登陆作战，英国不久就会屈服。可是，法国投降后，希特勒并没有立即进行英国本土登陆作战的准备，也没这样意志。从8月中旬起，为了打下英国本土登陆作战基础，德国空军开始对英国本土进行了空袭。但是，直到9月的这个"英国之战"的空中战，以德国空军的失败而告终。这是由于德国战斗机的续航距离短，不能护卫轰炸机，以及英军有效地使用雷达和英国战斗机一直掌握了英国本土制空权的结果。9月17日，希特勒指令延缓对英国本土登陆作战，从此以后把主力倾注于准备对苏进攻。

在德国开始进攻西方的同时，英国对德绥靖论者张伯伦下台，丘吉尔就任首相，号召国民坚决抗战，顶住德国的空袭，并开始准备正式反击。在摆脱了法国投降后的危机，一直保住了制空权以后，英国战败的可能性就越来越渺茫了。

中国战线的僵局

南进招致美国的强烈反抗，欧洲战局也没有象想象那样进展，从一时兴奋中醒悟过来的1940年末，如何处理中国的战争又成了日本最大关心的事情。

1940年11月13日，大本营和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中国事变处理纲要》④。这个纲要的主旨是要和重庆政权进行和平谈判，但到1940年底仍然没有成功时，便转入长期战，恢复军备的机动性，准备进军南方。陆军自己承认中国作战的失败，放弃了单独解决战争的方针。1941年1月16日，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⑤。根据这个计划，以1941年秋季以前为第一期，在这个期间不放松现在压力以谋求解决日中战争；其后为第二期，则转入长期持久战体制，决定在几年之后把在华陆军兵力缩减到五十万人。

日本当看不到日中战争在军事上可能取胜时，企图以策略解决战争而扶植了汪精卫政权。可是，很明显，这个政权也根本起不了解决战争的作用，为了摆脱一直陷在长期战泥潭中无法自拔的处境，除了期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别无他途。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的目的是国家为了贯彻其意志以暴力消灭对手国的抵抗力量。消灭一个国家的抵抗力量有三个手段，即毁灭其战斗力、占领其国土和使敌国丧失战争意志，尤其使丧失战争意志更为重要⑥。在日中战争中，日军在歼灭中国主力军中遭到失败，使其逃到内地，再也不能占领比1938年秋季战线更大的中国领土，在占领区内也只不过保持点和线。中国的人民和政府的战争意志，随着战争长期化越来越高昂。日本方面则与此相反，陆军在军事上已失掉胜利的信心，甚至于计划主动撤兵，国民厌烦这种出师无名的战争，政府一直苦于长期战争的矛盾。从克劳塞维茨理论来看，日本早在这个阶段在日中战争中不仅不能取胜，而且正

在败北。

日美谈判的开始和日苏中立条约

1941年初，由日美双方出现了调整两国紧张邦交的动向。日本方面重新估计了美国经济制裁打击的严重性，还因为欧洲战局和中国战线形势都没有象期待那样取得进展，便痛感当前调整日美关系，以确保物资输入，确立战争体制的必要性。

美国也要求暂时稳定对日关系。罗斯福于1940年11月许愿“不把子女送上战场”而第三次当选了总统，可是在当选的同时就加强了对英国的武器援助，发表要成为“民主主义兵工厂”的宣言，开始大力扩张军需生产。接着，1941年1月，在华盛顿召开了英美两国军事首脑的最高军事参谋会议，协商美国参战时对德国及其同盟国的共同战略，3月制定了ABC协定。美国陆海军开始了大规模扩军，加快了备战的速度。然而，美国的备战是刚刚开始，因此，当时对日本需要争取时间。罗斯福和美国军部采取了首先打垮德国的欧洲第一主义，需要尽量拖延日本的武力南进。这样，两国各自从自己的打算出发，新任的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⑦和赫尔国务卿之间，从1941年4月起在华盛顿开始了调整两国邦交的谈判。

日美开始谈判之前，在民间进行了两国的私下调整工作，并制定了私人方案《日美谅解案》⑧。4月16日，在野村和赫尔会谈中一致同意姑且以这个私人方案作为谈判基础。这个谅解案对于日本极为有利，不过美国并没有承认这个方案，赫尔反而提出“尊重一切国家的领土和主权，不干涉内政、尊重一切国家平等的原则和维持太平洋现状”等对日本极严厉的四原则，以此表明了美国的态度。

汇报这个谅解案的野村和岩畔的电报内容，似乎说这就是美

国政府的提案。近卫和陆军都在苦于南进的停顿和日中战争的僵局，对日美谈判抱着很大期望。

这时恰好松冈外相正在访问德意两国。松冈往返都经由西伯利亚铁路，也有意同苏联调整邦交。松冈的目的在于显示日德意的团结，同时通过德国斡旋调整日苏关系，以便南进。可是，这时希特勒已经下了对苏战争的决心，反而对松冈要求日本进攻新加坡。松冈没有察觉到德国的意图，归途在莫斯科和斯大林会谈，4月13日签署了日苏中立条约⑨。条约规定两国尊重领土完整和互不侵犯，如缔约国的一方成为第三国军事行动的对象时，另一方保守中立，条约为期五年。

日本没有察觉德苏战争已经迫近，为了南进而希望北方暂时保持稳定，这和苏联估计到德国侵略的危机，希望避免来自日德两国东西两面夹击的想法不谋而合。斯大林打破惯例亲自到莫斯科车站为归国的松冈送行，出现了斯大林拥抱松冈致意的有名插曲。这个时期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对于苏联来说确实值得高兴。

日苏中立条约在4月24日提交枢密院审查。顾问官提出德苏如果发生战争时，日德军事同盟和日苏中立条约有无矛盾的质问，松冈回答说，在法理上会发生矛盾，但日本要凭独自的立场来决定，东条陆相说明，“尽管有了这个条约，对苏军备要日益充实。对苏必须不断施加威压。违反条约是各国都有的实际情况。”平沼内相表明“镇压共产主义不变”的严加取缔国内的态度⑩，这说明日本起首就根本没有想遵守这个条约。

德苏战争的开始和关特演

1941年6月22日，德国开始了对苏联的突然袭击。德国空军在开战伊始就以航空歼灭战掌握了制空权，边境的苏军遭到突然袭击而溃败，德军以破竹之势继续进攻。希特勒早在7月4日

就发表了胜利演说，宣传德国用两个月就会使苏联投降。

德苏战争对于日本来说也是没有意料到的冲击。从6月初就得到了德苏即将开战的情报，但当实际上一开战，日本统治者竟陷入大混乱的漩涡中。刚刚缔结日苏中立条约回国的松冈外相，当6月22日一开战立即进宫，奏请天皇马上对苏开战。近卫首相则与此相反，认为德苏战争是德国对日本的背信弃义，主张宁肯暂时把三国同盟放一放也应继续日美谈判。⑪

陆军较早地得到了德苏战争的情报，从6月中旬就开始研究了在这种情况下的态度。陆军内部出现了必须与德苏战争相呼应立刻进攻苏联的北进论，和对苏战争需要大规模的准备，首先必须侵略南方获得重要物资的南进论的两者对立。于是，6月14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之间制定了暂时的方针。这就是如果德苏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有利的话，就对苏参战，如果德国在欧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话，就实行南进，这是一个准备南北并进的方案。

海军，从1941年初起，武力南进和对美开战的想法就占了优势。在军令部和海军省中坚干部中强硬论占了优势，他们主张由于美国实行经济封锁，日本国力已处于每况愈下的地步，因此应立即下对美战争的决心，并且应该尽早开战⑫，而批判对美开战的干部，则被调离开中央。

从德苏开战后的6月25日起，连日召开大本营政府联络恳谈会，审议陆海军之间取得同意的《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这个纲要。这个纲要的方针是采纳"推进南进步伐，并根据形势的演变解决北方问题"的南进论和北进论双方的意见，摆开准备南北并进的阵势。即对于南方首先向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进行武力进驻，以后仍推行南进政策，为此，以"对英美不惜一战"的决心向南方扩张。对于北方，决定"暗中完成对苏武力准备"，"如果德苏战争的发展对日本极为有利的话，就

发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⑬，就是以完成对苏战争的准备来窥伺参战机会的方案。同时准备对英美战争和对苏战争的两头并进的国策就在天皇的“御前”正式决定了。

根据御前会议这一决定的对苏战争准备，为了加强关东军而进行了大规模的动员，为了保持秘密而称之为关东军特别演习(关特演)。这次动员把三十万的关东军增加到七十万，在“满洲”集结了16个师团和一半陆军航空部队、大部分机械化部队和一半弹药资材，是陆军创建以来的大动员。日本国内为这次动员而沸腾起来。

这次关东军的增强，国内外各方面都认为是日本准备对苏战争，这是必然的。把德军钳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前面而继续苦战的苏联，不能把远东兵力调到西方，必须防备日本的进攻。日苏中立条约，实质上就成了一纸空文⑭。

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和第三届近卫内阁

在日美谈判中，美国政府对日本政府5月11日的提案提出反提案，6月21日递交给了野村大使。这是想要把日本从三国同盟的参战义务中拉出来的方案，关于日中关系比较承认了日本的立场。虽然如此，但同日美谅解方案和日本政府方案相比还是严峻的，同时附有暗中谴责松冈外相的口头声明。

大本营和政府审议了美国方案，主张继续谈判的近卫和陆海军和主张停止谈判的松冈发生对立。7月16日，近卫内阁总辞职。但是，由木户内大臣主持的重臣会议，一致同意近卫再次组阁，7月18日，把外相换为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组成第三届近卫内阁开始工作。

军部对第三届近卫内阁警惕其是否要向对美协调和脱离三国同盟方向迈进。于是要求新内阁执行7月2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南进和北方战备，以及在不背离三国同盟之下继续对美谈判。其第

一步是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

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是6月25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南方作战的军事基地。日本要求的是西贡和金兰湾两个军港，以及把新加坡包括在续航圈内的八个航空基地。日本做好派遣部队的准备后，7月28日在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登陆，威胁法国政府，29日签署了关于法属印度支那共同防卫的日法议定书。

美国认为日本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计划，是南方作战的第一步。8月12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的军舰上举行会谈，发表了号称大西洋宪章的联合宣言，主张当前的战争是对法西斯主义保卫民主主义的战争。美国看清战争不可避免，便对日本采取了强硬态度。当7月26日明确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时，英美两国发表冻结国内的日本资产，荷兰也效仿了它们。8月1日，美国对日全面禁止石油输出。

美国禁止输出石油，对日本战争体制给予了致命打击。日本国内的石油生产还不到需要量的十分之一，四分之三从美国输入，其余靠由荷属印度尼西亚输入，因此，断绝石油输入，就意味着迫使日本陷入除了消耗国内贮藏的石油之外，别无他法的困境。当时贮藏的石油量九百万千升，即便不打仗也只够两年的消耗，如果发起作战行动，会更快就消耗净尽。军部，尤其是没有石油寸步难行的海军，最担心缺乏石油。7月31日，永野军令部总长上奏："这样下去的话，只有两年用的贮藏量。如果打起仗来，一年半就消耗净尽，因此，只有现在就动手"⑯。海军也是破罐破摔的主战论日益强硬起来。日本的战争指导者们就这样走上了对美英战争的道路。

①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关于从陆军方案和海军方案的制定到最后方案的制定经过，参照《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秦郁彦《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和军方的南进政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6》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等。

② 《时局处理纲要》的第三条中，指明南方行使武力的依据，在其第二项中规定"即使中国事变还没有处理完"，"如果内外各方面形势的发展特别有利的话，为了解决南方问题也可行使武力"。所谓"内外各方面形势的发展特别有利"在参谋本部和军令部负责人的《关于时局处理纲要备忘》里规定如下（参谋本部编《杉山笔记》第23页），即美国参战，分派到东方的力量就不多了，英国的败局就明显了，而日本这时对美国的战争准备已经做好。再有，即使上述这些条件还不具备，而美国实行全面禁止输出，危及日本国防时，则行使武力。可见这时就已经预料到实际上的太平洋战争了。

③ 美国6月发表禁止向日本输出机床，7月，把石油和废铁加进输出许可品种里，但实际还在输出。9月，对抗日军进驻北部法属印度支那，决定对日全面禁止输出，坚决禁止输出钢铁和废铁，但仍输出石油。

④ 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同汪政权之间的日华基本条约草案；但因汪政权显然不能成为中国的中央政权，所以，同重庆政权的交涉还是个问题，把预定承认汪政权的1940年年末以前定为同重庆政权交涉的期限。对于这个交涉也没有确切的估计，在军事上既然没有使重庆政权屈服的希望，便把结束的办法寄托于欧洲战局的变化而采取了持久战方针。

⑤ 从1939年秋季起，参谋本部已经制定了减少驻在中国的兵力，主动地缩小占领区、以便做好对苏战备的主动撤兵计划。但是，这个方针受到中国派遣军对于缩减兵力的抵抗而一再摇摆不定，在这样情况下制定了把结束战争委之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的没有主体性的方针。(《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2)》、《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

⑥ 克劳塞维茨著、篠田英雄译《战争论·上》第一编，关于战争的本质的第二章，战争的目的和手段(岩波文库，1968年版)。

⑦ 第二届近卫内阁任命野村为日本驻美大使是1940年11月27日，但野村征求近卫和陆海军关于调整日美邦交的意见之后，第二年春季才赴任。野村长期在美国生活，他和罗斯福是朋友，所以近卫期望对美谈判达成协议。

⑧ 所进行的民间交涉，美国方面是由天主教神甫德劳斯和华尔舒两个人，日本方面是由同近卫取得联系的原大藏官僚井川忠雄。最初在东京进行，1941年初迁到华盛顿，从这时起陆军省军事科长岩畔豪雄参加进来。谅解方案以中国承认"满洲国"、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政权合并、日军从中国关内撤出等为条件，约定由美国斡旋日中和平、缔结日美通商条约、美国援助日本取得南方资源，对日本来说是个非常有利的方案。

⑨ 由于缔结德苏不可侵犯条约而被德国外交出卖了的日本，这时还完全没有察觉到德国进攻苏联迫在眉睫，松冈妄想靠日德苏合作来称霸世界。美国把日苏中立条约看做是日本决心南进的表现，对日本提高了警惕心。

⑩ 深井英五《枢密院重要议事记录》岩波书店，1953年版，第145—159页。

⑪ 近卫文麿手记《为和平而努力》电通社，1946年版，第26页。

⑫ 在海军部内形成强硬论核心的是作为海军省和军令部的事务促进机关临时设置的政策第一委员会。以海军省军务第二科长石川佳吾大校为核心的这个委员会，在 1941 年 6 月 5 日写成的《在目前形势下帝国海军应该有的态度》(《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大东亚战争开战经纬（4）》第 61—75 页）文件，在结论中叙述如下："帝国海军在皇国安危的重大时局之际，为了不使帝国各种措施发生动摇，需要立即表明进行战争的决心(包括对美)，以坚定态度对待各种对策"。

⑬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第 531 页。

⑭ 德苏开战后不久，松冈外相对苏联驻日大使斯梅塔宁言明："如果日苏中立条约同日德意三国同盟发生矛盾的话，就失效"。 7 月 2 日，接到御前会议决定后，补充说明，日本对苏态度目前没有变更，但这个政策是否继续下去，那是将来的问题。由外相本身否定了日苏中立条约。

⑮ 《木户幸一日记》下卷，第 895—896 页。

第三章　太平洋战争

第一节　对美英开战

对美战争的决心

1941年7月2日，近卫内阁召开的御前会议的决定，是在德苏开战后的形势下，同时准备对苏战争和对美英战争的方案。陆海军的作战准备，不拘外交谈判情况如何，根据这个决定逐步具体化了。

进行了"关特演"的日本陆军，抱着由于德军的攻势苏联会减少远东驻军的希望。但是，德苏战争的局势并没有象希特勒所吹嘘的或日本陆军所希望的那样取得进展。7月中旬开始的斯摩林斯克战役，由于苏军的顽强抵抗，为防卫莫斯科争取了时间。8月上旬，参谋本部得出在本年内无法对苏开战的结论。本年内停止对苏开战的企图，是同促进陆军对南方的战备有关联的。陆军定出要在8月中进行南方作战的设想；开始动员和集结了必要的作战部队、资材和运输船只。

海军的南方作战准备进行得更为具体。相当于陆军动员的海军的出师准备，早在1940年11月就开始了第一阶段作业；本年8月15日，又全面地发动了第二阶段作业。这样，不仅把全部海军舰艇编入舰队里，转入战斗体制，而且还从民间征用了二百多万吨船只编入海军部队。

随着战备的进展，陆海军的作战计划也具体化了，8月中旬共同研究了南方作战问题。随着作战准备的进展，陆海军急于定出下定决心开战的时期。因为为了推动战备，很多部门需要有战争的决心。8月16日召开陆海军的局长部长会议①，研究了海军提出

的《帝国国策施行方针》，讨论了确定决心开战的时期问题，9 月 2 日，陆海军取得了一致意见。

结果，9 月 6 日，御前会议决定了《帝国国策施行纲要》。其内容是“在不惜对美（英、荷）作战的决心之下，以 10 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战争准备和对美谈判同时并进；这种谈判“到 10 月上旬还没有能够贯彻我方要求的希望时，立即决心对美（英、荷）开战”。这意味着限期开战的决定。

当作出这个重大决定时，实际策划战争的陆海军、政府、天皇和宫廷集团都无法掩盖他们的不安。不过，这是作战能否按计划实行的不安，而不是担心以世界为敌的这次战争会给国民带来怎样的影响。在召开这次御前会议前一天的 9 月 5 日。天皇把陆海军的统帅部长官杉山和永野召到宫中，对于战争的不安提出询问，最后大声叮问道“绝对能打赢吗？”然后对于杉山的说明又大声说“啊，知道了”，表示了谅解。近卫也好，特意参加御前会议的原枢密院议长也好，对于下定决心开战的决定都没有提出异议。天皇在御前会议上朗诵了明治天皇吟咏的和歌：“当今四海皆兄弟，世上何事起风波！”，但并没有反对这个决定。

根据这个决定，即拟以 10 月下旬为目标，完成战争准备的国策，陆海军正式开始了战争准备。陆军制定的作战计划是以大约十个师团兵力占领菲律宾、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南方各地区，开始动员和集中必要的兵力，为了这项运输征用了一百二十六万吨船只。海军制定的南方作战计划，包括开战伊始，偷袭夏威夷珍珠湾的作战在内，把联合舰队改为战时编制，作好了准备。国内战争体制以此为契机一举完成了。

东条内阁的组成

9 月初，日本的对美提案，是更加强硬地重新提出了过去的主

张。对此，美国重复赫尔四原则的根本态度没有改变。尤其是日美间争论的焦点——从中国撤兵问题，导致了毫无妥协余地的尖锐对立。10月2日，赫尔国务卿向野村大使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日本从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兵。日本方面收到这份备忘录后，10月4日召开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会上主张立即决定和或战的东条陆相、杉山参谋总长、永野军令部长和主张继续谈判的近卫首相等人发生了对立。日本统治者现在已经站在战争或继续谈判的歧路上了。

陆军认为9月6日御前会议决定的“贯彻要求的希望”已经不存在，因此，采取了应该决心按照决定开战的态度。海军军令部也同意这个意见。海军省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能对中国驻军问题作出让步，还会有希望。近卫不能下定开战的决心，仍然认为还有谈判的余地。近卫首相和东条陆相围绕继续谈判或停止谈判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对立。

这时，陆军，尤其是东条，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主张开战。对美战争的主角是海军，如果海军对战争没有信心，东条还让步到并非坚决主张非在中国驻兵不可的程度。如果海军反对战争的话，陆军就会撤回自己的主张，但这样就背离了过去御前会议上的决定，因此，内阁就应承担责任，实行总辞职。

关于和或战的问题，海军方面，尤其是及川海相的态度很微妙。10月12日，近卫在荻外庄召集陆相、海相、外相和企画院总裁等四相，开了讨论和或战的最后会议。前一天夜里，富田健治内阁书记官长悄悄访问了冈敬纯海军省军务局长，托付在明天会议上由海相主张反对开战。对此，海军回答说，海军也是反对开战的，但又不能公开说出口来，关于和或战，海相的态度是完全听任首相裁决的。②

如果对美开战，战争的主角显然是海军，东条等陆军首脑也承

认这一点。而一般人认为，海军首脑对当时日美的国力和军需生产力持有正确的判断，是反对对美战争的。[3] 然而，如果这的确属实的话，海军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战争的态度，应该说对于国民太也不负责任了。对于海军的这种态度，当时的吴镇守府司令长官丰田副武说："海军为什么不能说它是反对开战的呢？我后来听人说，海军鉴于长年领到庞大预算，一有机会就说'海防是铜墙铁壁，西太平洋的防卫万无一失'，事到如今，突然说没有信心，这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来。我对此实在没法理解。"[4] 果真如此，那么可以说海军为了自己的面子而回避了重大责任。

近卫首相的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下于海军。他在12日会议上表示，"对于战争我没有信心。我不能负责。"东条责备近卫说："对于开战有无信心的问题，应该在上一次御前会议时议论，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如果外交不行就决定开战，首相也出席了，并表示了同意，事到如今说对于战争不能负责，令人难以理解。"[5]

这样，近卫不能自己负起责任决定和战，便于10月16日实行了内阁总辞职。他虽然是经7月2日和9月6日的两次御前会议决定把日本引向战争道路的最高负责人，但到最后关头却想回避开战的责任。如果他真的反对战争，作为首相就应该始终为和平而努力。

当这次政变时，东条主张下届首相以皇族为适宜。他认为如果海军不希望开战，就必须废除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设法转变这种局面，而能这样做的只有皇族内阁。可是，木户认为如果组成皇族内阁，开始了日美战争的话，"万一得不到预期的结果，皇室有可能成为国民的怨府"[6]，因而反对东条的主张。天皇也支持木户的想法，并对近卫表明："让皇族来支撑政局，必须慎重考虑。尤其是和平时期尚可，而当有发生战争之虞时，为皇室着想，就更不应该让皇族出头露面。"[7] 所以推选了东条，主要是木户的主意，其

理由据说是东条最适于控制陆军内部，忠实于天皇的意志，让东条负起责任，以便回避战争”。[8] 可是，所以推选了主战论者东条来组阁，天皇和木户倾向于开战论也是其理由之一。近卫后来追述往事说：“反对开战的陛下因为受到陆海军人们夜以继日地贯输说战争不要紧、没错，便一点一点地转向这方面来了”。[9] 近卫还说：“其次说到陛下，陛下当然是和平主义者，始终希望避免战争的心情，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作为总理大臣，今天向陛下一说开战不利，当时陛下也赞成了，可是当第二天来到他的面前时，陛下却说，‘昨天你那么说了，可是，无需那么担心嘛’，稍微向战争方面靠近了。而下一次就更向战争论方面靠拢了。陛下听到了陆海军统帅部人们的意见，陛下的心情，仿佛是说，军方的事情，总理大臣不懂，而自已很熟悉。因此，一个对于统帅没有任何权限的总理大臣唯一赖以仰仗的陛下既然这样，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了”。[10] 天皇作为陆海军最高司令官，为了开始战争已经发下备战命令，批准作战计划，向战争方面大踏步前进乃是理所当然。

日美谈判的决裂

10 月 17 日，东条受命组阁。天皇当时召见东条和及川海相，特意嘱咐陆海军实行合作。木户引伸天皇关于陆海军合作的话，对东条进行解释说，这句话的主要意思是不必拘泥于 9 月 6 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要重新研讨国策。[11] 东条在 18 日的首次内阁会议上，提出了国策重新研讨的十一项提案，内阁会议表示同意，并在 10 月下旬召开了五次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重新研讨的结果，仅把 9 月 6 日决定的内容具体安排一下，并没有作出左右和或战问题的结论。

11月 1 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作出成熟方案，在 11 月 5 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帝国国策实施要领》是这次重新研讨的大致结

论。其内容如下，是决心对美英荷开战。

一、帝国为了打开目前的危局，达到自存自卫的目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现在决心对美、英、荷开战，并采取以下措施：

（一）发动武力的时期定为十二月初，陆、海军应作好作战准备。

（二）对美谈判，根据另项要领进行。

（三）谋求加强和德、意两国的合作。

（四）在发动武力之前，和泰国建立密切的军事联系。

二、如在十二月一日上午零时以前对美谈判取得成功，即中止发动武力⑫。

即决定以12月初为期，如我方要求不能实现时，则实行开战。对美谈判，准备了甲乙两个方案。甲案是全面的解决案，其中包括以二十五年为期驻兵华北、内蒙和海南岛的过分要求；乙案是局部的解决案，日、美两国约定，任何一方不向法属印度支那以外的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实行军事扩张，保证由荷属印度尼西亚取得物资，美国供给日本石油等，是日方大打如意算盘的要求。两个方案都和美国的四原则有天壤之差，根本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结果可以说是一个决定开战的国策。

11月5日，为了协助野村大使，来栖三郎大使飞往美国。可是，美国已经破译了日本外交的电报密码，得悉派遣来栖大使的目的不过是把谈判拖延到开战之日而已。而美国政府虽然得出了对日开战不可避免的结论，但从统一国内舆论着想，让日本开第一枪，以便使参战名正言顺。

11月5日，陆海军发出对美作战命令。陆军对以寺内寿一大将为总司令的南方军授与四个军、十个师团和两个飞行集团，（地面兵力为全军的五分之一、航空兵力为二分之一），这是一开战就对马来半岛进行偷袭登陆，大约用三个月时间占领东南亚一带的

作战。海军则以山本五十六大将为司令长官，以其联合舰队的主力协助陆军占领南方，同时，以航空母舰6艘为主体的机动部队，进行偷袭夏威夷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的作战。陆军作战部队分乘运输船各自开往发动进攻的基地；海军机动部队开始集结于进攻夏威夷的出发地千岛择捉岛的单冠湾。陆海军的战争行动一齐开始了。

11月26日，美国为答复日本的谈判提案，向野村大使递交了《赫尔照会》。其内容是强硬的，一切要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状态。27日，美国陆海军部向前线司令官发出了战争警告。可是，日本不拘有无赫尔照会，已经决定开战了。12月1日，为了决定对赫尔照会的态度又召开了御前会议，在这次会上，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可谈，只是在形式上决定了开战。

开战

日本统治者在同中国的长期战争中陷于泥潭已经丧失了胜利的信心，还要和拥有世界第一的国力和生产力的美国以及英国、荷兰等国开战，这时他们所担心的并不是战争给国民带来的灾难。统治者心想即使冒打了败战的危险，也要避免革命的危险，所以才决心打一场鲁莽的战争。[13]

因此，当对美英开战时，日本的战争指挥部只制定了初期作战计划，而没有制定出如何在这场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的计划。实际上已经决定开战之后的11月15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才做出了《关于促进结束对美、英、荷的战争的腹案》的决定。然而，这是以获得南方资源确立"长期不败的态势"，等待靠德国使英国屈服、美国丧失战争意志的方案，只不过是自己没有取得胜利的办法，专靠别人帮忙的主观愿望而已。

此外，日本统治者无论对国民和对全世界都没能阐明这次战

争的目的。在下定开战决心的11月5日御前会议之前，11月2日，天皇问东条："如何考虑大义名分?"东条回答："目前正在研究，不久当即上奏"。11月11日联席会议研究结果，决定了《对美英开战名义要点方案》，即以所谓"自存自卫"为名义。决定开战以后，才找出战争理由，这本身就表明这次战争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侵略战争。

当开战时，各有关当局都周密地研讨了初期的作战计划，军需物资的供给和运输。可是，关于国民生活将会怎样的问题，除了从治安对策的角度研究了如何确保最低限的食粮供应外，并没有别的想法。倒是加强取缔和镇压却成了国内对策的中心。统治者的态度是，即使国家化为焦土和牺牲国民生命，只要统治体制安泰，就不惜一战。关于最后决定开战的12月1日御前会议，杉山参谋总长做了如下记述："在今天会议上，看到圣上对于说明一一表示同意，没有一点不安的样子，容光焕发，实不胜诚惶诚恐感激之至"。⑭

根据这次决定，由大本营发出最后的开始作战命令。作战命令的具体内容已预先下达，这个命令是要以12月8日为战争的第一天，开始作战行动。这时进攻珍珠港的海军机动部队已经偷偷地在北部太平洋上行动；准备在马来半岛和菲律宾进行登陆作战的部队已经登上运输船，集结在发动战斗的基地。国民完全被蒙在鼓里，战争迫在眼前而毫无所知，以世界为敌的战争已经开始了。

① 陆海军局部长会议实际上是决定陆海军最高意志的，参加会议的为陆海军两省的军务局长、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的作战部长。

② 近卫文麿手记《为和平而努力》，电通社，1946年版，第91页。富田健治《日本战败的内幕》古今书院，1962年版，第188页。

③ 山本五十六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和古贺峰一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等海军在外作战部队长官都对战争采取批判态度，及川海相也持消极态度，这是事实。战后，这样主张的传记和读物大量出版，大体上已经成为定论。可是，他们当时并没有正式这

么主张。从他们担任的职责来说，尤其是海相的立场是最能够提出这样主张的。

④ 丰田副武《最后的帝国海军》世界的日本社，1950年版，第62页。

⑤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1》鳟书房，1953年，第197—198页。富田健治《日本战败的内幕》和佐藤贤了《大东亚战争回忆录》，德间书店，1966年版等也载有同样的问答。

⑥ 《木户幸一日记》下卷，第916页。

⑦ 近卫文麿手记《为和平而努力》第97—98页。

⑧ 《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第35页。

⑨ 富田健治《日本战败的内幕》第190页。

⑩ 富田健治《日本战败的内幕》第196页。

⑪ 根据《木户日记》，木户向陆海军两大臣传达时说："刚才，我推测陛下已经指示陆、海军要合作。其意思是在决定国家根本政策时，不要拘泥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还要广泛深入地研讨国内外形势，加以慎重考虑。仅遵上命，对其旨意加以申明。"这就是《重新研讨国策的圣旨》，但并不能说这是回避战争的指示。《木户幸一日记》下卷，第917页。

⑫ 参谋本部编《杉山笔记上》，原书房，1967年，第417—418页。

⑬ 福留繁《史观攻击珍珠港》、自由亚细亚社、1960年，其中叙述海军首脑部的想法如下："古贺峰一元帅对我说：'当时如果制止开战，就必定要爆发内乱。可是，考察历史，国家不会由于内乱而灭亡。亡国的是同外国的战争。因此，当时立于庙堂的负责人应该不怕内乱，坚决制止开战。'"

"山本五十六元帅也对我说过：'现在开战没有取胜的希望。至少应该等待空军军备有了信心的时机。开战一度可以制止，但接着发生的武装政变乃至革命政权走上战争，是非常明显的，怎么也没有制止的把握'"。

另外，通过近卫手记和木户日记也可以看到，以近卫为首的宫廷集团最害怕的是日本共产主义革命，因此，为要避免给国内带来混乱的政策上的急转弯，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拖入了战争。

⑭ 参谋本部编《杉山笔记上》，原书房，1967年，第543页。

第二节　展开总力战及其矛盾

陆海军的初期作战

陆海军的初期作战很顺利，空袭夏威夷和在马来亚登陆的偷袭作战都成功了。用主力航空母舰在险境下空袭夏威夷和运输船队，在敌人制空权下开往马来亚登陆作战都是危险的打赌，如果偷袭失败，就会带来极大的损失，但结果都赌赢了。空袭夏威夷，出

其不意地全歼了停泊中的美军战舰，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然而，从战略上看来，在这次进攻中，连一艘美国航空母舰也没有击沉，只击沉了在战力上早已落后于时代的战舰，不能说成功。进而再从政治策略上来看，这次攻击被说成是日本的偷袭，在"不要忘记珍珠港"的口号下，招致了使美国国民团结起来提高了斗志的结果。

在华盛顿的野村大使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最后通告时，是第一次空袭夏威夷以后的一小时二十分。因此，空袭夏威夷，结果是宣战以前的偷袭，给美国以极好的宣传材料①。不过，日本战争计划本身就是以偷袭为前提的，递交通告在时间上早些晚些，起首就不是计划的主要内容。

偷袭登陆马来半岛的开始时间，比空袭夏威夷还早一个小时。对英国不仅没有事前通告，甚至连谈判也没有进行，如果说突然袭击的话，这是地道的突然袭击。这次偷袭登陆虽经过了激战，却是成功的。12 月 10 日，日本海军基地航空队击沉了两艘英国远东舰队的主力战舰，确保了制海制空权。进攻菲律宾是采取了先以陆海航空队的空袭取得制空权后，由陆军登陆的正攻法。还进攻了香港、关岛和威克岛等英美基地，总之，初期作战几乎完全按照计划获得成功。

日本军以偷袭为作战方针，而英美则相反，采取了不遭到攻击不反击的方针，因此，初战一击的成功乃是理所当然。

开战和翼赞体制

对日本国民来说，开战完全是突乎其来的。12 月 8 日晨，无线电临时新闻广播了同美英开战的消息，当天正午，传达了天皇的宣战诏书②。开战的名义在诏书上是"为了自存自卫"。

为突然开战而吃惊的国民，因不断传来的夏威夷和马来亚海

战的捷报和利用宣传机器鼓吹的战争狂热而欢欣鼓舞。甚至连知识分子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对美英战争的胜利而感动，被战争狂热弄得飘飘然。

在这种战争狂热高潮中，终于加强了法西斯统治体制。在开战的同时，东条内阁以“非常措施”为名，同时逮捕了过去与左翼运动有关系的人物，有批判战争嫌疑的人物和在日本的朝鲜人中须要注意的人物等。接着，从 12 月 16 日召开的临时议会，通过了《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临时取缔法》和《战时犯罪处罚特例法》。前者为了加强言论统制，将原来有关政治性集会和结社的申报制改为许可制，实质上等于禁止了一切这种活动。后者为对战时犯罪加重刑罚。

此外，从 12 月末至翌年 3 月末的例行议会，接连不断地通过了《战时刑事特别法》、《战时民事特别法》、《食粮管理法》和《重要物资管理营团法》等战时法规和统制法规，加强治安体制，巩固了法西斯统治。

1942 年 4 月，相隔五年举行了众议院大选。他们以内外形势紧迫为借口，把在前一年 4 月任期已满，理应实行的众议院大选拖延了一年。这次是在加强治安体制基础上，抓住战争狂热高涨的有利时机才进行的。在选举之前，东条内阁收罗了一些政治家、财界人士和军人，以阿部信行陆军大将为会长，组织了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这个协议会，是替代政府推荐候选人的，并和内务省、各地警察密切联系，在公告大选那天以前，就推荐出全部定额候选人。政府总动员了市町村的官僚组织、警察和各种团体，公然干涉选举，为了只让推荐候选人当选而积极努力。

这次的所谓翼赞选举，定额的四百六十六名中，推荐候选人当选了三百八十一人；非推荐候选人也当选了八十五人。选举后，网罗推荐和非推荐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组成了新政治结社

翼赞政治会，由阿部任总裁。翼政会以外的政治结社、众议院内的交涉团体全部解散，事实上实现了一国一党制。5月临时议会开会，通过了感谢陆海军的决议案，政府提出的原案全部得到通过，变成了只以鼓掌通过的御用议会。

在翼赞政治会成立后，政府又改组了大政翼赞会，用以加强翼赞政治体制。在翼赞选举之前，1942年1月，成立了大日本翼赞壮年团。翼壮团在选举中用来作为实际行动部队，开始时是以团员自发性活动为主的翼赞会外围团体，可是，政府和官僚对于加强翼壮团的自发性活动严加警戒。5月，决定把过去各个省分别领导的国民运动组织，一律置于翼赞会领导之下，町内会、部落会和邻组也决定置于翼赞会领导下了。这样做的结果，半官办的一切国民运动团体和邻保组织都统一于翼赞会之下。翼赞会本身也变成了官僚机构的辅助机关，因此把全国国民置于官僚统治下的、统一的翼赞政治体制就确立起来了。

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

作战初期所以成功，在于有准备和无准备之间的差异。此外，英美在战略上采取了欧洲第一主义，专心致力于打倒德国的方针，因此在太平洋以采取守势作战为宗旨，并没有投入强大兵力。不过，显而易见总有一天会发挥他们的强大生产力转向大规模的反攻。可是，日本大本营被作战初期的胜利冲昏头脑，从1942年初开始计划了超过战争能力极限的大规模的下期作战。并且，还讨论了进攻澳大利亚和印度，但陆军和海军之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这是由于陆军考虑到南方作战告一个段落之后的对苏战争，而海军则采取了对美决战第一的缘故。其结果，在陆海军妥协的基础上制定的计划是，1942年夏进攻南太平洋的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各岛，以切断美澳之间的联系。

1942年4月18日，美国机动部队以陆军飞机突然袭击了东京等地。以这次空袭东京为契机，日本突然决定了进攻中途岛的作战。目的在于把日本本土的防空警戒线扩展到东方，并且和为了防卫中途岛而可能出击的美国舰队进行决战。

以联合舰队主力进行的这次作战，遭到待机中的少数美国舰队的反击，吃了主力航空母舰四艘全部被击沉以及丧失全部飞机和多数熟练飞行员的败仗。败仗的原因是情报能力的差距和转向重视航空战略过于迟缓。③

这次败战使海上势力的平衡一下子逆转了。以战舰为主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海上决战中航空母舰成了主角。可是，海军当局把这个事实对内外都保密，隐瞒了战局发生转变的事实。

8月，美军又以海陆两栖部队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进行了登陆作战。大本营轻视这次美军的反攻，认为能够很容易地夺回来，一次又一次地把为数不多的兵力投了进去，屡遭失败，为了这个岛屿的争夺战，海军消耗了大部分航空兵力和很多辅助舰艇，丧失了此后的积极作战能力。陆军把五万兵力运到这个供应跟不上的岛子上去，使大部分都饿死了。败战成为定局之后的1943年2月，才开始撤退残余部队，放弃了该岛，在这次作战中，日美两国的战争力量发生了很大差距，太平洋上战局的主动权完全被美国夺去了。

欧洲战局的转变

德苏战争的战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希特勒大吹大擂，1941年夏季，德军的攻势还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前方停了下来，这一年冬季一直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但苏军却守住了两个城市。从1942年春季起，德军以高加索油田地区为目标，把矛头转向南方。苏联把工业生产部门迁到乌拉尔以东，急速重建兵力

和装备，转入了反攻。从1942年夏季起，两军围绕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不断展开大规模的攻防战。并且，在日军从瓜达尔卡纳尔撤退前后的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军投降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了德苏战争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德军在东部战线继续后退，使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出现了转机。

独自承担了德国进攻的苏联，一再向英美要求开辟西欧的第二战场。可是，英美方面以准备不足为借口，拖延在法国登陆的时间，却在1942年11月进行北非登陆作战，把德军逐出非洲，于1943年7月，在西西里岛登陆。对于战局的前途已经绝望的意大利，在这个月把墨索里尼赶出了政府，组织了以巴多里奥元帅为首的政权，9月英美联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意大利立即向同盟国投降了。尽管战争的胜败已见分晓，而日德两个法西斯国家仍然没有改变把战争继续打到最后的态度。

战争经济的困窘

对美英开战使国内经济更加战时体制化了。开战以后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发布了种种统制令，推进了一切集中于军需生产的经济改组工作。在各个产业部门成立统制会，从原料和资材的分配、生产的分摊直到劳务和利润都进行了全面统制，垄断资本依此确立了对全部产业的支配权。于是，牺牲民需工业和中小企业，把所有资金、资材、劳动力都投入军需生产的体制形成了。

然而，牺牲一切扩大了的军需生产，不久就面临了它本身带来的矛盾之中。为了继续发展军需生产，就必须发展支持它的以基础生产部门为主的总生产力。即使只发展缺少雄厚基础的军需生产，如果不能保证原料、部件、劳动力的再生产，很明显，虽然暂时会有发展，但会立即耗尽原料和资材，陷于窘境。从瓜达尔卡纳尔作战以后，根本没料到的大规模的航空消耗战一开始，需要大量的

飞机和船舶，结果竟破坏了生产力基础——基本产业部门，仅就武器和军需品的生产而言，以 1943 年为顶点，以后生产量日益下降。

贸易和运输的杜绝更加快了军需生产的停滞。对英美开战，使日本和主要原材料供给地的美国、英属各地区的贸易完全断绝。而指望能够代替它的东南亚资源，只有把它运到国内才能发挥作用，但由于海上运输的断绝而成为不可能了。对于确保南方运输路线，日本的战争指挥者们很少关心。海军不愿拿出力量来护卫海上运输路线，从 1942 年下半年起，由于美国潜艇的攻击，运输船遭到了莫大损失。另外，陆海军都把有限的船只征来供作战用，对确保运输物资的船只并不关心。

运输的断绝给战争经济带来了致命的影响。军需工厂也由于资材不足，设备闲置起来，军需工厂多余的工人无活可做。1943 年 11月，为了军需生产的一元化计划和经营设置了军需省，但是在运输断绝和原料、资材缺乏的情况下，不仅不能扩大军需生产，连任何办法也制定不出来。

早在武器和军需生产下降以前，形成严重问题的是，以缺乏粮食为主的国民生活的破坏。这正是使战争体制崩溃的原因。由于战争，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再加上肥料和农机农具的缺乏，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另外，由于运输的断绝从外地进口粮食发生困难，食粮危机益加严重，从 1941 年开始实行的粮食配给制，成年人一天二合三勺(三百三十克——译者注)的配给量也难以维持，不得不掺杂粮。稻谷的舂米率也由最初的七分舂，下降到五分舂、二分舂，终于不得不配给只去壳的糙米。副食品的缺乏更为严重，因为蔬菜，肉、鱼类的短缺，也逐渐实行配给制，到了 1944 年全部食品都实行了配给制，④ 但只靠配给品无论如何也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因此，全国国民除了在黑市私买之外，就没有生活之路了，工人为了采购食粮当然要缺勤，国民的士气越来越低落。

战争经济的困窘，在战线崩溃以前，已经夺去了日本完成战争的能力。

① 这个通告原来计划在空袭前三十分钟递交，但由于大使馆的翻译和打字的迟误，成了事后的通告(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走向太平洋战争的道路(7)日美开战》朝日新闻社 1963 年，第 376 页)。可是，这个通告本身并不是表明战争意志的，只是意味停止谈判。

② 自 1939 年 9 月 1 日以后，每月一日定为兴亚奉公日，为了动员国民思想而强制进行各种活动，禁止娱乐，废除奢侈。在 1942年 1 月 2 日内阁会议上废除兴亚奉公日，决定把每月 8 日定为大诏奉戴日，在工作岗位和邻组“奉读”宣战诏书。

这个宣战诏书，与甲午、日俄战争的开战诏书相比，其特点是要求“众庶”即一般国民也要为战争作出努力，和没有声明尊重国际法进行作战的条款。

③ 很多人把这次战败的原因归咎于偶然因素，他们认为由于机动部队没有及时发现敌军机动部队而使攻击队起飞稍迟，遭到了先发制人的攻击所造成的，五分钟决定了胜败的命运(渊田美津雄、奥宫正武《中途岛》日本出版协同、1951 年，儿岛襄《太平洋战争一上》中公新书、1965年)。

认为这次战败的原因，是由于日本攻击中途岛计划的密码被破译，事前被美军发现。日本海军轻视情报，没有派遣足够的兵力去侦察。因此，从战术上看，美军已首就具备了突然袭击成功的条件。此外还有日本的临战侦察机，由于弹射器发生故障而起飞慢了；侦察机上的无线电发报机发生故障，因而发现美军航空母舰的报告到晚了等的一些偶然原因。以上这些都是偶然因素，但在战术思想上的轻视情报、机器发生故障等技术性的缺陷，即使不在这个时候发生，也总有一天会表现出来，因而中途岛的局面，或许出现在别的方面。战斗的胜败不能单纯归结于偶然因素，在思想和技术上存在着根本原因，应该理解为日美两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能力的差距，恰好在这次战斗中表面化了。

④ 逐渐实行凭票制或者配给制的情况，各地区有些不同，以东京为例，实行情况如下：1940 年 6 月砂糖、火柴；11 月育儿用乳制品；41 年 2 月大米；6 月木炭；7 月豆类(接着面包类、面条类)；9 月小麦粉、食用油、食用肉；42 年 1 月豆酱、酱油；2 月衣料类；11 月水果；43 年 5 月木炭、烧柴；44 年 11 月烟卷。配给量是微不足道的，例如：砂糖从 44 年 8 月起完全不供应，食用油在 45 年每人一个月二十克，鱼五天供应一次，每次每个人一块鱼段，烟卷成年男人一天六支，衣料品1945年每人一年一点二磅（一磅平均三·五码)(东京都《都政十年史》1954 年)。

第三节 悲惨结局临近

法西斯各国的败北

到了1944年，欧洲战线发生急剧转变，法西斯各国的败北已成定局。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苏联军队在德苏战线上确立了牢固的优势，从1943年7月开始的库尔斯克的坦克大战中，苏军在机械化兵力方面也压倒了德军。

苏联从当初的战术性失败和撤退中好转之后，在军事上对德国占据了优势地位，这是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败的伟大转折。苏联转入反攻，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中取得胜利，使纳粹德国演出"没落的起点"，是有其理由的。第一，与德国和日本的期待相反，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发生动摇，苏联人民在战争中团结得极其坚固。第二，尽管德国占领了俄罗斯欧洲主要部分，但苏联把工业中心转到乌拉尔以东，得以提高了军需生产和整顿了运输体系，1943年以后，大量生产优质的坦克和自动大炮，在武器方面也压倒了德军。第三，结成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打通了同盟国对苏联军事援助的道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使罗斯福和丘吉尔有了打赢世界战争的信心。

在西欧，德军的劣势也达到了无可掩盖的地步。尽管有苏联的要求，但英美对欧洲大陆的反攻在准备上耽搁了时间，未能顺利开始。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军事形势并没有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德国解除了意大利军队的武装，救出墨索里尼，把意大利完全置于军事占领之下。英美军并不想在意大利进行正式决战，战线停滞在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在德国占领下的意大利人民展开了广泛地抵抗运动，共产党、社会党、统一社会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等各个政党，团结在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统一战线组织周围，对德

军进行了武装斗争。解放意大利的主力是团结在这个抵抗运动周围的群众和各个政党组织的游击战。

东部战线的崩溃、意大利的投降和即将形成的西部战线，势将决定孤立的德国命运。1944年4月，同盟国军终于决定在法国登陆，6月6日，开始在诺曼底半岛北岸登陆。美国陆军元帅艾森豪威尔指挥了这次登陆作战，庞大武装力量是史无前例的：陆军四十二个师，飞机二万五千七百六十六架，舰艇一千六百零五艘，另有运输船和登陆艇六千艘，作战军总兵力达二百八十七万六千四百三十九名之多。① 同盟国军击败德军的抵抗，同起义的抵抗运动相呼应，于8月25日解放了巴黎。

西部战线的德军急剧崩溃，加上苏军从东方的加速进攻，决定了德国的命运。希特勒的唯一指望是英美和苏联发生分裂，企图同英美停战，只与苏联继续战争，此外没有其他道路。德国国内的生产力已经处于崩溃状态，动员了一千万人军队，人力已经枯竭。而且，被占领各国的抵抗运动高涨起来，苏军解放的各国相继发生了革命②。

太平洋战线的崩溃

意大利投降的1943年9月初，太平洋的日军战线也陷入了严重危机。瓜达尔卡纳尔撤退后的所罗门群岛的战斗是日本海军的航空兵力和辅助舰艇的致命性消耗战，结果遗弃了布干维尔以南各岛上陷于挨饿的守军。新几内亚北岸密林中的战斗，和所罗门方面的结果相同，腊包尔的据点完全陷于孤立。

1943年9月30日，政府大本营在御前会议上决定了《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大纲》。这个大纲是战争指导者对战局真相总算有所醒悟的产物，他们采取了放弃过去的战线，以1944年中期为目标，把千岛、小笠原、马里亚纳、特鲁克、西部新几内亚，巽他列

岛和缅甸一线作为必须确保的“绝对国防圈”，加强防卫的方针。这是准备在这个绝对国防圈进行决战，动员全部国内生产力，用来加强空军战力的计划。

然而，美军的反攻速度，比日本战争指导者的设想快得多。1944年1月初，美军机动部队进攻马绍尔群岛，而日军不能反击处于绝对国防圈前哨的马绍尔群岛，听任守备队全军覆没。又于2月17和18两日，美国机动部队空袭绝对国防圈一角的特鲁克岛，对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最大基地的该岛给以惨重的破坏。日军的所谓抓住时机的计划已经破产了。

美英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后第十天的6月15日，美军在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登陆。该岛处于计划进行决战的绝对国防圈的中心。可是，联合舰队在集中全力的马里亚纳近海海战中，航空母舰和飞机全被歼灭，塞班岛、提尼安和关岛等地的守备队到8月10日止没有得到救援而全军覆没。③太平洋战线崩溃了，马里亚纳诸岛成了空袭日本本土的最好基地。

马里亚纳的战败，激起统治阶层内部对东条独裁的不满，由于重臣们和木户内大臣的倒阁活动，7月18日，东条内阁总辞职了。陆军大将小矶国昭和海军大将米内光政联合组织了后任内阁。小矶内阁把过去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改称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试图加强战争指导，叫嚷完成战争任务，但是战线却在急剧崩溃。

中国战线的停滞

对美英战争开始之后，日本陆军的主要战场在主观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④而且，陆军中央当局的设想是，在南方作战结束后，增加中国派遣军的兵力，进攻重庆，使国民政府屈服。可是，在日军占领区的背后，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急速发展，日军充其量只能维持点和线，国民政府军的战斗力也在加强，日军正在军事上节

节丧失获得胜利的可能性。

1942年4月18日，美军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空袭日本本土，然后降落在中国基地，因此，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为了攻击长江以南的空军基地而实行浙赣作战。这次作战从5月进行到7月，虽然投入了相当于全部南方作战的庞大兵力，但连占领地区都保卫不住，便撤回了军队。从这时起，在中国战场上所有攻占的地区都不能确保，而且为了作战而抽走了兵力的地区，由于警备力量薄弱，治安也恶化了。

1942年12月，由于美军反攻瓜达尔卡纳尔的战斗激烈，大本营命令停止进攻重庆的作战准备。到了1943年，由于南方战局告急，从中国一再抽调兵力，为了填补这个空隙新设了装备很差的专负警备任务的部队，因而作战能力越来越降低了。

到1943年后半年，大本营决定在中国进行大规模作战，计划打通联结大陆的京汉路、奥汉路和湘桂路的作战，目的在于把太平洋上的失败从大陆上挽回来，占领中国内地的B29空军基地，以便防止空袭日本本土。预料到海路交通的困难，企图确保经过朝鲜、“满洲”、中国、法属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到达新加坡的陆路交通。但是，由于日军战斗力已经耗尽，难以达到这个目的，1944年1月命令打通大陆作战的目的，实际上只限于占领机场。

打通大陆作战从1944年4月开始进行了一年，动员十三个师团四十万作战兵力，但日军的素质和装备都降低了，作战极其困难，1945年4月，为了防备美军登陆，只好撤出占领地区，退到沿海地区。由于这次作战投入了主力，后方战线开始崩溃，在中国的日军丧失了优势。

大东亚共荣圈的崩溃

若说日本统治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表示了什么战争目的，那就

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宣战诏书含糊地使用了“东亚永远和平”的表现，而1941年12月12日内阁情报局发表这次战争所以称之为“大东亚战争”，“是因为它是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目的的战争。”⑤

但是，所谓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和解放亚洲各民族是格格不入的。开战之前的1941年11月20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为了准备占领南方各地，决定了《南方占领地行政实施要点》。⑥它的方针是“对占领地暂时实施军政，以资恢复治安，迅速获得重要国防资源和确保作战军的自给”，总之，是以掠夺当地物资为目的的。1943年5月31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⑦，是把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区划归日本领土，只对缅甸和菲律宾给予形式上的独立，但军事外交权要由日本掌握，这种方针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为了解放亚洲。

过去在英国、荷兰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遭受痛苦的东南亚各民族，当日本进攻当初，认为它同是亚洲人的解放军，有不少地方采取了合作态度。在缅甸组织了独立义勇军，在马来亚的印度士兵组织了印度国民军。可是，亚洲各民族不久就认清了日本是比英美更露骨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越南，以胡志明领导的共产党为核心组织的越南独立同盟对日不断进行抵抗斗争；在菲律宾，以共产党、工会、农民协会为核心组成抗日统一战线，1942年2月，建立人民抗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在缅甸和印度的共产党和工农组织中，对于靠日本来争取独立，普遍掀起了大批判，而武装抗日成了主要方针。东南亚的解放，只能通过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才能实现。

大东亚共荣圈的真相，就是帝国主义如何残酷剥削、掠夺和镇压，这从中国占领区的状况可以得到说明。占领区的经济特权全由日本资本掌握，由于军队、傀儡政权和日本资本的剥削、掠

夺，占领区物资奇缺，由于通货膨胀，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加之，日军的治安作战，声称为了讨伐游击队而实行烧光村庄，大量屠杀住民等的三光政策⑧，这就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越来越高涨，对占领区的统治也困难了。“大东亚共荣圈”，归根到底只不过是沙上的楼阁而已。

① 艾森豪威尔著，朝日新闻社译：《欧洲十字军》，1949 年，第 51—52 页。

② 罗马尼亚，随着苏联逼近边境，于1944年 8 月 23 日安东尼斯库法西斯政权倒台，24 日无条件投降，1945 年 3 月 6 日成立了民族民主战线政府。保加利亚，1944 年 8 月24日，要求德军撤退，9 月 8 日，共产主义者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祖国战线政府。南斯拉夫，铁托的人民解放军于 1944 年 10 月 20 日与苏军一起从德军占领下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阿尔巴尼亚，霍查的共产党政权的民族解放军，于 1944 年 11 月 17 日，自己解放了首都地拉那。上述这些东欧国家，依靠苏军获得解放和成立有共产党参加的革命政权，给予日本统治阶级很大冲击。这是宫廷集团发起和平工作的原因之一。

③ 陆军也为了准备马里亚纳各岛的决战，在塞班岛设置第三十一军司令部，在三个岛屿里配备了约三个师团十万守备队兵力。可是，由于准备时间很短，阵地工事极其简陋，加上输送守备兵力的运输船在中途被击沉而损失了大部分武器，除了白刃战之外没有可依靠的武器，因此战斗力极其脆弱。

④ 1941年 12 月对美开战时，陆军兵力只有十分之二调往南方作战，它的主力仍然陷在中国战场上。即陆军地面兵力五十一个师团中，南方军有十个师团，日本本土和朝鲜有六个师团，而中国关内配备二十三个师团，“满洲”配备十三个师团。在中国还有二十个混合旅团和骑兵集团，陆军总兵力二百一十万人中在中国的为八十五万人。

⑤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把日中战争称为“中国事变”，并不称为战争。1941 年 12 月 10 日对美英宣战后，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决定“这次对美英战争和随着今后形势的演变所发生的战争，包括‘中国事变’在内都称为‘大东亚战争’。”可是，宣战诏书里的战争目的是“自存自卫”，连统治阶层内对战争的目的究竟是“自存自卫”呢？还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呢？或者是上述两者兼有呢？没有统一见解。指导者内心的战争目的“实质上应该说是：当危机严重时就高唱自存自卫；在形势好转时，就说唯有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才是这次战争的目的，赋与崇高的意义”田中新一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回忆：《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3）》，第20页）。

⑥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2）》，第 648 页。

⑦ 《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6）》，第 535—536 页。

⑧ 中国把日军搞的非人道的治安作战战术称为三光政策。三光是指杀光、抢光和烧光。1942 年 4 月，华北中国方面军为了“道义的反省”，向全军官兵散发了题为《国

民政府的参战和华北派遣军官兵》的小册子，强调了"不烧、不抢、不杀"的戒律，这就不外说明他们自己承认了中国所说的三光政策（《战史丛书·华北治安战〈2〉》第329—335页）。

第四节　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

欧洲战争的结束

1945年初，欧洲战局临近最后阶段。1945年1月中旬，苏军从维斯拉河一线向奥得河一线发动了最后攻势，从2月下旬起，美英联军以渡过莱茵河为目标开始了攻势。德军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自1945年2月4日至11日，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三大国首脑，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谈，讨论了欧洲战后处理和对日战争问题。

德国将由三国以及法国分开占领，决定解散纳粹党和德国的国防军，惩处战犯等，再次确认要求德国无条件全面投降。关于日本问题，决定苏联在德国投降两个月或三个月后参战，日本必须把日俄战争所获得的领土、权益和千岛列岛交还给苏联。①

向奥得河进攻的苏军到3月底止歼灭德军六十个师，4月中旬开始了柏林包围战。3月初旬渡过莱茵河的美英军向德国中部平原进攻，4月25日，苏军和美军的先遣部队在易北河河畔托尔高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德国想要向英美投降，而继续同苏联作战，但遭到同盟国的拒绝。

5月2日，苏军完全占领柏林，希特勒自杀了。希特勒的后继者邓尼兹，5月7日无条件投降②。由希特勒发动牺牲了三千万人的战争，到此结束。

从德国投降前后起，苏联和美英之间的对立表面化了。自1945年2月下旬，在意大利的德军和美英军进行了单独的停战谈

判，这种无视苏联的作法加强了苏联的不满。还有，苏军占领波兰后，在莫斯科重建的波兰政府和在伦敦的流亡波兰政府之间发生了对立。4月12日，致力维持同盟国统一的罗斯福突然死去，反共的杜鲁门继任总统，由此苏联和英美之间关系便急遽恶化了。

战斗力的崩溃和本土决战的准备

由于德国的崩溃，以世界为敌继续作战的只有日本一国了。然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国内军需生产能力已完全崩溃，完全丧失了继续作战能力。

从1945年2月16日起，美军在位于东京南方一千二百公里的小笠原群岛中的硫黄岛开始登陆作战。硫黄岛是既没有植物又没有水源的孤岛，但是个适于作机场的重要战略据点，两万六千陆海军守备队在这里修筑了阵地。美军在压倒优势的舰炮射击和轰炸之下，经过一个月的激战，于3月17日占领了该岛。完全丧失了海军和空军兵力的日军，根本不能采取救援该岛守备队的任何措施，只能坐视守备部队全军覆没。

接着，从3月末起，美军对冲绳本岛发动了攻击。攻击冲绳的同盟军是一支包括从欧洲调回的英国机动部队在内的大部队，拥有航空母舰二十九艘和战舰十八艘以及各种舰艇一千四百五十七艘、飞机约一千八百架和登陆部队十八万三千人。而守备冲绳本岛的日军只有两个半师团，加上县民义勇队还不到十万人，在火力和海空军兵力上有无法对比的差距。4月1日，美军以压倒优势的舰炮射击和轰炸烧光陆地上一切之后，登上了冲绳本岛。日本守备军固守冲绳本岛南部地区进行了持久战，很多县民也卷入了直接战斗，凡是变成战场的地区完全化为废墟。陆海军对于冲绳战斗，除了派出以机身向敌机冲撞的特攻机之外，没有其他应付办法。海军想把最后剩下的“大和”号战舰，只装上单程燃料作为海上

特攻舰突进冲绳，但在4月7日刚离开九州后就被击沉，对于作战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守备冲绳的第三十二军司令牛岛中将，于6月23日自杀，守备队几乎全军覆没后才结束了战斗。约有二十万县民作为战斗的同路人而牺牲了。

空袭日本本土

美军占领了马里亚纳诸岛，这就意味着日本本土已经进入了他们研制的长距离轰炸机B29的空袭圈内。1944年11月，B29飞机就开始了日本本土的侦察飞行。美国空军最初选择的轰炸目标是飞机厂和码头等设备，但并没有收到显著效果。1945年1月，鲁梅少将就任马里亚纳第二十一航空兵团司令，他是曾经以对德国进行地毯式轰炸指挥官而闻名的人。2月，美国战略空军指挥部命令鲁梅对日本大城市用燃烧弹进行地毯式轰炸。③

3月10日，三百三十四架B29飞机装载两千吨燃烧弹，以东京为目标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首先以燃烧弹在东京工商业地区四周制成火焰障壁，然后以地毯式轰炸了被围困在这里的人们，以此烧光了本所、深川、浅草、城东等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工商业区，造成炸死八万四千人、受灾者一百五十万人的大灾难④。接着，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大城市成了空袭对象，到6月中旬，日本大城市几乎都烧光了，从此以后，中小城市成了空袭对象，自6月至8月间，有一百一十九个主要城市被烧光了。⑤中小城市的防空设施比大城市简陋，因而受灾较重。富山市和八王子市等遭受毁灭性的灾难，受灾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城市还有很多。日军已经没有防御这种空袭的战斗力。B29飞机随心所欲地在日本本土上空飞翔。从7月中旬起，美军以传单预告下一次准备轰炸的城市，用作动摇民心的手段。冲绳战役以后，美军机动部队也靠近了日本本土，其用舰载飞机进行的机枪扫射和俯冲轰炸，加剧了群众的恐怖

心理。

由于这些空袭，在全国烧毁住宅二百五十万户，一千多万人无家可归，三十多万人被炸死。⑥

本土决战的体制

世界形势和日本完成战争任务的能力完全陷于绝望状态，根本没有指望的战争，只有越打越增加军民的牺牲，尽管这样，日本统治者们却不想为结束战争作出努力。

1945年1月20日，大本营策划制定了《帝国陆海军作战大纲》。大纲估计当年秋季美军可能在日本本土登陆，为了防卫本土，计划迅速编成二百四十万防卫军，在日本本土上进行最后决战⑦。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2月15日通过了《世界形势判断》。这是从预见到德国的战败和亚洲局势也会极端恶化的认识出发，判断到6—7月份美军会进攻日本本土，苏联也可能参加对日作战。尽管如此，而日本除了想在日本本土进行决战以外，别无良策。冲绳战役正在进行的4月5日，小矶内阁总辞职了，组织下届内阁的是老迈的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铃木内阁也鼓吹完成战争任务，6月6日，以御前会议的形式召开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今后应采取的战争指导基本大纲》。尽管国力的现状和世界形势都陷于完全绝望状态，该大纲还是以《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为方针，用以巩固日本本土决战的体制。正象这时喊出"一亿玉碎"的口号那样，这是杀光全国人民的方针。

波茨坦公告

自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再次召开了三大国首脑会议。4月，罗斯福死去，改由杜鲁门出席了会议，而且在会议期间，英国由于大选更换政权，由艾德礼代替丘吉

尔出席了会议。关于处理德国和欧洲战后问题，苏联和美英严重对立，只在原则性事项上意见一致，具体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关于日本问题美国掌握了主导权。7月16日在洛斯阿拉莫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结果美国就不象以前那样需要苏联参战了。和苏联对立的杜鲁门上任以后，美国国务院和军部中，为了对抗苏联在远东的影响而出现了在某种程度上保存日本势力的想法。因此，想利用原子弹作为结束战争的手段，另一方面放宽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样既可以减少美军的损失，又可使日本早日投降。美国国务院起草的波茨坦公告就反映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这种变化，没有把废除天皇制的要求包括在内。从起草过程中就把苏联排除在外的波茨坦公告，在7月26日以美英中三国联合公告的形式发表出来。

波茨坦公告全文共十三项，第一项至第五项是前言，威胁日本说，继续抵抗只有毁灭而已。第六项以下是指给日本的投降条件，第六项铲除军国主义的权力和势力；第七项规定同盟国军占领日本本土；第八项规定实施开罗宣言条项，即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的四个岛屿及其附属岛屿；第九项规定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第10项规定惩办战犯、政治民主化和确立基本人权；第十一项规定废除军需工业和维持和平工业；第十二、十三项为结束语。即无条件投降是向日本军队要求的，并不是向日本国家要求的，第六项以后是指出了投降条件的。⑧

日本统治者得知波茨坦公告后，并没能理解这是结束战争的最后机会。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回避对公告表态，采取了等待对苏交涉结果的方针。铃木首相根据军部要求发表了如下谈话：“只好置之不理。我们坚决将战争进行到底”。而且，他们害怕公告内容会影响国民和军队的士气，删除了一部分，在报纸上发表了⑨。

政府和军部都没能体会公告中蕴藏的同盟国的决心，对日本

所处的客观条件认识不清，而在寻求更有利的媾和条件。铃木首相所说的“相应不理”，是无可奉告的意思，但是同盟国方面把它译作“不理”(ignore)，认为“拒绝”了。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成了美国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参战的口实。

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参战

苏联在雅尔塔协定时约定德国投降两个月或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当日期临近时，美国考虑到战后的对苏关系，对迫使日本早日投降感到焦急，想单独迫使日本投降，封住苏联对于战后亚洲的发言权。为此，决定对日本使用刚刚制成的原子弹。可是，这要以挫伤日本国民的斗志为目的，因而投下目标并不是军事设施，而选择了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目标是没有遭到战争灾难的城市，第一是广岛，第二是小仓，第三是长崎等。

8月6日早晨，一架B29飞机在广岛上空投掷了原子弹。广岛市一刹那间毁灭了，许多普通市民牺牲了⑩。然而，数十万普通民众的受灾并没有象美国期待那样，促使日本政府下决心结束战争。投在广岛的原子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这一事实已由后来的杜鲁门的演说和派到广岛的调查团报告明确了，但并没能使日本继续战争的决心发生变化。当然，投掷原子弹确实是个巨大冲击，但并没有立即对指导战争发生影响，大本营发表了“这种炸弹并不可怕，我方有法对付”。从投下原子弹的8月6日至8月8日没有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及其成员委员会议，并没有正式讨论出现了原子弹的问题。

8月9日上午零时，苏联对日宣战，⑪苏军开始越过边境侵入“满洲”。苏联的参战，一下子粉碎了日本继续战争的意志。9日凌晨，东乡外相访问铃木首相，同意结束战争，立即商量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会议。木户内大臣也向首相传达了天皇的应该

立即结束战局的意见。于是，从9日上午11时起召开了成员会议。

会议上以接受波茨坦公告为前提，问题是无条件接受呢？还是有条件接受呢？东乡外相主张只以保障天皇地位为条件，铃木首相、米内海相表示赞成。阿南陆相则主张除了继续保存皇室外，还应该加上自主地解除武装，战争罪犯由国内处理，限制保障占领三个条件，梅津参谋总长、丰田军令部长表示同意。一个条件派和四个条件派互相对立并没有解决，这天下午在内阁会议上也是外相和陆相各述自己的主张，互相对立。因此，以木户内大臣为首的宫廷集团策划凭天皇裁决来作出结论，从当天下午11时50分召开了由天皇出席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即御前会议。

在这次御前会议上，外相和陆相陈述意见后，首相请求天皇裁决。天皇采取了外相的方案，即以不变更天皇统治国家大权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附带条件。这时已经到了第二天10日上午2时。通过瑞士、瑞典两国向英、美、苏、中四个国家提出请求，同时，并用无线电向国外广播了。

对于这个决定，高唱日本本土决战进行疯狂准备的军部主战派心怀不满，当然会预料到的。政府对国民隐瞒了求降的事实，而发表了正在为维护国体而努力的情报局总裁的谈话，与此同时，陆军省中坚干部在报纸上刊登了陆军大臣告示：坚决继续战争到底。陆军省军务局的部分校级军官，开始计划以武装政变来排除和平派。

同盟国对于求降的回答回避了直接涉及天皇制问题，只说“日本政府最后的统治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的意愿确定之”。这个回答引起国体派的不满，连平沼枢密院议长也同陆军站在一起，主张再次发出照会。可是，当听到这个回答是美国排除了苏联所主张的废除天皇制的一项外交胜利的报道时，宫廷集团才下定决心接受投降。8月14日，天皇以亲自召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和

内阁会议成员的破例形式，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以再一次的“圣断”决定了投降。而向国民发表决定投降是在8月15日正午，由天皇亲自用广播来进行的。为了阻止这次广播，陆军的中坚干部发动武装政变，14日深夜占领了皇宫，但因没有得到军部上层的赞同，立即被镇压下去了。统治阶层一致认为以天皇裁断的形式立即结束战争，是继续维护天皇制的唯一道路。

① 关于远东问题，还约定了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缔结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给予军事援助等。

② 邓尼兹要求继续对苏抗战，但是，由于美英方面遵守约定的无条件全面投降而未接受。5月7日，在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由德军代表沃德尔签署投降文书；到了5月9日，在苏联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司令朱可夫司令部，由德军司令凯特尔签署了正式投降文书。德国投降的报道于5月8日由西方报道人员传向世界各地。

③ 这项命令是由担任统一指挥B29的美国第二十空军（战略空军）司令阿诺德大将下达的。这种轰炸城市的表面理由是，密集木材结构房屋的日本城市显然经不起燃烧弹的轰炸，城市的中小工厂在军事生产中占重要作用。然而，真正的目的却是，以密集的城市居民作为无差别的轰炸对象，造成大量的受灾者，以便有效地迫使日本国民丧失战斗意志。

④ 这种轰炸的灾难远远超过关东大地震死亡五万八千人的大灾害。这次空袭中，B29飞机仅仅损失了14架，美国认识到最有效的作战法是轰炸城市。不过，这种轰炸根本没有毁坏军事设施，对于毫不介意牺牲民众的日本战争指导者来说并没有多大效果。

⑤ 战灾复兴院指定的战灾城市数是全国二百零七个市中的一百一十九个市。但其中二十二个町和两个村并不是市制区，因而城市数为九十六个。

⑥ 空袭灾害的正确数量算不出来。这方面的统计材料有：败战后不久厚生省给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的关于空袭受害状况的报告；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报告；1948年经济安定本部的战争灾害调查等。另外，关于人身的受害，后来还不断增加。而关于原子弹的受害，当初估计过低。

⑦ 为了准备日本本土决战，陆军制定了新兵备计划，重新在本土内编成了四十个师团和十六个混成旅团等。为此，重新征集了一百六十万人，另外还重新召集了兵站部队四十万人，海军四十万人。由于补充兵、预备兵、后备兵已经全部征集光了，不得不把现役征兵年龄降为十七岁；甚至于不得不把已经服完后备役的第二国民兵，和连补充兵也不合格的第一国民兵也作为主力进行召集。这样，日本本土防卫兵的主体不得不变成少年兵和老年兵了。

⑧ 对于接受波茨坦公告，是无条件投降，还是有条件投降，有不同意见。可是，

公告的第五项有“我们之条件如下”，以下列举了对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说明了与要求德国、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有所不同。接受这个公告的日本统治阶层也理解“这是无条件投降的条件”。（外务省编《终战史录》，1952年，第483—534页）。

⑨ 被删除的部分是："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获得和平的、生产的生活之机会”和“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可是，军队通过无线电已收听到外国广播，隐瞒也毫无用处。

⑩ 因投下原子弹而遭到死伤的准确人数，由于市政机能瘫痪，难以弄清。战后初期，内务省报告记载死者约七万人，受伤者约十三万人，1946 年 2 月盟军总部发表，死者和失踪者九万二千人，受伤者三万七千人。这两者都是过低的估计。可是，由于原子病而死亡的，后来越来越多，在原子弹和氢弹资料保存会资料中，死者为二十四万人以上、失踪者七千人、受伤者十五万六千人，共计四十万以上。

⑪ 在莫斯科，日本驻苏佐藤大使预定在 8 日下午五时（日本时间 8 日下午十一时）会见莫洛托夫外交部长。在这次会见中，莫洛托夫通告了对日宣战的宣言。关东军报告从 9 日上午零时后，苏军越过苏满国境开始进攻。9 日凌晨，听到了莫斯科广播的对日宣战布告。日本的领导者在 9 日凌晨前得知苏联参战的消息。

第四章　占领下的日本

第一节　占领和民主化

努力维护天皇制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统治阶层所关心和努力的是"维护国体"，即集中于维护天皇制。刚一出现投降动向的8月10日，内务省警保局向各府县警察发出命令，对于"需要紧急处理者、秘密侦察中的嫌疑者（反战和平分子、左翼分子、国内朝鲜人、宗教界人士），要做好妥善的具体准备，以便立即能作非常措施。"后来直到8月15日，连日对各府县知事和警察部长发出了治安对策方面的指示和充实加强特高警察的命令①。可见面临战败的时候，统治阶层对民心的动向和预防革命倾注了最大的努力。

发表接受波茨坦公告的8月15日午后，铃木内阁总辞职，8月17日组成了以东久迩宫稔彦为首相的内阁。当从高喊"一亿玉碎"的本土决战体制，到走向投降的大转变之际，使同盟国认识到为了防止军队和国民动摇，必须利用皇室的权威，为了防止混乱，必须有天皇的权威。这就是宫廷集团选择了皇族内阁的理由。

东久迩宫内阁竭尽全力团结国民来"维护国体"。并以"一亿总忏悔"的口号来模糊战争责任，强调"结束战争"是出于天皇的仁慈，而回避了对天皇制的批判。报纸也紧跟着强调维护国体和一亿总忏悔，拼命封锁追究统治阶层战争责任的呼声。

特高出身的警察官僚山崎岩担任东久迩宫内阁的内相，显示出坚持治安维持法体制的内阁态度。在8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为了准备解散军队而加强治安力量，决定扩充警察。战败以后特

高警察的活动还继续活跃，对需要注意人物和反战不敬言行，继续进行跟踪、秘密侦察和取缔②。政治犯仍然关押在狱里，受着非人待遇。三木清押死在狱中就是停战以后的事情。中西功也是在战后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等罪名受到求判死刑和判处无期徒刑的③。

在美军登上本土之前，根除国内的革命势力，加强天皇制统治人民的机构，是东久迩宫内阁的最大使命。

占领的开始

美军对日本的占领，以 8 月 28 日美军先遣部队占领厚木机场为开端，到 10 月初占领整个日本的工作大致完成。其兵力是以准备本土登陆作战而集结的太平洋军中的第六、第八军，第三、第五舰队和太平洋空军组成，总兵力约四十万④。从 1946 年 1 月起，英联邦军的少数兵力参加了中国、四国地方的占领，但实际上是美军的单独占领。

9 月 2 日，在停泊于东京湾上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书签字仪式，日本全权代表是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同盟国方面是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以下九国代表签了字。在投降书签字之前，根据麦克阿瑟的命令，开始了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和解散日本军队，日本方面也利用天皇的权威，回避混乱，协助占领，力求证明天皇制的有效性。

最初美国准备在日本本土施行军政，发行军票⑤。然而日本政府生怕施行军政就要涉及解散日本的统治机构，因而极力阻止施行军政，劝说麦克阿瑟，使他承认了通过日本政府的间接统治方式。麦克阿瑟这个时候已经预想到将来的对苏战争，认识到为了防止日本国内的混乱和革命，利用天皇权威乃是上策。

为了占领日本，同盟国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在东京设置了

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直接监督日本政府。最高司令官的指令，是优先于日本现行法律和命令的。政府对最高司令官指令的有关事项，是根据采取紧急敕令形式的“关于接受波茨坦公告所颁发的命令”⑥，用敕令来处理的（所谓波茨坦敕令，新宪法施行后改为波茨坦政令）。政府还设了直属内阁的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作为接受同盟国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和领导的联络机关。

同盟国军总司令部在参谋部以外设置了担任占领行政的专门部、局，分别指导政府的各省和报纸广播等机关、工会、民间各种团体等。作为占领全国的美军地方机关，在六个地方设置了地方军政部，其下设立了府、县军政部。由中央以及地方的这些美军机关，对日本的各级行政官厅下达命令和指示，日本官僚担任实行，而美军加以监督，这就是间接统治的形式。

同盟国军总司令部的上级机关，军事上是美国的联合参谋本部，而在占领政策上则采取代表联合国占领日本的形式，但实质上则是置于美国政府指挥之下。因为最高司令官是由美国任命的，根据9月22日美国政府发表的“投降后美国初期对日方针”的规定，“在主要同盟国中发生意见不一致时，要服从美国的政策”，所以事实上是美国的单独占领，是按照美国政策来执行占领下的行政工作。

对美国单独统治的方针，苏联以主张同盟国共同管理相对立，结果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上，决定在华盛顿设立由十一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远东委员会是对日占领的最高机关，但它的决定要通过美国政府和同盟国军总司令部来实行，因为召开第一次委员会是在1946年2月26日，已经是同盟国军总司令部的占领政策几乎布置完毕的时候，所以实际上对占领政策没有产生多大影响。

在这次三国外长会议上，除设置远东委员会外，还决定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组成对日理事会，设在东京。这个理事会规定是最高司令官的咨询协商机关，是给他提建议的机关，但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权限，只能反映美苏对立，它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

民主化的指令和旧势力的退却

美军大体上完成了占领日本本土的1945年10月4日，同盟国军最高司令官对日本政府发出了“关于民权自由的指令⑦”，这个指令的内容是释放政治犯、取消思想警察、罢免以山崎内相为首的特高警察官、废除压制自由法规和对天皇也可自由批判。这对以继续维持治安维持法体制和维持天皇制为至上课题的东久迩宫内阁来说，是根本实行不了的指令，内阁立即实行了总辞职。

10月9日成立了以曾经是“币原外交”的主持人、原外相币原喜重郎为首相的内阁。新内阁在第二天的10日，废除了治安维持法，释放了政治犯四百三十九名。推荐币原任首相的木户内大臣和近卫等宫廷集团的意图是，表面上树立起一个亲英美派的外交官，在某种程度上提前实行同盟国军要求的民主化，以使改革停留在不改变体制的范围内。

10月11日，麦克阿瑟口头上命令币原首相实行有关民主化的五大改革。其内容是：(1)解放妇女，(2)奖励成立工会，(3)学校教育自由主义化，(4)废除专制政治，(5)经济制度民主化。战后的民主改革是按照这个指令开始的。从10月到12月，还不断发布了有关民主化的指令，即废除军国主义教育、解散财阀、冻结皇室财产、解放农民、国家和神道分离等，1946年1月4日，又指令开除军国主义领导者的公职和解散超国家主义团体，至此由占领军发布的民主化指令，大致告一段落。

食粮危机和通货膨胀

战败给国民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危机。战败的同时，军需工厂一齐实行解雇，其数字至10月上旬为止的两个月间，达到四百一十万人。还有七百二十万陆、海军军人，除一部分留在国外其余全都复员，加入了失业者队伍。此外还有两手空空从国外撤回来的一百五十万人，也完全是失业者。这样，超过一千万人以上的失业者，拥挤在已变成焦土的本土上。

深刻的食粮危机也威胁着国民的生存。因劳动力不足，化肥和农业机械的短缺而降低的农业生产，在全力以赴地准备本土决战的1945年降低到最低水平。1945年度大米产量是四千多万石，这是明治以来最低的数字，由于复员和海外撤退，消费人口增加，形成了绝对性的食粮不足。加之，由于占领，贸易完全停止，输入食粮也指望不上，战时勉强维持下来的大人每人每日折合大米二合一勺的配给量也难以维持了。甚至估计在1945年度和1946年度间青黄不接的1946年的4月到7月，将一粒米也没有，会有一千万人饿死。1945年后半期，配给食粮中米的比率减少，增加了甘薯和土豆，甚至包括一些杂粮和豆饼。到了1946年，连代用品也不够了，出现了不能按时配给和根本不配给的情况，北海道的配给脱期最为严重，达七十天以上，东京也出现了二十天以上的脱期。由于缺乏食粮，大多数国民营养失调，学童的体质显著下降，出现了饥饿地狱的惨状。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在战败的同时，政府给资本家发放了巨额的军需保证金，并向军人、军属支出了退职金等临时军事费，随着占领军的要求，政府的开支也增大了，日本银行券的发行额扶摇直上。另一方面，战后工厂停产了，煤炭也停止了采掘等，造成物资奇缺，这就加速了通货膨胀。东京零售物价指数，在战后的半年里上升到三倍，到1946年更加快了上涨速度，通

货膨胀竟达到食粮类的黑市价格每天不断上涨的惊人程度。

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1946年2月施行了金融紧急措置令，冻结存款，发行新日元，限制旧日元与新日元的兑换额，薪金以五百日元为限，提取存款也有限制，户主每月为三百日元，家属每人一百日元。这个措施只是冻结了战时强制搜罗的存款，使国民生活更加陷入痛苦之中，却阻止不了黑市借贷、黑市物资到处泛滥，反而更加促进了通货膨胀。

群众运动的高涨

在这样生活危机之中，国民为了生存下去，开始了斗争。最初挺身而起的是战时被强制带到矿山和煤矿里来从事奴隶般劳动的朝鲜工人。战败后不久，在北海道、九州、常盘等地的煤矿里，纷纷以暴动方式掀起了起义，乘政府和公司机构陷入麻痹状态，要求改善待遇、增加配给食粮量和发给归国旅费等。

1945年10月10日，在政治犯被释放并开始活动的前后，相继出现了成立工会和罢工，开端是10月末读卖新闻社的劳资纠纷。这次纠纷采取业务管理的形式，实现了开除战犯和编辑民主化，并成立工会，以此为基础组成全日本新闻通信广播工会，开创了战后最初的单一产业工会的道路。

这个时期的劳资纠纷，以采取对抗资本家的生产怠工而实行生产管理这一斗争形态为特征。因为为了生活必须首先恢复生产。在劳资纠纷的广泛开展中，成立工会的活动飞快地开展起来，从零开始的工会组织，到1945年末已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1946年6月底，工会会员人数达到三百六十八万，是战前最高时期的十倍。

全国的工会组织，是从1945年10月起，由松冈驹吉等旧总同盟系统的干部，网罗旧总同盟、工会同盟、全评右翼等战前领导者，在排除主张支持政党自由和成立人民战线的左派之下搞起来的。

到第二年的1946年8月，发展成为日本工会总同盟(会员八十五万人)。另方面，在共产党领导下也在进行以各种产业为单位组成单一工会组织，1946年2月成立了“产别会议准备会”，8月成立了“全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会员一百六十三万人)，成为日本最大的工会组织。工会虽然如此迅速地发展起来，但是没能实现战线的统一，战前左右两派的对立仍然带到战后来了。

在农村也在掀起重建农民运动。战后不久到处不断出现了佃户反对地主、收回土地的租佃纠纷，进而发展成为反对强制征购，要求减免地租和施行土地改革的运动。1946年2月成立了统一组织的“日本农民组合”，对于从农民立场实现农地改革，起了很大作用。

在这种工人、农民运动发展之中，各政党的组成也在进行。1945年10月10日出狱的共产党领导人，发表“告人民书”，以打倒天皇制和建立人民共和国为口号，开始了活动。接着以社会大众党为核心的战前社会民主主义者们，在11月2日，组成了社民系统、日劳系统、劳农系统的统一组织—日本社会党。共产党把占领军看作是解放军，在形势分析上带有一种急性病的革命追近论的缺陷，但是作为一直反对战争的唯一政党，公开地开始行动，在工人运动中迅速扩大了影响。社会党因为混有战前各派，难免在理论上、战术上缺乏统一，但在不理解共产党的激进主张的小市民群众中，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保守政党也为了对抗这种动向而重新组织起来。承袭翼赞政治会的单一政治组织—大日本政治会解散后，以鸠山一郎为中心的旧政友会久原派(主要是翼赞选举的非推荐议员)，11月9日组成了日本自由党。它以前虽然曾有和社会党合并的动向，但结果还是作为保守派的少数势力开始了活动。另方面，占推荐议员大多数的旧政友会中的中岛派和旧民政党等，11月16日组成了日本进步党，成为众议院的最大势力。12月18日，主张“协同组合”

主义的日本协同党组成，选出山本实彦为委员长。共产党以外的各党都主张维持天皇制，在食粮危机和通货膨胀中围绕政界领导权展开了活动。

政治上的空白时期

币原内阁也和前内阁一样热衷于维持天皇制，但它并不从正面抵制占领军的民主化指令，为了尽量使变革停留在小范围内，在某些方面采取了抢先改革的方法。于是在无法避免的修改宪法上，为了准备不触动天皇主权的修改，让松本烝治专门担任修宪的国务相，开始准备修改方案，同时废除治安维持法和治安警察法等镇压人民的法令，解散了内大臣府和陆海军各个机关等。1945年12月，修改农地调整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并公布了工会法等。根据修改农地调整法的第一次农地改革⑧，是为防止农民运动高涨在农村产生革命形势，进行温和的改革，即使是这样的改革，在占领军发布解放农民的指令以前，在地主议员占多数的众议院里还是反对者占了多数。修改选举法的主要目的是根据民主化指令，给予妇女参政权，并且把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分别扩大为二十岁和二十五岁以上，确定了大选举区和“限制连记投票制”的投票方式。（限制只能在候选人中选择，连记是一票可记数名。——译者）

然而，群众运动的发展和民主化进展速度之快，出乎内阁想象以外。加之，9月到12月，东条英机等战犯相继被捕，并因1946年1月的开除公职指令，已经明确了旧统治阶层里大部分人都是属于这个范围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1946年1月，共产党的领导人野坂参三，离开日本十六年后，自延安回国了。1月26日，在日比谷公园召开了欢迎野坂国民大会，社会党的片山哲、加藤勘十和石桥湛山等参加了欢迎会，尾崎行雄也寄来了贺词等，民主阵营的统一

战线气氛高涨起来。由山川均提议，在3月里召开了民主统一战线的发起人会议，有以长谷川如是闲、三浦镁太郎为首的广泛文化界、政界人士参加。除社会党右派反对外，民主统一战线的运动呈现出迅速发展的形势。同盟国军总司令部和币原内阁生怕革命形势随着时日的推移高涨起来，遂不顾远东委员会和民主势力的反对，决定趁革新阵营还没有做好选举准备，赶快举行大选。

1946年4月10日，举行了战后最初的众议院选举。由于中间夹着战争相隔五年的选举和扩大了选举权，以及一张选票连记几个人等原因，在政界领域引起了大变动。结果是：自由党一百四十一席，进步党九十四席，社会党九十三席，协同党十四席，共产党五席，各派三十八席，无党派八十一席。进步党的后退，自由、社会两党的跃进，共产党初次进入政局；另外，无党派、各派增加席位，妇女当选三十九名议员，也是这次选举的特点。

币原内阁在选举后还想以政局的稳定和修改宪法要由现任内阁来进行为理由，企图维持以进步党为执政党的政权。而反对它的自由、社会、协同、共产四党，组成"打倒币原内阁联合委员会"，进行了倒阁运动。这时食粮危机达到极点，群众对冲破危机、政治民主化的要求日益高涨，以引起4月7日警官开枪和美军出动的东京日比谷公园打倒币原内阁人民大会为开端，连日不断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

在打倒内阁的声浪中，币原内阁于4月22日总辞职了。以后的一个月，在群众运动激烈展开之中，出现了一个月间的政治上的空白时期。

关于下届内阁，因为任何一个党也单独达不到过半数，在四党之间展开了是以自由党人担任首相的反共联合政权，还是以社会党人出任首相，包括共产党的阁外合作的四党联合政权的斗争。社会党反对共产党主张建立民主战线，采取了和自由党订立政策协

定，然后在自由党单独政权之下与之合作的方针，于是自由党总裁鸠山作了组阁准备。5月1日，第一次恢复“五·一”游行，在东京召开了五十万人群众集会，决议建立民主人民政府、人民管理食粮。在这样群众激昂的气氛中，社会党发生动摇，选择了和共产党决裂，而与自由党妥协的道路。

5月4日，鸠山突然接到同盟国军总司令部开除其公职的备忘录，于是保守势力再次进行策划，选中了曾任币原内阁外相的吉田茂为鸠山的后任。在这期间群众运动还进一步高涨起来，5月12日，东京要米大会的游行示威队伍闯进了皇宫，5月19日，要求大米的人民大会（食粮“五·一”示威）在东京召开，集结了二十五万人群众，在这次大会上也通过了建立民主人民政府的决议。这时占领军明确表示出反共立场，5月14日，美国代表艾奇逊在对日理事会上表明：“不欢迎共产主义”，5月20日，麦克阿瑟声明：“不允许群众暴力行动”。在占领军的这种态度鼓励下，吉田继续组阁工作，5月22日，组成了自由、进步两党的保守联合政权——吉田内阁。在这一个月里，演出了争取建立民主政权的群众运动同企图维持旧体制的保守势力之间一场尖锐斗争，呈现出革命前夜那种政治上的空白期，占领军终于转到压制革命的方面去了。

修改宪法

吉田内阁的使命是修改宪法。在币原内阁的时候准备了修改宪法草案⑨。这个草案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维持天皇主权，对明治宪法加了若干修改而已。同盟国军总司令部考虑国内外的舆论，1946年2月13日交给政府一份含有划时代的修改内容的新宪法草案。币原内阁根据同盟国军总司令部草案，制成了修改宪法草案，4月17日发表了这个草案，并提交枢密院审议。在吉田内阁下召开的6月至10月的第九十届临时议会，就是专门为审议这个

宪法草案的制宪议会。

同盟国军总司令部的宪法草案，包括有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的原则这样一些民主内容。政府提交给国会的草案，把其中主权条款搞成含混不清。在国会审议中，由于远东委员会等国际上施加的压力，对政府草案进行了修改。修改的第一点是，在前言和第一条中明确写出主权在民；第二点是，在第二十五条中明确国民有权利过健康的文化生活；第三点是，规定内阁总理大臣的资格限于国会议员，国务大臣过半数也要由议员中选出，明确了议院内阁制。

11 月 3 日，公布了经过议会修改而成立的新宪法，于半年后的 1947 年 5 月 3 日开始施行。新宪法的重要特点：第一是明确规定主权在民，改变了天皇主权的国体，第二是明确规定放弃战争和不保有军备，在世界上初次宣布根据宪法建立和平国家，第三是在日本初次保障了国民的基本人权。

农地改革和解散财阀

在以修改宪法为顶点的政治民主化的同时，又推进了经济方面的改革。其中具有最重大意义的是农地改革。

上述第一次的农地改革是根据统治阶层的意图搞的，就是即便牺牲一定程度的地主利益，也必须缓和农村的租佃纠纷，确保生产力。然而依此来解放农民是极其不彻底的，日本中、小地主居多，大多数佃农都没有得到解放。而且这时由于复员军人、海外撤回人员、战时疏散人口等，农村人口增加，不断出现地主撤佃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在全国群众运动高涨之中，以农民要求土地为中心的运动也空前高涨起来。还由于要在农地改革中体现日本民主化的远东委员会等同盟国的强大压力，1946年 6 月，根据对日理事会的劝告，同盟国军总司令部拿出一个改革方案，吉田内阁按照这个

改革方案，向制宪议会提出了修改农地调整法和创设自耕农特别措置法，1946年10月制定了第二次农地改革方案。

第二次改革方案，在村地主拥有土地限制为一町步（北海道为四町步），此外所有出租土地全由国家收买后再卖给佃户，争取在两年内实施，实际到1950年才大致实施完毕。

按这次改革，1950年时，六百万家农户中自耕农占百分之六十二、自耕兼佃耕占百分之三十二、佃耕农占百分之五，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仍然是佃耕地，但却分属于约一百万户的地主手中。在农村里，地主和佃农的租佃关系已经不是基本的生产关系了。

另一个重要经济改革是解散财阀。鉴于日本侵略战争的根源在于巨大财阀，同盟国军总司令部指令解散财阀，采取解散财阀的总公司、禁止他们保有股份和兼任董监事的办法，以分割大型企业。然而，财阀方面的抵抗很强烈，政府也极力拖延解散的指令。1947年，公布禁止垄断法和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成了解散财阀的法律根据。但是，从这个时期起，占领政策也转到企图重建日本垄断资本上来，解散财阀比起农地改革来是极其不彻底的。旧财阀的总公司是消灭了，但是，财阀系银行成了企业集团的核心，这就给康采恩的复兴留下了充分余地。

民主化的意义

战败和随之而来的占领下的民主改革，作为在短期内施行的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对这种战后改革，有的认为是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归宿，即连续说。还有一种重视改革的划时代意义的间断说法⑩。可是，如果从政治上看来，不能否认改革的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由于这种改革，作为专制权力的天皇制解体了，这才实现了议会制民主，国民的基本人权和政治上的自由这才得到保障，完成了资产阶级民

主。

而且由于这种改革，基本上废除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开创了根据技术革新和重工业化、化学工业化来改组并加强垄断资本的道路。在改革的另一面，在世界形势的变化中，解散财阀和保护工人政策迅速后退，同时资产阶级专政加强，向完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方向前进了。

① 藤原彰《战败》（《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1，近代8》，1977年，第363—365页）。

② 战败后特高警察仍然在活动的情况，在后来占领军没收的内务省资料中有明确的记载。林茂等编《日本终战史（上）》，（读卖新闻社，1962年），和藤原彰编《日本民众的历史10，占领和群众运动》，（三省堂，1975年），均有介绍。

③ 中西功《从死壁之中》，岩波新书，1971年。

④ 最初的占领兵力，是第八军四个军团占领东日本，第六军三个军团占领西日本，第三舰队占领横须贺，第五舰队占领佐世保。总兵力没有发表，占领后的1945年为最多，推测为四十万左右。1946年以后逐步减少（供应厅编《占领军供应史·供应的基本方针》1956年）。

⑤ 美国陆军在1942年5月已经设立了军政学校，1943年3月以后，正式施行了军政人员训练计划，当占领时，在总司令部和军、军团的各司令部设置了军政机构，府县设有军政小组（竹前荣治《对日占领政策的形成与开展》，《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2·现代1》，1977年）。

⑥ 1945年9月20日公布的敕令第542号规定，为了实施同盟国军总司令部指令有关事项，得以敕令、阁令、省令作出所需规定。

⑦ 关于同盟国军总司令部的指令等，参考以下各著作。外务省编《占领和管理日本的重要文件集》，全五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49年。《资料，战后二十年史》，全六卷，日本评论社，1966年。横田喜三郎编《联合国的日本管理》，大雅堂。

⑧ 第一次改革方案，除北海道外，其它地方的在村地主的出租地保有面积平均限为五町步，对多余土地作价收买，卖给佃户，用以培植自耕农。这个改革方案除了保留了大多数中、小地主之外，由于土地所有单位不是家族而是个人，地主可以名义上分散给家族的办法，产生保有五町步以上的漏洞，并且买卖土地由地主和佃户直接交涉，佃户经不起地主的压力，这就有妨碍把土地卖给佃户的可能。并且这个改革方案把地主认为适于自己耕种的土地排除于改革对象之外，这就会增加地主的夺佃。

⑨ 因为很明显，战败后修改明治宪法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币原内阁让松本烝治担任宪法问题的国务大臣进行调查。1945年10月设置了以松本为委员长的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委员会在1946年1月拟成了一个修改草案。松本以委员会的一个草案制

成了松本草案，并在政府内部讨论过。

⑩ 关于战后改革的连续说与间断说可参照大内力《战后改革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大石嘉一郎《战后改革与日本资本主义的结构变化——连续说和间断说》（均载于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战后改革 1 · 课题与看法》，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 年）。

第二节　垄断资本的重建

冷战的开始

由于新宪法的施行，当日本国内民主化政策渐渐具体化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有了兆头的美苏两大国对立，呈现出冷战的状态。

1946年 3 月，英国前首相邱吉尔访美旅行中，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和美国总统杜鲁门同席发表演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拉下了铁幕"，激烈地攻击苏联，预告了第二次大战中反法西斯联合的崩溃。在富尔顿演说之后，同年 9 月，美国把高唱对苏协调的新政派华莱士商业部长逐出内阁，表明了向反共政策方向的转变。同月，在伦敦召开的英美法苏四国外长会议，围绕东欧、德国的问题决裂了。

1947 年 3 月，杜鲁门为了要求给希腊、土耳其以军事援助，在参众两院联席会上的演说中，宣布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斗争是美国的政策①。同年 6 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发表了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②，明确提出了包括德国重新武装在内的建设西欧反苏军事体制。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明确了美国"封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美国在地中海和东亚建设军事基地，是军事上包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战略的开始。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企图团结社会主义国家来对抗美国的对苏世界战略，1947年10月，设立了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③。于是开始了美苏"冷战"。

1948年11月，杜鲁门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在1949年1月就职演说中，表明为了保障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要结成对抗共产主义侵略危险的军事同盟。在欧洲，已经于1948年3月由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五个国家，结成联合防卫和经济合作的西欧联合，但是，为了响应美国的呼吁，1949年4月缔结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④。这个条约，除美国、西欧联合的五个国家外，另有意大利、加拿大、挪威、丹麦、冰岛、葡萄牙，总计十二个国家参加。这样在美国领导下确立了欧洲对苏的军事体制。

冷战对亚洲形势也有重大影响。同盟国军总司令部与本国政府冷战政策相呼应，明确表示占领政策的反苏反共性质，倾注全力给日本保守反动阵营以复活和重建的机会。1948年1月，美国陆军部长罗雅尔做了"使日本成为防止共产主义的壁垒"的演说，明确了政策上的转变。美国对日本的民主化、非军事化方针，逐渐开始发生了变化。

"二·一"罢工

进入1946年后半年，日本国内经济危机渐渐深刻化了。改换新日元后反而加快了通货膨胀，食粮危机更加严重，以薪金和工资维持生活的工人，面临着生存危机的状态。特别是增薪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机关雇员，1946年11月组成全国官公厅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共斗)，集结了二百五十万会员，向政府提出了以提高工资为主的要求。

对此，政府以强压方针对待，1947年1月，吉田首相在元旦致词中把工人运动称为"不逞之徒"，批判了罢工运动。工人对政府的这种态度进行了强烈的反驳，1月15日组成包括民间工会在内拥有六百万人的全国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全斗），宣布以2月1日为期全国一齐举行总罢工，结成了包括产别、总同盟在内的全

体工人的统一战线，准备实行历史上首次总罢工。全斗的计划是以贯彻提高工资要求和争取打倒吉田内阁为目的，直到达到目的为止，一直继续罢工。如果实行“二·一”罢工，工人阶级和保守势力必将发生正面冲突，会出现国内革命就在眼前的情况。

这时美国占领军，非常明显地采取了维护体制的态度。1月31日，麦克阿瑟命令停止总罢工。实际上领导全斗的共产党采取服从这个命令的态度，全斗议长伊井弥四郎当夜一面流着眼泪，一面在电台广播停止罢工的指令。于是总罢工停止了。战后群众运动的高潮，在暴露出本质的占领军面前碰壁，就不得不实行大的转变。

“二·一”罢工停止后的3月，参加全斗的工会，包括总同盟在内，组成了全国工会连络协议会（全劳连）。在日本，这是最初的工人战线的统一组织，但也不得不采取反映工人运动内部对立的极其松散的协议会形式，因为主张尊重参加工会的自主性，采取了全体一致同意主义，所以是个不能决定任何事情的组织。莫如说由于“二·一”罢工的挫折，加深了运动内部的左右对立，扩大了工人中的失败感，使工人运动趋向后退，而成为推进运动力量的“产别”，内部出现分裂，很快就失去了领导权。

片山内阁

罢工受挫后，1947年4月，为了建立以新宪法为基础的政治体制，众议院、参议院、地方自治体的首长和议会的选举一齐举行了。众议院选举的结果是：社会党一百四十三席，自由党一百三十一席，民主党⑤一百二十四席，国民协同⑥三十一席，共产党四席，各派二十五席，无党派十三席，社会党成了议会第一大党。然而社会党单独远远没能达到过半数，便以旧社民系的右派为中心，进行了建立中间联合政权的组织工作，6月1日，作为以社会、民主、国

协三党联合，并以社会党人担任首相的政权，组成了片山内阁。

片山内阁是日本首次以社会主义者为首相的内阁。当片山内阁组阁的时候，缔结了除共产党外包括自由党在内的四党政策协定，因而受了它的束缚。美国占领军和日本垄断资本对这个内阁所期待的是，压制工人运动的攻势和谋求经济复兴。而片山内阁却完全适应了这个期待。

片山内阁把主要经济阁僚让给民主党，推行新物价体系和倾斜生产方式。新物价体系是把物价固定为战前水平的六十五倍，工资固定为二十七倍，这对工人说来是万难忍受的政策。所谓倾斜生产方式，是把政府的资金和资材集中在煤炭、钢铁、化肥三个重点产业上，是以大企业为中心的政策。抑制工资以援助垄断资本的复活，完全是垄断资本本位的政策，社会党出身的首相和劳动大臣不过是被用来防止罢工的隐身草而已。

然而，片山内阁也可以说是致力于实现新宪法的理想和完成民主化的唯一内阁。随着新宪法的施行而努力实现修改民法和刑法，撤消内务省和司法省，设置劳动省、法务厅，推行保护工人立法和煤矿由国家管理等，这是人们所公认的。而另一方面则试图分裂劳动战线，压制工人运动。这种两面性可以说是中间道路内阁的宿命。

芦田内阁

虽然是以社会党为首相的内阁，却一面对工人运动攻势起到防波堤的作用；一面强制群众忍受艰苦生活以重建垄断资本，这就使工人对片山内阁的不满逐渐高涨起来。以工会为基础的社会党左派，一开始就拒绝参加片山内阁，并在1947年12月工人运动攻势再次高涨中宣布是党内的在野派，1948年2月，片山内阁由于社会党内不统一而总辞职了。

片山内阁垮台后，在野党第一大党自由党要求政权，但结果以民主党总裁芦田均为首相，组成了与社会、国协两党联合的第二届中间道路政权的芦田内阁。为了复兴垄断资本，强制国民忍受艰苦生活，为了压制象"二·一"大罢工那样高涨的工人运动，占领军和财界也都认为有必要让中间政权继续存在下去。因此从拒绝参加片山内阁的社会党左派中选定两人入阁，加藤勘十任劳动相、野沟胜任国务相，右派的西尾末广任副总理，并同芦田首相、民主党的栗栖赳夫经济安定本部总务长官、北村德太郎藏相等构成内阁的核心。

芦田内阁刚一成立，由于通货膨胀而生活遭到破坏的以官厅工会为中心的工人三月斗争高涨起来，占领军对此公然进行干涉，对罢工指导部以违反占领目的的军事审判来进行镇压。在占领军这种态度的支持下，工会内部反共运动高涨起来，1947 年 11 月组成的国铁反共联盟，1948 年 2 月组成的产别民主化同盟，1948 年 4 月组成的日农主体性确立同盟等，迅速壮大起来。资本家方面也整顿了战线，1947 年 5 月，成立了资本家团体总司令部—经营者团体联合会，1948 年 4 月改名为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

1948 年 7 月，麦克阿瑟发出禁止公务员参加斗争的指令，政府根据这个指令颁布了政令二〇一号，全面禁止属于机关雇员的团体交涉权和斗争权。在宪法施行后约一年多，就剥夺了基本人权—工人的团结权和斗争权。

中间道路的崩溃

芦田内阁采取了向重建资本主义和压制工人的方向猛进的政策，完全失去了社会党参加政权的意义。工会和社会党内部也对联合主体的右派掀起了批判高潮，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尖锐化了。右派的中心人物西尾副总理，在 1947 年选举时接受过土木建筑业

的献金问题被揭发了，在国会提出对西尾国务相不信任案时，党内左派投了赞成票，并且对1948年度预算案也投了反对票。社会党把内部强硬派开除了，黑田寿男等开除派组成了工人农民党。

继社会党的内部纠纷之后，1948年秋表面化了的昭电事件结束了中间政权。作为倾斜生产方式中的重点产业，承担生产化肥的昭和电工公司，为了从复兴金融金库得到大量贷款，贿赂了政界和财界。这件事暴露之后，行贿方面的日野原节三昭电公司经理，受贿方面的福田赳夫大藏省主计局长、栗栖安本长官和西尾前副总理等被逮捕了，10月，芦田内阁终于总辞职了。11月，国会要求逮捕芦田前首相。由于首相和政府首脑参与贪污事件，中间道路政权遂告结束。

昭电事件的暴露，据说是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部内部的对立有关系。在同盟国军总司令部里采取推进日本改革立场的民政局(GS)，和以反动职业军人为核心的参谋部第二部（G2、情报部）之间尖锐对立，据说支持保守派民自党的参谋部第二部，为了对付支持中间道路政权的民政局，把它的副局长肯迪斯搞垮而扩大了这个事件。其结果便成立了吉田民自党的独裁政权。

中间道路政权，一面在通货膨胀中压制增加工资，强制群众忍受艰苦生活，一面铺平以垄断资本为中心的重建经济的轨道，在大体完成了这个最初任务的阶段上，占领军和财界都把它抛弃了。而且它的压制工人运动的政策，结果完全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

东京审判

中间道路政权崩溃后不久的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法庭）作出了判决。根据波茨坦宣言第十项规定对战争罪犯的处罚条件，从占领后不久就逮捕了战犯嫌疑者，1946年1月，麦克阿瑟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置条例，同年5月，所谓

东京审判开庭。

东京法庭是从同盟国九个国家中任命九个人为审判官，对被告东条英机等二十八名战争领导者进行起诉。起诉的理由是破坏和平罪，违反人道罪和一般的战争犯罪等。不过，对于破坏和平罪，是以事后的法律审判的，曾被指责为胜者审判败者的复仇性的审判，但从日本国民中并没提出很大的异议。

关于由同盟国来审判这些甲级战犯这件事，天皇和宫廷重臣、政府当局从决定投降后就非常关心，结局为了维护天皇制，作为替罪羊把他们交给了法庭。另方面，对于只是由于服从命令的战时行为而受到报复性审判而被判罪的多数乙、丙级战犯，日本方面竟没表示任何关怀。

东京法庭认为被告等的共同策划是侵略战争的原因，所以定为有罪，除因病死等在审判途中被免除者外，判决了二十五名被告，以东条为首的七人处以绞刑，其余十八人处以无期徒刑和有期监禁⑦。

东京法庭的判决，是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日本侵略战争的判罪，但却把它的责任限定在以陆军军人为主的被告一伙人身上，免去了这个期间日本的领导者、也是战争责任者的天皇、重臣、高级官僚、财界领导者等的责任。并且一点也没有涉及同盟国方面的责任，关于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不闻不问。

① 杜鲁门演说中谈到向反苏反共政策的转变、加强军备、加强原子弹生产设备的必要性，要求向希腊、土耳其贷款四亿美元和派遣军事顾问团。这个特别咨文因为是明确了美国转变方向的划时期的演说，所以被称为"杜鲁门宣言"。

② 马歇尔计划概要，是6月马歇尔在哈佛大学的演说中表明的，接着杜鲁门明确表示，对于参加共同制定而得到美国承认的复兴计划的欧洲各国，在四年之内给予总额达一百七十亿美元的援助。这项计划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战后美国的过剩生产物的市场，同时从欧洲各国，特别从法国和意大利驱除共产党。

③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保

加利亚、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在波兰召开的会议上决定成立的，是以各国共产党交换情报为目的，本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发行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周刊)。

④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规定参加国有加强军备和联合防卫的义务，设置理事会。北大西洋条约理事会在同年9月决定设立防卫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1950年12月，决定西德重整军备和创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统一军队六十个师。

⑤ 日本民主党是在选举前不久的3月末，以旧日本进步党为中心，加上其他党派和无党派的参加者而组成的党，主张修正资本主义(选举后，选出芦田均为总裁)。

⑥ 国民协同党是在1947年3月由协同民主党和国民党联合组成的党，是标榜保守革新的中间政党，选出三木武夫为书记，主席空位。

⑦ 判决是对被告自1928年炸死张作霖以来，共同策划一连串的侵略战争，以及对待俘虏和一般市民的残暴行为定为有罪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七人绞刑，木户幸一等十六人无期徒刑、东乡茂德监禁二十年、重光葵监禁七年。东条等被执行绞刑的12月23日的第二天，释放了岸信介、儿玉誉士夫、贺屋兴宣等甲级战犯嫌疑者19名，表明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已告结束。

第三节　朝鲜战争

中国革命和占领政策的改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远东政策的重点，是企图由国民政府来统一和安定中国，以便作为统治亚洲的支柱。因此向国民政府运送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并给二十亿美元以上的援助①，以使其完成中国统一。而且为了对争夺日军占领区的国共间内战进行调停，派马歇尔为特使，1946年1月国共两党达成了停战协定。在停战同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开始出现了统一中国的局面。

然而，由于美国的军事援助和冷战的尖锐化，给国民党右派打了气，使它明确了反共的态度。随着苏联军队的撤退，想一举取得东北地区的统治权，再次发生了武装冲突。1946年6月，蒋介石发出总攻击令，于是内战又正式化了。

内战最初的一年，国民政府军表面上占优势，暂时还占领了延

安。然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由于官僚资本的垄断和腐败，以及通货膨胀的加剧，使群众的生活陷入了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了土改，取得了农民的支持，并团结了希望和平和统一的第三种势力，逐渐扩大了势力。1947 年夏，中共解放军在东北和华北转入攻势，自 1948 年后半年起，一举开始进攻城市，1949 年 1 月，占领北京，接着解放了长江以南的地区。1949 年 9 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 月 1 日，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政府逃往台湾，由于美国海、空军的援助，才勉强只保持住了这个海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给世界形势带来决定性变化的大事。拥有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不只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带来了巨大变化，而且还成了发展亚洲和非洲的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动力。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

中国革命的进展，也使美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它想用作统治亚洲支柱的国民政府的崩溃，使它最后确定了争取恢复日本垄断资本，作为其新支柱的方向。冷战一开始就实行的修改民主化政策和恢复军国主义的方向，由于中国革命而更加推进，甚至向着反动化和与占领政策相反的方面，实行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吉田内阁

配合占领政策的转变，国内政治也加紧了反动化。芦田内阁因昭电事件垮台后，1948 年 10 月，成立了民主自由党的单独政权第二届吉田内阁。以极端保守反共主义者而闻名的吉田，从此以后一直到 1954 年 12 月，维持了长达六年之久的首相宝座。

吉田内阁成立后的 1948 年 11 月，召开临时国会，为了政令二

〇一号的法制化，通过了修改"国家公务员法"。这是取消国家公务员的罢工权和团体交涉权，对团结权也加以限制，从工人运动的核心—国家公务员劳动者手里剥夺其劳动基本权和政治活动的自由的法令。这项表决除民自党外，民主、国协两党也表示赞成，说明中间道路三派联合崩溃了。

吉田内阁是以少数执政党为基础的，因此，在随后的通常国会上解散了众议院，1949 年 1 月进行了大选。其结果，民自党二百六十四席，民主党六十九席，社会党四十一席，共产党三十五席，国协党十四席，劳农党七席以及其他，民自党单独成了战后绝对多数的政党。社会、民主、国协中间道路三党的惨败、共产党的跃进很显著，但革新政党的得票率和议席都是战后选举史上最低的记录。

成为绝对多数党的民自党，还和民主党的保守联合派合作，以拥有三百以上议席的执政党势力为基础而组成了第三届吉田内阁。内阁为了对抗共产党的发展，本想加强反共立法，但考虑舆论的反对，便不通过立法措施，而以政令制定了团体等限制令。这是禁止和取缔暴力主义团体的措施，但很明显，其目的不是针对右翼而是针对左翼的。而且团体等限制令要求团体的成员登记，共产党认为这是"对敌示威"，同意党员登记，但在后来的继续镇压中却造成了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原因。

道奇路线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的转变，在经济政策上是强制推行日本经济的稳定和重建垄断资本。第二届吉田内阁成立不久的 1948 年 12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作为对麦克阿瑟的指令，发表了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这是想在政策上实行以总预算的平衡、加强征税、冻结工资为主的合理化和通货收缩的政策。

1949年 2 月，底特律银行总经理道奇以公使身分来日，作为稳

定日本经济的领导者制定了1949年度政府预算，抱着不允许日本方面改动的强硬态度来加以处理。紧接着在5月，肖普税制调查团来日，劝告日本以加强大众征税和优待法人为中心实行修改税制。以道奇预算和肖普税制为中心的经济财政政策，被称为道奇路线。它一面招致极端通货紧缩下的经济萧条，引起中小企业破产、失业者激增，一面推行垄断资本本位的经济重建政策。

道奇路线的一个支柱是为合理化而裁减人员。1949年5月公布定员法，解雇国家公务员和公共企业系统工人四十二万人。民间企业也与此相呼应，推行合理化和整顿企业。仅民间大企业就计划解雇三十万人。

对在不景气下大量解雇进行抵抗的工人战线，陷于分裂状态。在产别系统的工会内部，作为社会党系统的反共组织的民主化同盟有了发展，和共产党系展开了激烈斗争。此外，政府在1949年5月，修改工会法和劳动关系调整法，限制了政府认为"公共事业"领域内的工人运动的斗争权。在道奇路线下，反动攻势日益加强了。

工人运动的挫折

在修改劳动关系法规，整顿镇压体制，以及分裂劳动战线，削弱抵抗力量的基础上，吉田内阁开始了它的最重要政策—行政整理，也就是大量解雇。这不单纯是裁减人员，其目的是彻底驱逐已经登记的共产党员和战斗的工会会员。

对于行政整理中最大关口的国营铁路，7月4日发出了第一次解雇通告。在不久之后的7月6日早晨，在常盘线线路上发现了国铁总裁下山定则的尸体，检察当局发表为他杀，内阁官房长官增田甲子七公开发表了指责共产党的谈话。接着7月12日开始了第二次解雇，可是在15日夜里，中央电车线三鹰站发生了电车

无人驾驶奔驰脱轨事件，死伤十余名。吉田首相声明是共产主义者煽动的，并逮捕了党员。随后在8月初发表了民间最大的解雇一东芝大规模整理。八月十七日，在东北线的松川附近发生了列车颠覆、造成了司机等死亡事件，第二天政府立即发表声明说是思想的原因，国铁和东芝松川工厂的很多共产党员被逮捕了。

下山、三鹰、松川这些事件，都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由政府发表是共产党和工会使用暴力造成的，宣传部门也极力宣传这是暴力革命，被用作镇压的材料。由于巧妙利用这些事件，政府和民间得以几乎毫无抵抗地对国铁和东芝的人员等实行了裁减。由于三鹰、松川两事件而被逮捕的共产党员们，受到包括死刑在内的重罪判决，直到弄清是捏造的事件，实属冤案，竟花了十五年的岁月。

朝鲜战争的爆发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与中国毗邻的朝鲜形势紧张起来。日本战败后的朝鲜，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划分为美苏两占领区。在美军占领下的南朝鲜于1948年5月举行了单独选举，同年8月宣布成立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对此，在北朝鲜于9月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为首相，朝鲜分裂为南北两部分。1950年1月，缔结美韩相互防卫协定，李承晚高喊北进统一，加强了战争准备。

朝鲜的战争准备，引起日本国内加强镇压批判战争势力。支持祖国统一的在日朝鲜人组织的“在日朝鲜人联盟”，“在日朝鲜民主青年同盟”，根据1949年9月的团规令被解散，干部被驱逐，财产也被没收了。而且日本国内各地的朝鲜人学校也被封闭了。

1950年5月30日，韩国举行大选，执政党大韩民国党失败了。6月19日，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通过了统一提案。6月19日，美国的约翰逊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来到东

京，同麦克阿瑟进行协商，杜勒斯国务院顾问21日也来到了日本。

在不久以后的6月25日，天还没亮的时候，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上开始了大规模的战斗②。美国立即声明援助韩国，26日，美国空军加入了战线，麦克阿瑟于27日命令出动海空军，接着命令出动陆军。25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苏联缺席之下接受美国提案，认为北朝鲜是侵略者，27日决议援助韩国。美军以联合国的名义正式开始介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朝鲜半岛上再次开始了正式的战争。

开始重整军备

当战斗开始的时候，美韩方面非常轻视北朝鲜的军事力量，认为短时期内即可征服北朝鲜③，但是战争的经过却完全相反。6月25日的国境线上的战斗只进行了一天，韩国军队就全面崩溃了。北朝鲜军28日占领汉城，并且不断打败美国派遣的陆军部队，7月末，把介入的美军三个师和残存的韩国军队驱逐到以釜山、大邱为中心的朝鲜半岛南端的桥头堡地带，再次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敦刻尔克的形势。

由于这种意想不到的战况变化，和为弥补本国增援部队到来之前的空隙，在日美军被彻底动员参加朝鲜战争。不仅如此，连日本的工厂、铁路、船舶也都为了美军的战争而被动员起来。美国空军从日本机场起飞前去轰炸，日本作为战争的后方兵站基地、修理补给基地，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彻底动员在日美军投入朝鲜战场上去，这意味着连防卫基地和保护在日美国人的武力都没有了④。日本迅速开始重整军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7月8日，麦克阿瑟交给吉田首相一封信，命令创建七万五千人警察预备队和增加海上保安厅人员八千人。名义虽是警察，实

际上相当于新编四个师团的陆军。这既是为了填补美军出动后空白的警备兵力，同时又是在美军营房入队，用美军武器装备，在美国军人指挥下的美军的辅助部队⑤。在宪法上规定不保持战争力量的条款生效后只有三年多，就再次公然开始了重新武装。

清共活动和成立总评

由于朝鲜战争使占领军进一步加强了镇压政策。战争开始以前，国内已经公然开始了军事化和反动化的政策，而在1950年1月麦克阿瑟的新年致词里，强调了排除共产主义和承认日本的自卫权。1950年1月，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了《关于日本形势》的论文，强调美军的占领政策是以恢复日本军国主义为目的的，批判了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和平革命论，指出反美斗争的必要性。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判在共产党内部成了引起对立和分裂的契机⑥。

在1950年1月社会党大会上，主张和平三原则的左派和争取早日媾和的右派之间发生冲突，右派退出了会场，左、右两派各自选出了自己的干部而分裂了。同年4月召开临时大会，左、右两派一度实现了统一，但是左派的铃木茂三郎委员长、右派的浅沼稻次郎总书记之间的对立未能解消，第二年又分裂了。

在加强镇压中的分裂，更加削弱了抵抗力量。1950年5月，麦克阿瑟发表了考虑共产党的非合法化的声明，在朝鲜战争开始前就命令解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除干部的公职，禁止发行《赤旗》报，并在全国范围内无限期地禁止一切集会和游行示威，把全国置于形同戒严令下一般的状态。战争爆发后进一步加强镇压政策，解散全国工人联合会和开除干部，从7月到年末，新闻、广播机构以及公务员和整个民间企业，根据占领军的命令，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强行解雇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清共）。根据团规令实行党员

登记的共产党被从官厅、公共企业、民间企业等一切领域里清除出去，遭到了严重打击⑦。

在工人战线上共产党影响力急剧削弱之中，企图组成反共民同派的工会，1950年7月，成立了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成立总评之初，除国营铁路、全日本邮电工会、日本教育工会等主要单一产业别工会之外，总同盟等右翼工会也参加了，成立时拥有三百六十万人，是战后最大的工会。在总评成立大会上，通过反对北朝鲜侵略、支持联合国等决定，表明了反共工会的性质。

① 1949年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白皮书》把这个事实弄清了（美国国务院、朝日新闻社译《中国白皮书》，1949年）。

② 关于这次战斗的爆发，美国和韩国说是北方挑起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说是美韩方面有计划的进攻，主张是对立的。关于战斗的经过，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1—10》，原书房，1966年—1973年，比较详尽。

③ 关于战况的演变同麦克阿瑟以及美国军事当局的预期相反，除上引书外，神谷不二《朝鲜战争》，中央公论社，1968年。洞富雄《朝鲜战争》，新人物往来社，1973年，都有论述。

④ 最初的美军顾问团参谋长柯瓦尔斯基回顾当时急于组织警察预备队的情况时说，9月10日，当最后的在日美军第七师离开日本开赴朝鲜的时候，是编成预备队的绝对期限，不然的话："主要由妇女儿童等出征者家属构成的二十五万美国侨民，就处于无防备状态"。（F·柯瓦尔斯基，胜山金次郎译《日本重新武装》赛伊玛尔出版社出版，1969年）。

⑤ 创建当时的警察预备队总队总监林敬三有过如下的谈话："虽说是防卫日本的部队，却一开始完全由美国军官指挥，是日本队员置于美国军官之下的部队，成立这样部队对将来是非常不合适的，我是抱着这样感想注视着的"。（防卫厅《自卫队十年史》，大藏省印刷局，1961年，第46页）。

⑥ 起初共产党中央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评以发表"所感"来进行反驳，但是出现了主张应该老实接受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批评的反对派，由此分裂为前者主流派（也叫所感派），后者为国际派。

⑦ 由于清共，被从工作岗位上驱逐出去的人数，民间企业有一万人以上，官厅、公共企业团体也达一万人以上，是按照占领军要求的名单进行的，因而其中还有不少人是由于搞错而被驱逐的。

第四节　旧金山媾和条约

特需景气

朝鲜战争给在道奇路线下苦于萧条的日本经济突然带来了军需景气。日本的工厂、运输机关、劳动力都为了美国的战争而动员起来。特别是美军直接从日本购买的军需物资和直接筹备的劳动力，都被称为特需，随着战争的迅速扩大，其需要量也庞大起来①。

特需把日本国际收支上的赤字一扫而光，积蓄了大量外汇，并且把萧条情况下国内积压的货物销售一空，给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以特需为杠杆，萧条一变而为繁荣，资本家歌颂了“特需景气”。

以特需景气为开端，一举进入了以垄断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复兴阶段，然而，它意味着日本经济靠美国军需的承包化、从属化，特需景气也意味着日本国内垄断化的进展。特需的订货集中于大企业，受惠者全是垄断资本。与特需无缘的中小企业、零散企业，因为通货膨胀和资金不足，倒闭者反而增加了，作为大企业的承包工而被纳入其系列的也增加了。还有，大企业把特需带来的危险转嫁给承包企业，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特需景气和垄断资本的恢复与发展，也扩大了财界的发言权。经团联和日经联②、经济同友会③等财界团体，积极作出政治性发言，对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施加影响。朝鲜战争成为恢复垄断资本的一个划时期的标志。

加强了发言权的财界所期待的是日美经济合作。1951年1月，经团联等财界八团体向来日的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提出了“关于媾和条约的基本希望”。其中日本垄断资本希望早日实现媾和，

由美军防卫日本，日美间缔结防卫协定，以及重新武装日本等一些基本的东西，此外还有加强日美间经济合作。于是网罗财界首脑成立了日美经济合作恳谈会。财界希望的是恢复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反共统治体制而缔结日美军事同盟。

单独媾和的动向

随着朝鲜战争的演变，出现了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化，以及加强日美经济合作关系，这就形成把苏联和中国排除在外早日缔结日美单独媾和条约的动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9月，将关于对日媾和的七原则④送交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其中明确表示媾和实现后美军也要留在日本的意图。1951年1月1日，麦克阿瑟在新年致词中强调了早日实现媾和。1月25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为了媾和的预备交涉来到日本。这种美国方面的动向，是基于适应亚洲形势的变化，想把日本半永久性地纳入美国军事体制之中的意图。

配合美国方面单独媾和的意图，日本政府和垄断资本也都表明了希望以日美军事同盟为前提的单独媾和的意志。吉田首相在2月发表声明，欢迎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排除苏联和中国，和西方阵营之间的单独媾和，也是为了确立日美间经济合作体制的。同盟国军总司令部在1951年3月，以经济科学局长麦卡特为团长，派遣有关日美经济合作的代表团回到美国，经同有关机关协商后，美国方面得出统一的意见，据此在5月发表了关于日美经济合作的声明。声明中强调，合作并不是由美国方面进行援助，而是应该通过商业途径来进行，日本引进美国资本也应该是这样。日本的财界方面也由经团联和日美经济合作恳谈会联名提出了希望书，明确希望发展以军需生产为中心的日本工业。垄断资本希望由于同美国国防计划相适应的日本重工业

的发展能够出现一个特需景气的持续局面。

全面媾和运动

随着单独媾和活动的进展，反对日美军事体制的固定化，要求全面媾和的运动也起来了。支持这个运动的条件之一是国际上拥护和平运动的高涨。

在朝鲜战争扩大，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危机的时候，为了实现与人类生存攸关的世界和平，广泛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1951年2月，柏林的世界和平讨论会，是决心不让两次大战的惨祸重演的世界人民的代表集聚一堂的会议。会上呼吁五大国缔结和平协定，通过了柏林宣言的决议，这个呼吁在短时期内就在全世界获得了五亿六千万人的赞成签名。在柏林的会议上还通过了反对单独对日媾和的决议。

在日本最初掀起全面媾和运动的是南原繁、大内兵卫等的和平问题谈话会在1950年1月发表的、《世界》杂志1950年3月号刊登的《关于媾和问题的声明》。以此为开端，逐渐扩展为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的全面媾和运动，其他综合性杂志也相继刊载了主张全面媾和的声明和论述。吉田首相斥责南原东大总长的媾和论是"曲学阿世"，可是运动却更加发展了。1951年1月，共产党、劳农党、产别等组成了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同年1月，社会党在大会上击退了右派的反对，确认和平三原则，选出左派的铃木茂三郎为委员长。

1951年3月，总评第二次大会推翻了成立总评时支持朝鲜战争的方针，通过了"反对重新武装、全面媾和、坚持中立、反对军事基地等"和平四项原则，来了一次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种全面媾和运动是以政党和工会为首，包括知识分子，宗教界人士等非常广泛的国民运动。

缔结旧金山条约

在全面媾和运动扩大声中，美国却加紧了对日和约的缔结。美国把自己制定的媾和条约方案强加给日本，与此同时，杜勒斯加劲地历访各同盟国，争取对条约方案的赞成。

1951 年 9 月，在旧金山召开了对日媾和会议。美国一开始就把中国排除在外，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五十五个国家发出了请柬，但是印度、缅甸、南斯拉夫三国因反对美国的条约方案而拒绝出席。会议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审议，成了赞成美国方案的演说会。苏联、波兰、捷克三国反对美国方案，提出了修正案，可是没被采纳。9 月 8 日举行签字式，苏联等三国拒绝签字，因而包括日本在内四十九国签了字。结局成了把中国、苏联、印度等排除在外的只有美国和其同盟国签订的媾和条约。

对日媾和条约由前言和二十七条正文组成，是一个缺少媾和必要条件的内容不完全的条约，也就是和战争对象国中几个重要国家之间没有结束战争状态；即第六条承认媾和后美军仍然驻在日本；没有解决领土、赔偿等通常媾和上必须解决的问题，从这些方面来看⑤，与其说是媾和条约，莫如说是确定日本对美依附的条约。特别是把冲绳原封不动地置于占领之下的媾和，这是遗留下来一个大问题⑥。

尤其是这个对日媾和条约是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连在一起的。安全条约是由前言和只有五条正文所组成的简单条约，但它只承认美军留在日本的驻兵权，而日本对此负有合作的义务，是片面义务的内容，它和过去日本和其傀儡国家“满洲国”缔结的日满议定书相似。

安全条约规定，驻日美军不仅在受到来自外部的武力攻击时出动，既使对镇压内部骚乱也能出动，甚至于在维护远东和平与安

全的名义下，也能向海外出动。此外关于驻日美军的配备和日本方面的合作则另由行政协定来规定，而且规定日本有义务作出防卫上的努力。这是以日美不平等的军事同盟为内容的东西。根据这个条约确定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从属关系。

① 特需是指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军的军需使用美元支付而言，开战后一年间达到三亿一千五百一十六万八千美元(1951年6月17日当时)，以后每年也差不多达到三亿美元左右。

② 日经联是1948年成立的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的简称。1946年8月成立的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是对整个经济政策进行调查研究的，而日经联是在劳动问题上统一研究资本家方面对策的机关。

③ 经济同友会是1946年4月由骨干经营者中有志之士组成的团体，是以个人加入的和睦的研究机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④ 七原则是1950年11月24日发表的。其中把冲绳和小笠原置于以美国为施政权者的联合国托管之下，也包括为了保障日本的安全，美军在媾和后仍然驻在日本的规定。对于七原则，苏联和中国是全面反对，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则对缺乏限制日本重新武装和放弃赔偿表示反对，英国主张抑制日本的远东贸易(山极晃《朝鲜战争和旧金山媾和条约》《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2现代1》所载)。

⑤ 条约第二条规定，日本放弃对朝鲜、台湾、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一切权利和取得权利的法律上的原因以及请求权，但是没有决定这些地方的归属。而且在第三条里，日本同意把西南各岛、小笠原群岛等置于美国是唯一施政权者的托管之下，可是这些岛屿的最终归属也没有决定。

⑥ 直到1972年5月12日施政权归还为止，美军继续占领着冲绳。关于占领下的冲绳，新崎盛晖《战后冲绳史》日本评论社，1976年，大田昌秀《占领下的冲绳》(《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3现代2》，1977年)等书，阐明了问题的所在。

第五章　日美安全保障体制

第一节　开始重整军备

朝鲜停战的动向

朝鲜战争在开战后一年就开始呈现出长期持久战的迹象。美国当初预定早期取得军事胜利的想法，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预想不到的实力面前破产了。于是战争更加扩大，不得不预想到和中国、苏联之间要发生全面战争，在美国军事动员困难、国民批判这种出师无名的战争的高潮中，企图扩大战火是不可能的。此外，尽管美国在核武器上居于优势，但很明显，投掷原子弹会激化同英法等美国阵营之间的对立，在世界人民的和平运动高涨声中，情况演变得利用核武器也未必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急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坚决主张投原子弹和向中国境内扩大战争。美国政府和军队首脑深知没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决心，就不能采纳麦克阿瑟的主张，1951 年 4 月，罢免了麦克阿瑟。

1951 年 7 月，根据苏联的提议，两军的代表在战线中央的开城，开始了朝鲜战争的停战谈判。战斗进入了持久战，战线处于停滞状态，期待停战的呼声高涨起来了。

在朝鲜战争的一年里，亚洲各地的民族解放斗争显著地发展起来，威胁着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统治，使世界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印度支那，法国企图恢复殖民地统治，对此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总攻击，完全解放了北部国境地带。法军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本国把全部力量投入到印度支那半岛上来，可是被赶到

海岸城市里去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也在马来半岛抵抗英国的焦土战术，在热带丛林里继续着激烈的抗战。菲律宾人民义勇军也和受到美国军事援助的政府军继续进行着激烈的抗战。

在这种民族解放运动高涨之中，印度等第三势力的国际地位提高了，印度尼赫鲁总理主张苏联重新回到安全理事会里来，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为了国内建设，回避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绝对必要的，1950 年 8 月无条件地重新回到安理会，努力阻止朝鲜战争的扩大。这种情况使以核武器的优势为基础企图扩大为世界战争的美国的军事战略破产了。

行政协定和日台条约

在这样国际形势中，为了媾和后还要把日本置于依附美国地位的措施，逐渐地形成了。1952 年 2 月 28 日，根据安全条约签订了日美行政协定①。这个协定包括日本无限度地向美军提供基地；美国军人、军属、以及其家属犯罪的审判权归美方所有；日本要向美国支付部分防卫经费等②，对日本可以说是个侵犯主权的内容不利的协定，而且又不是条约，是以政府间协定的形式，也不经过国会审议的。签订这个协定的结果，日本的美国军事基地化就具体地进行起来，这就发生了全国性的基地问题。

与此同时，和台湾蒋介石政权之间进行了媾和谈判。在旧金山会议上，关于日中间的媾和，英国主张应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对象，美国主张应以台湾的中华民国为对象，因为意见不一致，排除了中国，在日中媾和上，决定任凭日本选择对方。于是由于美国的压力和吉田内阁的积极筹划选择了台湾。并且在媾和、安全条约生效那天的 1952 年 4 月28 日，日台间签订了媾和条约③。日本由此堵死了同代表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恢复邦交的道路，

选择了加入亚洲反共军事同盟的道路。

针对这种向重新武装和反共军事同盟道路上前进，反对军事基地、反对殖民地化的国民运动也日益高涨起来。媾和条约生效后的1952年5月1日，举行了第二十三次五·一游行。战后五·一的中央会场，是被工人称为人民广场的皇宫前广场，可是朝鲜战争后，政府禁止使用这个广场。这天的游行示威队伍的一部分两万来人，在抗议禁止使用声中进入了这个广场，武装警察队对此使用手枪和催泪弹袭击赤手空拳参加五·一游行的人，死伤一千人。值得注目的是，这时，有十几辆美军汽车被放火烧毁，显示出日本国民的反美情绪。这个"血的五·一"，是象征着日本不完全独立的事件。

共同安全法体制

不完全独立和强行重新武装，加深了国民的不满，反对象征占领时代的吉田内阁的呼声高涨起来了。1952年初的第十三届国会，围绕行政协定发生纠纷，以至不得不前后延长会期五次。吉田内阁向这届国会提出了防止破坏活动法案。对此国会内和国会外的反对运动高涨起来，知识分子和一般市民也加强批判这个法律的反民主性质，形成了掀起广大国民反对运动的形势。然而，这个法案在国会审议的时候，发生了"血的五·一"事件，这就给予政府强行通过的借口，7月该法案成立了。

吉田内阁在防止破坏活动法通过后，召开临时国会，解散了议会，1952年10月1日举行了战后第四次众议院选举。选举的结果，自由党二百四十席，改进党八十五席，右派社会党五十七席，左派社会党五十四席，劳农党四席，其它和无党派二十六席。这次选举的主要争论点是重新武装问题，自由党落到刚刚过半数，左派社会党的议席增加引人注目。再者，以极左的火焰瓶斗争而失去群

众支持的共产党，议席一举跌到零。在这次选举中，保守各党中有大量解除剥夺公职者当选，这件事也引人注目。在解除剥夺公职者一伙中，值得注目的是鸠山一郎等战前政党政治家的复活，他们反对占领下的吉田政权，成为自由党内纠纷的原因。

选举后组成了第四届吉田内阁，自由党内的党人派组成自由党民主化同盟，采取了反吉田的立场，因而使吉田内阁的处境陷入极其不稳定的状态。在1952年11月的特别国会上，吉田内阁的通产相池田勇人信口说出："中小企业者的破产和自杀是不得已的事情"，当被提出不信任案的时候，鸠山派大量缺席，使之得以通过，迫使池田辞职。还有，在翌年的1953年2月的通常国会的预算委员会上，吉田对右派社会党西村荣一的质问粗暴地骂"混蛋！"对此提出了惩罚吉田首相决议案，由于鸠山派等的缺席而被通过了。接着又通过了对吉田内阁不信任案，于是吉田又解散了大选后只五个月的众议院。鸠山派由党内分裂出去组成了鸠山派自由党。

1953年4月19日的大选，自由党获得一百九十九席，改进党七十六席，左派社会党七十二席，右派社会党六十六席，鸠山派自由党三十五席。自由党未过半数，包括不久之后举行的参议院选择在内，左派社会党的发展值得注目。

选举后在野党的步调还不一致，财界为左派社会党席位的增加而震惊，因而强烈希望建立保守稳定政权，由于改进党在内阁外的协助成立了第五届吉田内阁。可是，因为执政党议席数少，其基础很不稳定。

吉田内阁虽然立足于这样不稳定的基础上，却在从属美国、反共军事同盟的道路上猛进。1953年10月，以吉田的私人特使身分访美的自由党政务调查会长池田与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就日美防卫问题举行会谈，发表了增强日本的防卫能力和美国对日军事

援助的联合声明(池田·罗伯逊会谈)。进而在这个双方同意的基础上,就加强日本军事力量和美国对日经济军事援助,继续进行谈判,1954 年 3 月 8 日,日美签订了 MSA 协定(共同安全法协定④)。根据这个协定,日本接受美国武器等军事援助,交换条件是承担起加强日本本身的军事力量,"为增进自由世界的防卫力量作出贡献"的义务。

媾和条约生效后的 1952 年 8 月,把警察预备队改编为保安队,把海上警备队改称为警备队,设置了统一管辖两者的保安厅⑤。但是,根据共同安全法协定,为使加强日本军事力量具体化,1954 年 6 月,在国会一场大打出手中强行通过了自卫队法⑥和防卫厅设置法⑦两个防卫法案。于是自 7 月 1 日起建立了防卫厅和陆上、海上、航空三个自卫队,日本的重新武装正式开始了。

吉田内阁的崩溃

自占领年代以来长期垄断政权的吉田内阁,其依附美国的态度不仅失去国民支持,由于腐败和贪污也丧失了政治生命。自 1954 年 1 月,从山下轮船公司干部被捕揭开的造船贪污案件,发展成为饭野海运以及各造船公司干部赠贿,自由党的佐藤荣作干事长和池田政务调查会长等的受贿嫌疑事件。于是当 1954 年 4 月,检察当局要求议会批准逮捕佐藤的时候,为了维持政权,法务相犬养健发动指挥权,命令延期逮捕,掩盖了事件的主要部分。但是这次指挥权的发动,激起了对吉田内阁的不满和批判。鸠山派大部分人一旦回到自由党内,作为党内反对派加强了反吉田的立场。财界很多人也倾向于批判吉田,要求吉田下台和保守联合。

1954 年 11 月,自由党的鸠山派和改进党联合,结成反吉田保守势力,创建日本民主党,选出鸠山为总裁。吉田内阁的政府党在国会中的议席连三分之一都不到了。1954 年 12 月,国会内提出

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吉田想以解散国会进行斗争，可是财界却要求避免解散和吉田引退，自由党内绪方竹虎副总裁等人也表示同意，吉田陷于孤立，终于总辞职了。自 1946 年以来连续垄断战后日本政权的吉田政权，也终于寿终正寝了。

吉田可以说是代表占领时期日本的政治家。由于他那种高傲不逊的态度，凭穿着日本白布袜子和吸着雪茄烟所代表的那种贵族的趣味，被称为“独断专行的人”，是个和一般民众的生活感觉格格不入的人物，虽然如此，但奇怪的是在国民中却有威望。在占领期当过首相的芦田，被称为对联合国军司令部“唯唯诺诺的人”，相形之下，吉田却被认为是宁肯对美国进行抵制，也还保护了日本国家利益的首相。然而事实正相反，吉田是外交官出身，他以和占领军的高官有深交为武器，单凭垄断和同盟国军司令部的联系渠道，才作为独断专行者保持了他的独裁地位。美国的对日政策是利用日本的政府机构，进行间接统治，在这种条件下，吉田通过极其忠实地履行对日占领政策，坚定站在代理人的立场上，才得以维持其政权。他对民众的生活是漠不关心的，并且是天皇制统治阶级核心的宫廷集团的一员，他的政治目的是以维护天皇制、反共、反苏为核心。占领一结束，他的领导力量便随着迅速衰微下去，是理所当然的。

① 日美行政协定是由国务大臣冈崎胜男与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签订的，全文二十九条的政府间协定。这个协定不是条约，不用国会批准，因为是媾和生效前在占领体制下缔结的协定，因此不能说是自主性的条约。

② 在这个协定中，规定日本每年支付一亿五千五百万美元的防卫分担费。

③ 这个条约是由河田烈为全权代表与叶公超总统签署的。国民政府在美国压力下放弃了赔偿要求，但是，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侵略的最大受害国中国的赔偿问题，日本竟以承认台湾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这种虚构为代价，而一笔勾销了。

④ 共同安全法协定，除了日美共同安全协定外，同时还签订了农产品购入协定、经济的措施协定、投资保障协定三个协定，所以有时也是这些协定的总称。日本所希望的经济援助被拒绝了，结果只约定了军事援助。

⑤ 保安厅法是1952年7月31日公布的，1952年4月，保安厅由设置在海上保安厅内的海上警备队改称和移交的警备队于8月1日同时成立，警察预备队改称为保安队，同年10月15日成立。

⑥ 保安队、警备队的目的，根据保安厅法，是“维持我国和平与秩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而自卫队法规定自卫队的目的是“为保卫我国的和平与独立，保卫国家的安全”，很明显，具有军队的性质。

⑦ 按防卫厅设置法，新设联合幕僚会议和国防会议。联合幕僚会议是陆、海、空三个自卫队的联合调整机关，和自卫队成立的同时设置的。国防会议是审议有关国防重要事项的机关，根据1956年7月制定的国防会议的机构等有关法律，规定首相为会议主席，有关大臣为成员，1956年12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第二节　高速度增长

和平共处的开幕

1953年3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故去，继任的马连科夫在最高会议上的演说中强调了和平解决国际纠纷。同年7月，经过多次曲折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在协定上签了字。三年间的战火终告收场。其背后可以说有美国军事政策的破产；1953年8月苏联声明拥有氢弹，美国垄断核武器的崩溃；以及世界和平势力的反战、反核武器的强大的运动。

从1954年4月起，在瑞士的日内瓦召开了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十九国远东和平会议。在会议进行中的5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攻陷了法军在越南竭尽全力据守的军事据点奠边府，法国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异常明显了。6月，法国声明在一个月内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孟德斯·弗兰斯内阁成立了，7月20日，在日内瓦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定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过了九年，战火始终没有间断过的世界，这才迎来了听不到枪声的一天。

日内瓦会议正在进行中的1954年6月，中国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和尼赫鲁总理举行会谈，确认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②，发表

了周恩来·尼赫鲁联合声明。强调制度不同国家和平共处的和平五项原则，在亚洲以及中立各国得到很大支持。1955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非洲二十九国参加的亚非会议，通过了主张维护和平和反帝民族解放的万隆宣言③的决议。

日内瓦会议，周·尼联合声明，万隆宣言，表示冷战结束进入和平时代；美、苏两国之外，亚洲、非洲新兴国家作为在世界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第三种势力已经成长起来。以日内瓦会议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可以说是进入了由冷战走向和平共处的新时代。

和平运动的发展

世界和平运动高涨起来的 1954 年，在日本国内也可以看到和平运动有了新的开展。1954 年 3 月，美国在马绍尔群岛的比基尼珊瑚岛上进行了氢弹试验，这个时候，烧津的金枪鱼渔船第五福龙丸落上了氢弹的灰尘，全体船员二十三名受害，后来有一人死亡。确认其原因是由于核试验，这使唯一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国民，重新唤起广岛、长崎的回忆，受到极大的冲击。由东京杉并区的主妇们掀起的禁止原子弹、氢弹签名运动，立即扩展到全国，收集到三千五百万人的签名。各地方的自治体的议会也相继通过禁止原子弹、氢弹决议，在 1956 年 2 月的国会上，也全场一致通过了禁止原子弹、氢弹试验的决议。这次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不只是在日本国内，也扩展到全世界，比基尼事件的第二年，1955年 8 月 6 日，即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第十周年，在广岛初次召开了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④。日本国民的和平运动，甚至发展到在世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和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同时，反对军事基地运动也开展起

来。根据安全保障条约和行政协定，日本国内的军事基地化迅速推进。扩大基地不仅影响农业和渔业，还有风纪的颓废，犯罪增加等种种影响。1953年6月，苦于基地问题的全国代表云集东京，召开了反对基地国民大会。此外，以基地所在地为中心，展开了反基地斗争。

反对基地斗争之所以激烈化，是从1953年4月石川县内滩开始，在千叶县的九十九里滨、群马县的妙义山、爱知县的小牧、山梨县的富士山麓等，展开了全体居民的激烈反对斗争。在这些反对基地斗争中，农民、渔民和支援他们的工人和市民、学生之间结成联合战线，成为工人运动首次向其它阶层扩大，向统一战线方向发展的开端。并且战后多次分裂、不断后退的群众运动，通过这次和平、反基地斗争，得以看出新的前景。

保守联合与社会党统一

1954年12月吉田内阁总辞职后，组成了民主党的少数单独内阁鸠山内阁。当鸠山内阁组成时，和两派社会党约定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1955年2月27日举行了众议院大选。选举结果，民主党一百八十五席，自由党一百一十二席，左派社会党八十九席，右派社会党六十七席，劳农党四席，共产党二席，以及其他。因鸠山的名气而来的民主党的跃进和左派社会党议席的增加很显著，以及革新各党首次达到了阻止修改宪法必要的三分之一。

每次选举，社会党，特别是以总评的支持为基础的左派的抬头，使财界和保守政党增加了危机感。于是强调为了维持保守政权，除保守党派联合之外别无他途。在1952年10月选举之前，经团联、经济同友会、日经联、日商四个经济团体就做出过希望保守党派联合起来的决议，后来也一再希望保守党实现统一。1955年2月，众议院选举后，组成了民主党的单独内阁第二届鸠山内阁，

可是，民主党总务会长三木武吉却和财界相呼应，主张保守党派联合，于是自由、民主两党联合的气氛迅速高涨起来了。

另一方面，社会党两派因每次选举都增加议席，便产生了两派如果合成一体，不久即可取得政权的判断，选举后迅速出现了统一的动向。两派谈判的结果，1955 年 9 月，制定了统一纲领草案，10 月 13 日召开了统一大会。选出的统一社会党委员长是左派的铃木茂三郎、书记长是右派的浅沼稻次郎，采纳了主张废除安全保障条约和非武装中立的左派政策。

紧跟社会党的统一活动，保守党派联合也在加速进行，自由、民主两党解散之后，11 月 15 日组成了自由民主党。然而，由于旧自由党和旧民主党的对立，难以选出总裁，便由鸠山以及自由党的绪方、大野伴睦、民主党的三木等四人为代行委员。保守党派联合一实现，经济四团体又为此发表了欢迎的联合声明，这说明这次联合是财界导演的。

由于社会党的统一和保守党派的联合，政界分为两大势力。然而，由于社会党在这以后停滞不前，这次联合就意味着揭开了长期保守单独政权的序幕。

日苏恢复邦交和加入联合国

随着和平运动的发展，批判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要求和苏联、中国恢复邦交的国民呼声日益高涨，这是当然的。吉田内阁末期的 1954 年 10 月，成立了由广泛群众参加的日中、日苏恢复邦交国民会议，自由党的北村德太郎，以及村田省藏、平塚常次郎等很多财界人士的参加，是值得注目的。在这恢复邦交运动中既包括多数国民希望的日中、日苏友好，同时也包括期望扩大贸易的产业资本家，以及寻求发展贸易途径的中小企业的要求。

批判吉田内阁对美一边倒，主张自主外交而上台的鸠山内阁

的公约，是恢复日苏邦交和改善日中关系。苏联为了响应鸠山这种意向，在鸠山内阁成立后的1955年1月，让原驻日代表部临时首席德姆尼茨基访问鸠山，提出了开始邦交正常化的谈判问题，其结果是从同年6月开始，日本全权代表松本俊一和苏联全权代表马立克在伦敦开始了和平谈判。

在伦敦进行的日苏谈判，主要由于日本方面的国内对立没能顺利进行。自由党采取反对日苏谈判的态度，批判鸠山外交政策，说1955年2月的选举也是对共产主义的门户开放。美国警惕日苏接近，忠实于这种意向的日本外务省，关于领土问题和渔业、扣留者、赔偿等，采取强硬态度，要求保证不干涉内政等，没有表示使谈判取得成功的热情。因此，1956年3月中断谈判，松本全权回国了。

1956年4月，河野一郎农相等日本代表团赴莫斯科，开始了关于日苏渔业问题的谈判，五月签订了日苏渔业条约。并且约定重新开始日苏和平谈判，可是，从7月由外相重光葵和苏联外长谢皮洛夫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结束了。保守党派联合后的自由民主党，由于旧自由党派系的反苏主张很强烈，没有谈判诚意。然而，鸠山把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成败押在对苏恢复邦交上了，因为美国干涉和党内反对，只好决心把领土问题搁置起来。

1956年10月，鸠山带病访问莫斯科，和苏联总理布尔加宁举行会谈，签订了日苏恢复邦交的联合宣言。这是规定邦交正常化的，至于领土等一切悬案则留待以后继续交涉。因此，日苏间还遗留下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结束了战争状态，恢复了邦交，其意义是重大的。

1956年12月，联合国大会接纳日本加入联合国。加入联合国的愿望一直因为苏联行使否决权而没能实现，由于日苏恢复邦

交的结果，才得以如愿。至此，战后日本才又正式回到国际社会里来了。

由石桥到岸

由于日苏恢复邦交和加入联合国，鸠山内阁的使命完成了。抱着对美协调主义的财界已经抛弃了鸠山，还在鸠山访苏前的1956年9月，经团联会长石坂泰三就要求鸠山下台。实现了加入联合国的1956年12月，鸠山引退，内阁总辞职了。

自民党成立的时候，约定后任总裁为旧自由党总裁的绪方竹虎，可是，1956年1月，绪方突然死去，后继者的椅子由曾任东条内阁商相的岸信介、自大正时代起以自由主义者而知名的石桥湛山、和党人政治家的石井光次郎三人争夺起来。经总裁公开选举结果，第一是岸、第二是石桥、第三是石井，可是在复选时石井派投了石桥的票，结果石桥当选为总裁，组织了内阁。

石桥内阁主张坚决执行积极政策，制定以减税一千亿和公共投资一千六百亿为内容的大型预算，推行积极财政。从1955年后半年开始的经济繁荣，由于这个预算的推动，出现了“神武景气”（意思是自神武天皇以来的大好景气）这样的话。石桥还唱出扩大日中贸易的诺言，受到国民的支持。

不过，石桥首相组阁后只有一个半月就因病下台了。1957年2月，代理首相的岸，把前内阁的原班人马留下来，组织了新内阁，并接任了自民党总裁。这是在战后十一年半的日本，以战时内阁阁僚、甲级战犯嫌疑者这样一个人物来担任首相。岸虽然当组阁时，声明完全执行前内阁方针，但和石桥内阁相比，岸内阁显然更为亲美而反苏、反中国的。

从鸠山内阁后半期的1955年起，日本经济走上高速度增长的轨道。技术革新和设备投资的扩大，由于出口船舶的畅旺，贸易

开始了顺利发展，经济继续繁荣，矿工业生产也好，国民总收入也好，都急剧上升⑤。从 1955 年后半期到 1957 年前半期继续着“神武景气”，从 1959 年至 1960 年，一再出现称作“岩户景气”（意即开天辟地以来的繁荣。——译者）的好形势，这就是财界讴歌的高速度增长形势。然而，兴旺的产业和不兴旺的产业，大企业和小企业，城市和农村的差别很大，还没能消除经济上的双重结构。

岸的访美和防卫力量的整备

日本经济继续高速度增长，恢复成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在国际政治上也有了发言权，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在反共阵营里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伙伴。于是美国就当然希望日本加强防卫力量，在亚洲“集体安全保障”中起重要作用。而日本国内在财界和自民党之中，也强烈要求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片面义务制，希望得到双方都负有义务的对等地位。岸是主张修改宪法、重新武装和使日本军队派往海外合法化的自民党宪法调查会的中心人物，他就任首相，对日美双方来说，都认为修改安全保障条约的机会已经到来。

岸在就任首相后的 6 月，访问了美国。在访美之前，岸内阁为了准备谈判，就重新武装的方针，表明了态度。其中之一是，在 4 月关于拥有核武器确定了政府的统一意见，即：“拥有攻击性核武器是违反宪法的”；另方面却采取了“只要是防御用的核武器”可以保有的态度⑥。而且在访美前的 5 月里，召开了国防会议，6 月 14 日，汇总决定了“第一次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第一次防卫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以 1958 年度至 1960 年度的三年计划，要拥有陆上十八万人、海上十二万四千吨、航空一百三十架飞机的兵力，这是为了填补美军撤退的空白而增加的兵力，同时也是以“适应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新式武器的研究与开发，以及革新编制与装备”为目

标而制定的。

岸在访美时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6月21日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内容强调日美进入新时代，商讨修改安全保障条约，成立日美安全保障委员会，撤退美国地面部队等，还加上了美国欢迎日本防卫计划的词句。这个声明明确了日本在经济成长的背景下加强重新武装，承担美国战略的一翼的意图。

美国驻日地面部队的撤退，并无需等待日美联合声明的发表，随着美国远东战略的变化，早就预定下了。被称为艾森豪威尔新战略的世界战略，是为了适应核武器和B52战略轰炸机等的运载手段的发达，以大规模核武器报复力量为基础而设想的。在远东，关岛基地上扩充的 B52和核轰炸成为战略的基础，日本作为基地的重要性减少了，只具有前哨、警戒基地的意义，由日本的地面部队和美国海、空军来担任其防卫就足够了。随着这种美国战略的变化，以增强陆上兵力为中心的日本的重新武装便正式开始了。

印度尼西亚、越南赔偿问题

以扩大设备投资为中心涌现出“神武景气”的日本经济界，在岸内阁上台前后，由于输入激增而招致的国际收支恶化，一变而带来了危机。为了用扩大输出来摆脱这种危机，以财界为中心，强烈地出现了对东南亚市场进行帝国主义统治的要求。岸内阁为了满足这种要求，提出了向东南亚实行经济扩张的重要政策。岸首相在访美前的5、6月里，历访东南亚六国，归途与台湾蒋介石举行会谈，说日本对国民政府反攻中国大陆有同感，表明了敌视中国、支持台湾的态度。在11月至12月，岸首相又历访东南亚九国，目的是进行“经济外交”，想以发展起来的日本经济力量，强行挤进东南亚市场。于是对于警惕日本帝国主义恢复侵略的东南亚各国，抛出了赔偿和利权的诱饵。

岸内阁的东南亚外交，先是在1958年1月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和平条约和赔偿协定。这不过是对苏加诺政权提供贿赂，想开辟一条投资和输出的途径。接着，1958年10月和老挝缔结了经济技术援助协定，1959年3月和柬埔寨缔结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都是以两国傀儡政权放弃赔偿要求权为代价，由日本无偿提供技术人员和资材为内容的。又在1959年5月和根本不能代表越南全国的西贡南越军政权缔结了赔偿协定和借款协定。这些都是助长这些国家政权的腐败，并且也滋润了日本的政商和资本家⑦。

① 日内瓦协定是由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停战协定以及印度支那有关九国联合宣言构成的。规定柬埔寨和老挝独立、撤退法国军队、为了越南的统一，两年内实行大选。美国在协定和宣言上都没有签字。

②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4年4月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的前言中提出的，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③ 万隆宣言是由一、尊重基本人权；二、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承认一切种族和大小国家的平等；四、不干涉他国内政；五、尊重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自卫权利；六、不缔结压迫其他国家的集体防御；七、不以武力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八、以和平方法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九、促进相互合作；十、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等十项原则构成的，（按日文原文作了适当删节。——译者）

④ 在这次大会前，禁止原子弹、氢弹的签名，日本达到三千二百三十八万人，外国达到六亿七千万人。

⑤ 以1934年至1936年平均为一百的矿工业生产指数，1951年恢复到了这个水平，1956年达到二百一十九点一。根据同样标准的国民个人收入，1952年恢复到战前水平，1957年达到一百六十四点六。经济增长率（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实质），1959年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四点六。

⑥ 1957年5月7日，岸首相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的答辩中，阐明“在自卫权的范围内，也可以拥有核武器”。

⑦ 对印度尼西亚的赔偿是十二年间两亿二千三百零八万美元，对越南赔偿是五年间三千九百万美元，贷款三年间七百五十万美元，大量的国民税金就这样被花掉。

第三节　修改安全保障条约和反对斗争

美国的世界战略

由于经济飞跃增长而发展起来的日本垄断资本，走上了恢复帝国主义国家的道路，正如在越南、印度尼西亚赔偿协定上表现出来那样，企图从经济上打进东南亚。这时美国的世界战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战略体制中被处于一个新的地位。

艾森豪威尔政权的世界政策，象美国三军向原子战略体制的转变，北大西洋公约军队特别对西德军队的核武装问题上所显示出来那样，是实力外交，是实力政策。1956 年 11 月，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总统，更加有力地展开了以杜勒斯为首的实力外交。然而这时出现了使其外交破产的重大形势变化。

1956年 2 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和平共处、否定战争不可避免性、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等内容的和平路线。而且在这次会上，赫鲁晓夫第一书记做了批判斯大林独裁的秘密报告。1957 年 7 月，苏联共产党开除了莫洛托夫、马连科夫等斯大林主义集团的人，批判斯大林，明确了和平共处的路线。

苏联向和平共处政策的这种转变，是因为在军事力量上有了超过美国的自信心。1957 年 8 月，苏联发表了能够把核弹头发射到地球上任何角落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取得成功。苏联拥有被称为最终武器这件事意味着按一下电钮就会把整个人类毁灭掉的按电钮战争的恐怖已成为现实。1957 年 10 月苏联还在发射地球人造卫星一号上取得成功，这证明发射洲际导弹成功的同时，还记录下人类进入宇宙空间的第一步。

因苏联发射洲际导弹成功受到冲击最大的是美国。美国世界战略的基础，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自信之上，即虽然常规兵力处于劣势，可是核武器处于绝对优势。核武器运载手段也被苏联超过了，所谓"导弹差距"的劣势已经确定无疑，这意味着以"实力外交"为基础的冷战政策已经破产了。

然而，美国不顾苏联和平共处的呼吁，仍然继续全力以赴地消灭导弹差距，使美国军事力量全面转向核战略体制，对北大西洋公约军队，特别是西德军队实行核武装，在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建设中程导弹基地的实力政策。另方面，煽动社会主义国家周围各国发动反共的军事政变，拼命想维持对苏、中两国的包围圈。1958年2月，印度尼西亚的反共军事叛乱，1958年9月，缅甸的军事政变，同年10月，泰国和巴基斯坦的反共军事政变等，都是在美国帮助下搞的。

考勤和警职法

这种美国的实力政策，全面的核战略化，结果成了迫使日本增强军事力量。1958年2月，发表了美国驻日地面部队撤退完毕，可是，自卫队的加强不只是填补美军撤走后的空隙，而且是按照美国的核战略，担负着美国核战斗力的防卫、警戒、前进部队的任务。

美国对日本经济上和军事上合作的期待，使岸内阁走上修改安全保障条约和强行重新武装的道路。因此，岸内阁首先为争取政权稳定，1958年5月，实行了众议院大选①。选举的结果，自民党二百八十七席，社会党一百六十六席，共产党一席，其他各派和无党派十三席，开始出现了两大政党对立的局面，但是自民党单独就远远超过半数以上，社会党也取得了建党以来最多的席位。选举后组成的第二届岸内阁②，在修改安全保障条约的道路上突飞猛进，为此首先必须攻击反对修改的和平运动。为了削弱日本教职

员工会，对教员强制推行考勤（按即压制进步教员的考勤。——译者），为了加强警察的权限，修改警察职务执行法等都是这一连串反动政策的表现。

以恢复统制教育为目的的考勤，1956年首先在爱媛县开始，逐渐扩展到全国，而且第二届岸内阁文相滩尾弘吉，采取了考勤全国化和对日本教职员工会进行镇压的政策。1958年9月，逮捕日本教职员工会委员长小林武，动员全国警察力量，叫喊要和"日本教职员工会进行决战"。对此，日本教职员工会得到总评的支援，展开了激烈的反对斗争，在很多府、县成功地改变了考勤的内容，但是，没能阻止考勤工作的推行。日本教职员工会进行的斗争把学生、儿童也卷了进来，总评也指令工会会员子弟拒绝上学，以此来进行支援，可是，政府和宣传机构广泛展开不要让儿童卷入斗争中去的宣传活动，在离间其父母使之离开日本教职员工会上得到了成功。

修改警职法是以确立国内镇压体制为目的，为了维持公安秩序，需要扩大警察的权限。1958年10月，政府向国会提出的修改方案是要扩大警察的干涉权，恢复对办事处、宿舍、旅馆的现场检查，没有拘票也能进行人身搜查和拘留等，这是侵犯基本人权和压制言论集会的自由。

对于这种以重新建成警察国家为目的的法案，不仅引起社、共两党和总评等工会组织的反对，而且激起了空前广泛的国民反对运动，甚至妇女周刊杂志都刊载"男女约会都受到妨碍的警职法"，反对运动的范围很广泛。10月13日，作为统一战线组成了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妇女团体、文化团体等所有组织都参加了进来。

为这次运动蓬勃发展而震惊的政府，强制国会延长会期，另方面，发表皇太子与正田美智子在11月里结婚，上演美智热③，企图

使反对运动冷静下来。然而自民党内部也反对强制推行警职法，要求改变岸的路线的呼声高涨起来，12月，池田勇人、三木武夫、滩尾弘吉三阁僚辞职，法案也成了废案。这次反对运动的成功，说明新宪法的人权与自由精神在国民中扎下了根。

修改安全保障条约的交涉

修改警职法的失败，对岸内阁说来是极大的打击，在政权危机之中不得不放弃修改安全保障条约交涉早日达成协议的计划。自民党的池田、三木和松村、石井、石桥等反主流四派，组成刷新恳谈会，使岸、河野主流派动摇起来，自民党的内部纠纷尖锐化了。

这样，自民党的危机和修改安全保障条约的延期，使财界也产生了深刻危机。财界的主流也开始进行了在岸政权内消灭河野的影响力，而以池田为继任首相的当然候补者的政治工作。财界尤其害怕自民党的分裂，会招致1959年度预算不能通过以及日美关系趋于恶化。

岸信介屈服于财界这种压力，对反主流派表示让步，把河野总务会长赶下台，改由池田派的益谷秀次代替，1月才再次当选总裁，对内阁进行最小限度的改组。于是拒绝了河野主张的全面修改日美行政协定，采取修改安全保障条约早日达成协议的方针。

1959年2月，藤山外相发表了关于安全保障条约谈判的藤山试行方案。这个方案主张确立日美联合防卫体制，将冲绳、小笠原划为条约的适用区域之外，企图早日完成修改。于是5月藤山赴华盛顿，表明驻日美军受到攻击时就被看作是对日本的攻击，而要采取联合行动的基本态度。

1959年6月，举行了参议院选举，社会党出乎预想之外，议席增加不多，没有动摇自民党的绝对多数。在选举后的内阁改组上，池田入阁任通产相，要求当干事长的河野离开了一切领导职务。于

是演出了一出河野派转为反主流派，池田派加入了主流派的倒转剧。岸、佐藤、池田等官僚独占主流、疏远了河野等党人派的自民党，更加紧了同财界主流和官僚的勾结，朝着日美关系更加密切的方向挺进。

国民运动的发展

1959年3月，在社会党、总评、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等呼吁之下召开了阻止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国民会议的成立大会。参加的有社会党、共产党为首的一百三十四个团体。可是，共产党被排除于干事会之外，而以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强烈主张把共产党排除在外的全国劳协，和反对警职法的时候不同，这次没有参加国民会议。共产党拥有最大的国民会议的实际行动势力，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国民会议在4月组织阻止修改安全保障条约的第一次统一行动，5月组织第二次，6月开展了第三次统一行动。在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中，有人担心象阻止修改安全保障条约那样政治课题不能列入工人运动中去，但是，在修改谈判最高潮中举行的第三次统一行动，全国有一百六十万人参加，运动迅速高涨起来。

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运动，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里，也广泛展开了。上原专禄等一些学者们在3月发表反对修改安全保障条约声明，中野好夫、阿部知二等文化界人士恳谈会5月向政府提交了公开质问书。以《世界》杂志为舞台连续发表谈话的和平问题谈话会也为了反对修改，不断采取了积极行动。

然而，反对运动战线也还存在问题。在争取统一领导反对运动的国民会议内部，社共两党针锋相对，未能充分发挥领导作用。而且社会党内部还存在着左右两派的对立，右派领导者西尾末广反对国民会议的运动方针，7月在名古屋发表了批判安保斗争的

谈话。对此以社会党青年部和总评的活动家为核心的左派，在9月社会党大会上通过了谴责西尾的决议。10月，西尾率领右派脱离社会党，成立社会俱乐部，进而在1960年1月组成了主张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为自卫而重新武装等的民主社会党。

另一方面，共产党在1958年7月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选出野坂参三为议长，宫本显治为书记长，确立了自1955年第六次全国协议会以来的自主路线，但围绕纲领问题，党内争论尖锐化了。反对党中央方针、主张极左革命路线而被开除的学生党员们掌握了全国学联的领导权，在反对安全保障条约斗争时，批判国民会议和社共两党的斗争方针，采取了直接行动。这种直接行动阻碍了运动的统一，但在知识界和学生中被这种耸人听闻主义吸引的人很多，其影响力波及到小资产阶级阶层，发挥了一定效果。

1959年11月，报道日美间取得谅解，预定在1960年1月签署条约，并且由于自民党企图在国会强行通过一直成为问题的越南赔偿协定，反对运动一下子高涨起来了。1月27日的国民会议第八次统一行动形成罢工、集会、游行示威等过去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抗议行动，全国有五十万人参加。东京的国民会议采取向国会集体请愿的战术，但是以认为这太软弱的全国学联为中心的两万人游行示威队伍，由国会正门冲入院内。这个事件被报道机关大肆宣传为全国学联乱闯国会，共产党则指责说这是托洛茨基分子挑拨的，从而和全国学联加深了对立。

还有，1960年1月16日，当岸首相等签署修改条约的全权代表团从羽田机场出发时，反对社、共两党和总评方针的全国学联，为了阻止代表团出发，闯入羽田机场和警察队发生了冲突。

安全保障条约的签字

1960年1月19日，在华盛顿签署了新安全保障条约和行政

协定。新条约和旧条约相比，据认为是采取了对等立场，可是日本在军事上从属于美国的性质是很突出的。规定日本负有增强防卫力量的义务；为了远东的和平与安全，为了日美联合作战计划，要同美国进行一般协商；日本仍然负有提供基地的义务；是一个为期十年的不平等的军事同盟。

上次签署安全保障条约，是吉田首相一个人作为全权代表签的字，表明了负有以媾和换取安全保障条约的责任，可是这次的全权代表除了岸首相外，还有藤山外相、代表自民党的石井总务会长、代表财界的日本商工会议所所长足立正等参加，表示新安全保障条约是根据政府、自民党和财界的意志签订的。条约第一条强调日美经济合作，以日本重新武装为义务的这个条约的方向是日美军事同盟和恢复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日本统治阶级所要达到的目的。

条约虽然签了字，但在国会内的审议和批准，因为已经估计到受到院外群众行动支持的在野党将会坚决抵制，显然难以进行。而且缔结与和平共处时代背道而驰的军事同盟，国际上也引起种种批判。苏联认为这个条约是反苏军事同盟，送来不交还齿舞、色丹两岛的备忘录，采取了对日报复措施。在东南亚各国也唯恐恢复“大东亚共荣圈”的舆论高涨起来了。

正当安全保障条约形成日本国内一大问题的时候，韩国李承晚独裁政权的基础摇摇欲坠了。抗议 3 月总统选举时搞了不正当投票的学生、市民运动，和警察队发生冲突，发展成暴动。 4 月在汉城发生了学生要求总统下台的示威游行，以此为开端的四月革命，终于打倒了李政权，实现了民主政治。

同年 4 月，土耳其学生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也激烈起来，孟德雷斯独裁政权崩溃了。这样西方阵营的反共军事国家相继出现的危机，使美苏间产生了新的对立。 5 月，苏联发表在国内击落美国的

U2 型间谍侦察机，对美国提出抗议，中止了预定的首脑会谈。

U2 型间谍飞机事件，在日本国内也引起很大波动。在5月的国会上提出厚木基地驻有 U2 飞机的事情，而且苏联在发表击落飞机以后，以对日备忘录方式指责这一事实，赫鲁晓夫总理还警告说对间谍飞机基地要进行报复攻击。这个事件证明安全保障条约具有危险性，更加激起了反对运动。

反对安全保障运动的高涨

韩国群众运动将推翻李承晚政权的 1960 年 4 月末，日本国会也面临着审议安全保障条约的紧要关头。全国规模的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运动，使自民党强行表决的架势增加了危机感，另外由于受韩国形势的鼓舞而增强了力量，开展了空前未有的群众运动。自民党为了强行表决，预定于 4 月 26 日向众议院提出中间报告动议，而国民会议计划的第十五次统一行动，显示出空前高昂，向国会请愿的签名者达三百三十万。这一天全国学联主流派反对向国会请愿的合法战术，企图冲入国会，和警察队发生了冲突，有许多人被捕和受伤。自民党看到运动的高涨和形势的紧迫，暂时推迟了强行表决的企图。

第十五次统一行动，成了运动发展的重要的分水岭。每天反复向国会请愿示威，参加者不只是工会和学生团体、知识分子、文化界人士，连一般市民也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

岸内阁和自民党首脑部看到这种形势，下决心诉诸非常手段。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预定在 6 月 19 日来日本，为了在这以前批准条约，最迟要在 5 月 20 日通过众议院。 5 月 19 日深夜，政府派来五百名警察进入国会会议厅，用暴力驱逐在野党议员，强制延长会期和表决安全保障条约。

由于靠派来警察而破坏民主、否定议会制的这种表决，竟使对

安全保障条约抱中立态度的人们也都站到反对方面去了。政党、工会及所有团体都发表拥护民主声明，各大学停止上课，连非政治性组织的代表都从全国各地云集东京，反对安全保障条约运动发展成了维护民主主义的斗争。

岸内阁下台

抗议强行表决的6月4日的第十七次统一行动，以国营铁路、私营铁路罢工为首，全国参加的人有五百六十万人，规模是空前的。6月10日，为安排美总统访日而来到羽田机场的艾森豪威尔的秘书哈格蒂被示威队伍围上，不得不乘直升飞机逃掉。6月15日国民会议计划的第十八次统一行动，预定参加的群众要超过上一次。

这种群众运动的高涨，加深了政府和财界的危机感。暴力团和右翼团体得到大量资金，开始了积极行动。号称维新行动队的武装右翼，对6月15日向国会请愿的游行示威队伍，尤其对女演员占多数的新剧人会议、基督教徒和家庭主妇等一些没有抵抗能力的游行示威队伍大打出手，负伤者达六十人。这种右翼的行动，也是对集结在国会南通用门前的全国学联示威游行队伍的挑衅。当天夜里，全国学联的学生们正要闯入国会院内，受到了预先埋伏在那里警察队的攻击。警察队在门内外袭击学生，打死了东大学生桦美智子，有五百多名学生受了伤。

终于打死了人的这个事件给予全国人民深刻的冲击。因这种事件而惊慌失措的岸内阁，深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政府发表声明，把这个事件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的计划行动，这就更加激起国民的愤怒。第二天16日，几乎所有大学都停了课，抗议示威一个接着一个，甚至警察厅长官也说无法制止游行示威。16日这天，岸内阁终于决定推迟艾森豪威尔的访日，同时也结束了岸内阁的

生命。6月19日，临到众议院强行表决后一个月的期限，条约自然得到承认。这天夜里，三十多万人的示威队伍包围了国会，但终于没能阻止条约生效④。

岸内阁在极端秘密中作好批准条约手续后，6月23日声明辞职。后任内阁由批判岸的强行路线的池田勇人组成。池田起用大藏省官僚出身的智囊，吸取安保斗争的教训，以“与其加强警察，莫如施行受国民信赖的政治”和“宽容与忍耐”等“低姿态”为宗旨，企图平息斗争。于是以“所得倍增”的口号，开始实施高速度经济成长政策。

① 这次选举是因为议员任期将满而与在野党谈好的“协商解散”的结果，被称为“没有争论焦点的选举”。

② 第二届岸内阁，起用岸的亲弟弟佐藤荣作任藏相，打破派阀均衡的惯例，以岸和佐藤为中心加强党内的领导力量，是在财界支持下对美合作，强行重新武装路线的“高姿态”的内阁。

③ 宣传机关大书特书正田美智子是平民的女儿，鼓吹天皇制的大众化、名星化。然而，正田英三郎是日清制粉厂的股东社长，战后在日本拥有最高地位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特意把他宣传为平民是有意图的，而且在煽动这种热潮中，刚刚开始普及的电视起到巨大作用。第二年，1959年4月的结婚典礼，全国估计有一千五百万人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场面。

④ 关于反对安全保障条约斗争的具体过程，有信夫清三郎《安保斗争史——三十五日间政局史论——》，世界书院，1961年。论述运动的意义和其局限性的有神田文人《安保斗争》，(《讲座日本史8，日本帝国主义的复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大江志乃夫《安保斗争》(《岩波讲座·日本历史23现代2》，1977年)。

第四节　新安保体制

三十年的历程

本书所叙述的自1931年至1960年的三十年间，是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激烈的动荡时期。前一半的十五年间是，日本走上帝国主义以来所追求的侵略中国的政策，发展成为直接使用武

力，由于中国人民的抵抗而陷于绝路的战争，进而扩大成太平洋战争，终于招来了垮台局面的期间。把牺牲三百万生命和其他一切苦难强加给国民头上，使亚洲各国人民也蒙受了无法估计的灾害的这次战争，弄清它的原因、实际情况和结果，是日本历史的最大课题。后一半的十五年间是，清算战争和以它为基础的变革期间，在这个期间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发生的巨大变化，是无法比拟的。为使历史不再重演，为了不再尝受悲惨的生活，弄清这段变革，具有重大意义。

战争和战后变革，把日本国民从封建性束缚和专制政治下解放出来了。然而，另一方面，在这个期间，垄断资本的称霸和它的高度发展也在进行，形成了资产阶级专政。为了全体国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解放，实现真正的民主，建成和平国家，还有很多课题。为此也有必要弄清战争的意义，和进一步探讨战后的变革。可是，1960 年以后，从维持体制和实现新的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需要出发，一种隐蔽战争真实情况，过小评价改革意义的倾向也很显著。探讨战争和变革，现在应该说更为重要了。

从 1960 年到现在，日本的这个课题还没有解决而保留下来。下边简单举出几个例子。

高速度增长及其矛盾

1960 年的反对安全保障条约斗争，是围绕现代日本史上最大政治课题的群众运动，然而这个群众运动的高涨，也没能阻止了安全保障条约的修改，那时成立的新的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基本上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在军事上被编入美国世界战略之中，在日本国内有着美军基地，自卫队实质上被编入美国太平洋军之中，这样一种从属性的军事同盟关系，现在还继续存在着。

在这样的日美关系中，在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还是迅速增长起

来。继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第一期高速度增长之后，又迎来了六十年代后半期以输出急剧增长为背景的第二期高速度成长。这期间的日本经济发展，在增长速度上，继续维持着世界第一的水平。国民经济生产总值，1960年后半期，超过了英国、法国、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矿工业生产额与美苏并列，成长为第三大国。钢铁的消费量、发电量、石油制品的消费量等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

保持这种高速度增长的是勤奋和技术水平很高的劳动力，但是，最大限度地享受了这种高速度增长成果的是垄断资本。以号称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新日本制铁、造船量保持世界第一位的三菱重工业，以及丰田、日产、松下电器、索尼、日立、东芝等世界屈指可数的大企业成长起来了。而且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伊藤忠、丸红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综合商社，名列世界前茅的一流银行等日本垄断资本的成长是异常显著的。

然而在这些大企业繁荣的背后，还存在着因其巨大利润只还原一部分，从国际水平看来劳动条件还很差的工人阶级。还有，维护大企业巨大利益的最大原因是，有无数承揽加工订货的中、小企业，以分外低劣的条件隶属于它们系列之下，而这些中、小企业的工人更是处于和大企业无法比拟的恶劣劳动条件之下。

以这些大企业为中心的高速度增长，是在战后保守独裁政权之下，从政策上有意识地强制推行的。它是扼杀中、小企业，牺牲农、林、渔业部门，进而牺牲煤炭以及有色金属等矿业部门而发展起来的。其结果在日本经济内部产生了大的差距，产生了兴旺部分与不兴旺部分这样两重结构，具有很大矛盾性。

再者，这种高速度增长可以说是通过牺牲农业部门的政策而推进的。因为战败后不久实行农地改革，地主制遭到解体，大多数农民变成独立经营的农民，这就提高了农业生产力，随着带来了农

村购买力的提高，扩大了国内市场，为高消费和高速度增长创造了机会。然而，从一直继续增长的垄断资本的立场来说，当一进入高速度增长期，就露骨地推行抛弃农业的政策。1961年6月的农业基本法，是以农业现代化、合理化为名，实际上是以整顿零散农业为目的的。为了工业立国，使农民变成工人，粮食依靠进口，这就是农业现代化的实质。农村荒废，年青人离开农村的“三老农业”（只是老爷爷、老奶奶、老妈妈的农业），农山渔村人口的过疏化，“废墟町村”等的出现，就是从六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

社会结构的变化

这样飞速的经济发展，使日本社会结构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其中之一是引起农村人口急剧流往城市。象序言所阐述的那样，战前1930年人口调查的时候，日本可以说还是处于农业国的状态，一半有职业的人口从事农业，全国人口三分之二居住在农村地区。1975年，专门从事农业的农家只有六十万户，减少到战前的十分之一，农业人口只占有职业人口的百分之八。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是惊人的，在郡部居住者减为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太平洋沿岸地带集中了总人口的一半。出现了东京、大阪、名古屋等过密城市，另一方面，因人口外流而变成荒废村落的山谷部落和孤岛等过疏地区增加了。过疏化和过密化成了重大社会问题。

急剧的经济增长，在城市里产生公害、交通困难、住宅困难等种种矛盾。在农村随着经济高速度增长也发生了破坏自然、污染环境等矛盾。这些问题，在讴歌增长的五、六十年代里，几乎根本无人顾及，到了七十年代，矛盾才一下子暴露出来。

经济增长的结果，社会阶级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30年不到劳动力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工人阶级，1960年超过了半数，1970年，生产性劳动者占最多数。另方面，城市的自营商工业者和农业

等中间阶层一直在减少。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成了最大的阶级。还有，资本家内部垄断资本的比重显著增大。1970年全国有八十万个法人企业，其中只一千家公司就占全法人企业资本总额的过半数，而这一千家公司垄断着几乎所有基干产业部门。如果和战前比较的话，中间各阶层被淘汰了，很明显，垄断资本和工人阶级基本上是处于对抗关系的阶级。

战后的政治权力

农业的衰落，特别是农地改革的结果，在战前日本曾是统治阶级之一的地主，作为统治阶级来说已经不存在了。垄断资本不仅作为经济上统治阶级统治着战后日本，在政治上也一贯维护保守独裁政权，以确保其权力。

垄断资本、财界的政治统治，是以保守政党为媒介来实现的。保守政党所以通过选举取得国会多数而垄断政权，是由于财界的政治献金。政党作为政治献金的代价，按财界的意图来决定立法和政策，一直奉行为大企业利益服务的政治。而且，战后高速度增长成为可能的最大条件，是政府对经济方面进行强有力的领导和控制，而担任这些现实工作的高级官僚和有关大企业之间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是战后政治的特征。高级官僚在职时为大企业利益服务，退辞后或者下到那个企业，或者变成保守政治家，成为财界的政治代言人。现在自民党干部半数以上是官僚出身。

这种垄断资本、高级官僚、保守政党的结合体，垄断着战后日本的政治权力。其显著的例子是，号称财界参谋本部的经团联各部门的分科会、和自民党政务调查会的各部会、有关各官厅这三者被认为握有决定政策的实权。并且决定重要国策，甚至保守党的人事，都由经团联、日经联、产业问题研究会等财界团体的实力派来掌握，这也是事实。

保守政党、高级官僚、垄断资本家的结合体，战后三十年间继续垄断日本的政治统治，使在这期间垄断资本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和被它们抛在后边的人民生活之间，产生了日本现在这样的矛盾。这个期间的政治，始终是保守政党独裁这一事实，是由于一直到地方基层组织都牢固地布下了统治结构，和选举制度也采取了有利的保守政党的定额办法所造成的。然而这种情况明显地发生了变化。直到池田内阁领导下举行的1963年第三十次大选为止，过半数选票投给了自由民主党，在众议院的议席中，保守派总计经常超过三百席。然而1967年第三十一次大选，自由民主党在得票率上开始低于半数，以后的得票率一直在继续下降。1976年第三十四次大选，自由民主党得票率终于跌到百分之四十一点八，议席数开始低于半数。只是由于民主社会党、和新自由俱乐部的存在才勉强保持着保守政权，保守独裁显然陷入了深刻危机。革新各政党的分裂和对立，使国政的变革有些困难，尽管这样，但是，国民的意志正确反映在政治上的时代的前景，可以说逐渐展现在面前了。

人 名 索 引

（按首字笔画顺序）

三 画

三木清 43,121
三上卓 36
三木武夫 171
三木武吉 162
三宅光治 23
三浦铁太郎 128
大杉荣 22
大川周明 25,36
大内兵卫 70,150
大桥隆宪 5
大野伴睦 162
小林武 170
小矶国昭 23,107
小林多喜二 42
马立克 163
马占山 32
马歇尔 140
马连科夫 168
马场锳一 53
山川均 70,128
山崎岩 120
山本达雄 37
山本实彦 127
山本五十六 95
山田盛太郎 70
上原专禄 172
下山定则 143
川岛义之 51
广田弘毅 52,58
及川古志郎 91

四 画

中西功 64,121
中野好夫 172
中岛知久平 58
冈敬纯 91
冈田启介 45
冈崎胜男 158
长野朗 36
长谷川如是闲 128
丰田副武 92,117
丰田贞次郎 85
风见章 59,74
风间丈吉 20
犬养毅 18,26,36
犬养健 157
井上日召 35
井上准之助 35
天皇 117
片山哲 127,136
木户幸一 57,75,92,107,116
日野原节三 138
牛岛满 113
内田康哉 37
水野广德 43
币原喜重郎 22,123
邓尼兹 111
毛泽东 12

五 画

田中隆吉 30
田中光显 35

田泽义铺　57
东条英机　79,91,127,139
东乡茂德　116
东久迩宫稔彦　120
石原莞尔　21
石桥湛三　127,164
石坂泰三　164
石井光次郎　164,174
永田铁山　50
永野修身　86
永井柳太郎　58
布尔加宁　163
布莱德雷　144
平野义太郎　70
平沼骐一郎　68,117
平冢常次郎　162
艾奇逊　129
艾德礼　114
艾森豪威尔　106,166,175
北一辉　25
北村德太郎　137,162
本庄繁　22
本间宪一郎　36
古贺清志　36
加藤勘十　43,49,70,127,137
头三秀三　36
甘粕正彦　22
叶公超　158
尼赫鲁　154,159

六　画

西田税　25
西村荣一　156
西尾末广　137,138,173
西园寺公望　26
有马赖宁　74
有田八郎　71
有泽广巳　70
安达谦藏　26
安保清种　23
安藤辉三　51
吉田茂　156,158
吉田善吾　71,79
伊藤野枝　22
伊井弥四郎　135
池田勇人　156,171,177
池田成彬　66
江口涣　43
江田三郎　70
寺内寿一　53,94
约翰逊　144
米内光政　58,107,117
団琢磨　35
后藤隆之助　57,74
牟田口廉也　58
宇垣一成　54,66
朱德　12
华莱士　133

七　画

阿部信行　73
阿部知二　172
阿南惟几　117
尾崎行雄　127
尾崎秀实　64
来栖三郎　94
佐藤尚武　58
佐藤荣作　157
李宗仁　12
李承晚　144,174
村田省藏　162
鸠山一郎　44,126,129,156,163
足立正　174
芦田均　137
近卫文麿　57,91,93
杉山元　58,96

杜勒斯　145,168
杜鲁门　112,114,133,149
麦卡特　149
麦克阿瑟　121,123,153
张景惠　33
张学良　34
张伯伦　80
汪精卫　12,73
希特勒　43,47,80,111
邱吉尔　80,105,111,133
克劳塞维茨　81

八　画

孟德雷斯　174
松木侠　37
松本烝治　127
松本俊一　163
松冈洋右　79,83,85
松冈驹吉　125
板垣征四郎　21,66
林铣十郎　23,50,54
浅沼稻次郎　146,162
河田烈　158
河本大作　21
河野一郎　163,171
武藤章　75
武藤信义　37
金日成　144
金谷范三　23
岸信介　164
若槻礼次郎　23
岩田义道　21,42
建川美次　19,22
泷川幸辰　44
牧野伸显　36
周恩来　159
肯迪斯　138
罗斯福　105,111,112
罗雅尔　134

九　画

勃卢姆　48
美浓部亮吉　70
美浓部达吉　45
荒畑寒村　70
荒木贞夫　25,26,50,51,66
洼川稻子　70
重光葵　121,163
重藤千秋　22
南次郎　19,22
南原繁　150
结城丰太郎　54
神田正种　22
贺屋兴宣　58
哈格蒂　176
秋田雨雀　43
相泽三郎　50
畑俊六　71,75
胡志明　109
宫本显治　173
宫本百合子　70

十　画

铃木茂三郎　43,70,146,150,162
铃木贯太郎　51,114,117
原嘉道　90
原田熊雄　57
莫洛托夫　168
真崎甚三郎　50
夏普　143
桦美智子　176
桥本欣五郎　22
高桥是清　37,51
根本博　22
斋藤实　37,51
栗栖赳夫　137,138

十一画

野沟胜 137
野中四郎 51
野坂参三 49,127,146,173
野村吉三郎 82
野吕荣太郎 42
谢皮洛夫 163
菊池武夫 45
绪方竹虎 158,162,164
梅津美治郎 117,121

十二画

蒋介石 12,34,60,140
鲁梅 113
渡边锭太郎 51
富田建治 91
森恪 18,26
道奇 142
斯大林 111

十三画

楢繁夫 70
滨田国松 53
福田赳夫 138
滩尾弘吉 171
新居格 43
溥仪 33

十四画

赫尔 82
赫鲁晓夫 168

十五画

德田秋声 43
德姆尼茨基 163
增田甲子七 143
墨索里尼 47,105

十六画

橘孝三郎 36

十八画

藤井齐 35
藤山爱一郎 171,174

事件索引

（按首字笔画顺序）

一 画

U_2型间谍飞机事件　175

二 画

"二·一"罢工　134
"八·一"宣言　56
九·一八价格停止令　68
十九路军　31
十月事件　24
人造卫星　168
人之道教团　47
人民抗日军　109　154
人民阵线内阁　48
人民战线事件　70

三 画

ABC协定　82
三光政策　110
三鹰事件　144
三二年纲领　42
三菱重工业　179
大本教　47
大政翼赞会　76,100
大日本政治会　126
大日本青少年团　77
大日本妇人团　77
大东亚共荣圈　108
大日本帝国宪法　9
大日本翼赞壮年团　100
大日本产业报国会　76
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61,91,93
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　109
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　81
万隆宣言　160
万宝山事件　17
小矶内阁　107,114
马来作战　98
马里亚纳战役　107
马绍尔群岛战役　107
马里亚纳近海海战　107
马来亚民族解放军　154
广田内阁　52
广州作战　66
上海事变　29,61
下山事件　144
士官学校事件　50
女工哀史　5

四 画

日本共产党　20,42,146,173
日本协同党　127
日本社会党　126
日本自由党　126
日本民主党　157
日本无产党　50,70
日本进步党　126
日本农民组合　126
日本工会总同盟　126
日本僧侣被杀事件　30
日本帝国统计年鉴　14
日本工会总评议会（总评）　147
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　137,152
日本工会全国评议会　70

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全协) 42
日本无产阶级文化同盟(科普) 43
日本发送电股份公司 65
日俄战争 8
日苏交涉 163
日苏中立条约 83
日苏联合宣言 163
日美谅解案 82
日美行政协定 154
日美安保体制 178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151,173
日美经济合作恳谈会 149
日德同盟问题 72
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 79
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问题 67
日、法议定书 86
日台媾和条约 154
日内瓦会议 159
日农主体性确立同盟 137
日中、日苏恢复邦交国民会议 162
中国共产党 12
中国驻屯军 56
中途岛海战 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 141
中村大尉事件 18
中国统一化的争论 62
中国事变处理纲要 81
反对基地斗争 161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49,105
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 170
五・一游行 129
五相会议 53
五・一五事件 35
内务省 76
内阁情报部 71
内阁情报委员会 71
币原内阁 123,127
片山内阁 135
冈田内阁 45
犬养内阁 26,33
天皇机关说问题 45
长野县教员赤化事件 44
开除公职 127
文艺自由同盟 43
不扩大战线的方针 66
分离华北工作 56
切断美、澳作战 100

五 画

世界反战大会 43
世界经济危机 10
世界形势判断 114
世界和平讨论会 150
对日理事会 130
对日媾和条约 151
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 81
对美英开战名义要点方案 96
打通大陆作战 108
打开满蒙时局的祖国访问团 18
打倒币原内阁联合委员会 128
印度国民军 109
印度尼西亚赔偿问题 166
印度支那停战协定 159
民政党 65,75
民主自由党 141
民主社会党 173
东条内阁 93,107
东久迩宫内阁 120
东北行政委员会 33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 134
北非登陆作战 102
出版法 9
出师准备 89
旧金山媾和条约 151
石桥内阁 164
四相会议 53

电力国家管理法　65
生产管理斗争　125
平沼内阁　68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　101
加入联合国　163
处理华北纲要　56

六　画

全国学联　173
全国大众党　20
全国农民组合　20
全国劳农大众党　20,42
全日本劳动总同盟(全总)　49
全国工会联络协议会(全劳联)　135
全国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全斗)　134
全农全国会议派(全农全会派)　20,42
全日本新闻通信广播工会　125
全日本产业别工会会议　126
全国官公厅工会联合斗争委员会(共斗)　134
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纳普)　45
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　150
农业危机　11,19,38
农地改革　127,130,179
农地调整法　127,131
农业报国联盟　77
农林省统计表　14
农村更生运动　40
农村负债整理法　41
农村救济请愿运动　39
关东军　21
关东军特别演习(关特演)　85
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　22
关于促进结束对美、英、荷战争的腹案　95
众议院　9
众议院选举
(1933年2月)　28
(1936年2月)　49
(1937年4月)　54
(1942年4月)　99
(1946年4月)　128
(1949年1月)　142
(1955年2月)　161
(1958年5月)　169
(1967年1月)　182
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127
防卫厅　157
防卫经费　154
防卫厅设置法　157
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165
自卫队法　157
自由民主党　162,182
自治农民协议会　40
在日朝鲜人联盟　144
在日朝鲜民主青年同盟　144
再次禁止黄金出口　26
共产国际　48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133,146
池田内阁　177
池田·罗伯逊会谈　157
宇垣派阀　50
宇垣·克莱琪会谈　66
产业报国运动　77
产别民主化同盟　137
军需省　103
军制改革　19
冲绳战役　112
血盟团　35
行政执行法　9
机动部队　95
创设自耕农特别措置法　131
论持久战　67
妇女参政权　127
团体等限制令　142

吉田内阁
(第一届) 129
(第二届) 141
(第三届) 142
(第四届) 156
(第五届) 156
亚非会议 160
考勤 169
共同安全法协定 157
同盟国军总司令部(GHQ) 121—122

七 画

远东委员会 130
远东反战大会 43
远东和平之友会 4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法庭) 138
社会大众党 48,65,70,75,126
社会民众党 20,41
社会俱乐部 173
社会党统一 161
抗日救国会 29
抗日统一战线 109
邻保班 76
邻保制度 76
邻组制度 76
阻止修改安全保障条约统一行动 172
阻止修改安全保障条约国民会议 172
芦田内阁 136
芦沟桥事件 58
言论报国会 77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临时取缔法 99
劳农党 20
劳农无产协议会 49
汪精卫政权 81
近卫内阁
(第一届) 58
(第二届) 75
(第三届) 85
进出口商品等临时措置法 65
投降书签字 121
局长部长会议 89
张鼓峰事件 66
《赤旗》 20,42
批判斯大林 168
时局处理纲要 78
进攻重庆作战 107
进驻法属印度支那 85
鸠山内阁 161
陆上自卫队 157
陆军大臣告示 51,117
陆军小册子事件 48

八 画

国本社 68
国民政府 12
国防会议 159,165
国际联盟 31,32,35
国势调查 2,14
国策的基准 53
国家公务员法 142
国家总动员法 65,102
国铁反共联盟 137
国体明征促进联盟 46
国民经济生产总值(GNP) 179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 69
国民精神总动员委员会 69
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央联盟 69
参谋本部 19
参议院选举(1959年6月) 171
英美联合宣言 86
英国本土登陆作战 80
和平三原则 146
和平问题谈话会 150,172
治安维持法 9,127
治安警察法 9,127
波茨坦公告 114

波茨坦敕令 122
空袭东京 101,113
空袭夏威夷 97
空袭日本本土 113
空袭特鲁克岛 107
轰炸锦州 32
岸内阁 164,169,176
“岩户景气” 165
泷川事件 44
周恩来·尼赫鲁联合声明 160
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 148,152
金融紧急措置令 125
松川事件 144
武汉作战 66
林内阁 54,57
终战联络中央事务局 122
例会 76
所罗门群岛的战斗 106

九 画

帝国议会
(第 62 届临时议会) 37,39
(第 63 届议会) 40
(第 64 届议会) 41
(第 90 届临时议会) 129
帝国外交方针 53
帝国国防方针 53
帝国在乡军人会 46,77
帝国人绢会社事件 45
帝国国策施行方针 90
帝国国策施行要领 90,93
帝国陆海军作战大纲 114
政友会 18,65
政令二〇一号 137,141—142
政友会久原派 75
政友会中岛派 75
政治上的空白时期 128
战后改革 123,178
战时民事特别法 99
战时刑事特别法 99
战时犯罪处罚特例法 99
重要物资管理经营财团法 99
保安厅 157
保安队 157
保守联合 161
南方作战 89
南京屠杀事件 61
南方占领地的行政实施要领 109
统制派 50
统制会 102
皇道派 50
皇族内阁 92
昭电事件 138
昭和研究会 57,74
食粮管理法 69,99
食粮“五·一”示威 129
临时资金调整法 65
柳条沟事件 21
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 132
贵族院 9
相泽事件 50
“神武景气” 164
洲际弹道导弹 168
绝对国防圈 107
柏林宣言 150
美韩相互防卫协定 144
指挥权的发动 157
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政策 84
宫廷集团 10,26
宫城事件 118

十 画

海上保安厅 145
海上自卫队 157
海军陆战队 29
特高警察 10,121

特需景气　148
部落会、町内会　76
部落会、町内会、邻保班、市町村例会整备纲要　76
航空自卫队　157
航空消耗战　102
诺蒙坎事件　72
诺曼底登陆作战　106
读卖新闻社的劳资纠纷　125
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　122
原子弹　116
倾斜生产方式　136
热海事件　42
爱乡塾　36
浙赣作战　108
铃木内阁　114,120
徐州作战　66
高速度增长　179
获外庄会谈　79
配给制度　103
租佃纠纷　39
斋藤内阁　37

十一画

密苏里号　121
第五福龙丸　160
情报局总裁谈话　117
商业报国会　77
基本国策纲要　79
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　131
梅津·何应钦协定　48

十二画

朝鲜军　23
朝鲜战争　144
朝鲜停战会谈　153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144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　114,116
最高军事参谋会议　82
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成员会议　116
联合国　145
联合幕僚会议　159
联合参谋本部　122
越南赔偿问题　166
越南民主共和国　153
越南独立同盟　109
雅尔塔协定　116
雅尔塔会议　111
御前会议　84,85,90,93,106,109,114,117
道奇路线　142
硫黄岛战役　112
缅甸独立义勇军　109
斯大林格勒战役　102

十三画

滨口内阁　26
新战略　166
新闻法　9
新物价体系　136
新体制运动　74
新日本制铁　179
“满洲”　15
满铁　14
“满洲国”　15,31
“满蒙”问题　17
“满洲”青年联盟　18
禁止垄断法　131
禁止原子弹签名运动　160
意大利投降　102
解放区　107
解散财阀　131

十四画

赫尔照会　95
嫩江支队　32

十 五 画

德苏战争 83

十 六 画

冀察政务委员会 48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 48

十 七 画

翼赞选举 99
翼赞政治会 100
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 99

十 九 画

警备队 157
警察预备队 145
警察职务执行法 170